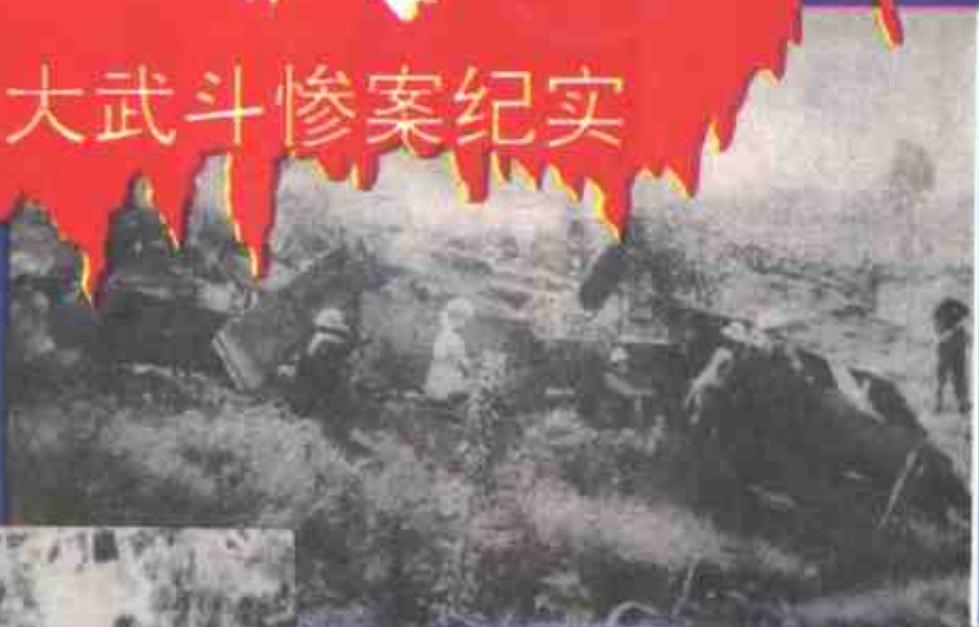


地久 致武

血与火的教训

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新疆大学出版社

111
L46
389

血与火的教训

“文革”著名武斗惨案纪实

地久 致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01

1

血与火的教训
——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地久 致武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二九工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0 千字

1993RH 2 月 15 日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10 日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631-0368-6/1.14 定价:8.20 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引 言

秘密成立于地下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很快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和重视。于是，1966年8月18日，他不顾年迈体虚，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小将”们。

当北师大附中的一位女生给他老人家戴“小将”们的红袖章时，毛泽东没有拒绝，反而弯下腰来，亲切询问小姑娘的姓名。

“宋彬彬。”姑娘回答。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啊？”

“是”。

“要武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

这位小姑娘真的改名“宋要武”。她还在《人民日报》上用新名发表文章，追忆自己的这段幸福时光。

于是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爱红装爱武装”骤然成为社会风尚，“造反”、“要武”成为当时红卫兵的精神信条。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提倡武斗。他不止一次地

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尽管他也曾主张“天下大乱”，由“大乱”达到“大治”。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要武”，只不过是希望同学们克服娇、骄二气，关心国家大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反修防修。可是，年轻幼稚而又充满激情的“小将”们要起武来就不限于此了。扎皮带、戴军帽、穿军装，雄纠纠、气昂昂……“要武”蔚然成风，尚武骤然成为年轻一代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朝气蓬勃、革命精神焕发的标志。一旦相互之间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这种时尚难免鬼使神差地影响他们的言和行。再有人从中拨弄，此情此势必然会导致社会大动荡。

当时并非无人发出“武斗”信息。“副统帅”林彪曾说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坏人打好人，是阶级报复；好人打坏人，活该！”总而言之不离一个字，就是“打”。打人是不错的，错的是挨打者：谁叫你不还手？

“文革旗手”江青说得更为露骨：“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

就在江青讲话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的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骗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

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

“理论根据”有了，行动起来就理直气壮，“师出有名”。双方先是文攻，继而武“卫”；先是拳打脚踢，继而步枪、刺刀、冲锋枪、大炮、坦克及其它常规武器齐上阵，杀得人仰马翻、血流成河……

魔瓶已被打破，一场旷古未闻的自相残杀席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京都风暴	1
1.1 红卫兵组织分庭抗礼	1
1.2 杀向社会	3
1.3 “联动”六冲公安部	6
1.4 清华百日大血战	11
第二章 “广西不得了”	44
2.1 《广西日报》门前的拉锯战	44
2.2 又一次较量	51
2.3 南宁一中的血在流淌	54
2.4 广西内战大火燃起	56
2.5 抢枪风潮	59
2.6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68
2.7 歼灭“4.22”之战	76
2.8 广西善后会议	99
第三章 广东战火	118
3.1 两起所谓“严重的政治事件”	118

3.2	造反派夺权	126
3.3	武斗迭起	129
3.4	海丰厮杀	142
第四章	楚豫劫难	145
4.1	河南玻璃厂三千人大搏斗	147
4.2	山雨欲来风满楼	148
4.3	“七·二〇”事件	154
4.4	狂潮后的余波	166
4.5	血祭朱奇武	170
4.6	湘南杀人如麻	182
第五章	巴蜀硝烟	196
5.1	“夺权”旋风	196
5.2	产业军发誓：“血洗川大，头断四川”	202
5.3	重庆常规武器大战	210
5.4	狂热的代价	226
第六章	血染上海滩	231
6.1	“踏平康平路”	231
6.2	扫荡“红革会”	245
6.3	决战前夕	259
6.4	血洗“上柴联司”	273
第七章	青海危机	284
7.1	青海派别林立	286

7.2	强占报社	289
7.3	武装游行:解放军介入.....	293
7.4	血洒大院	299
7.5	“枪决”	304
7.6	林彪发难	309
第八章 冰城喋血		314
8.1	“一·二三”事件	314
8.2	哈一机血战	321
8.3	哈工大门前的血战	325
8.4	不是尾声的尾声	329
结束语.....		331
后 记.....		332

第一章 京都风暴

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全国武斗的重灾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1967年6月底以前，全市发生大小武斗事件几千起，死伤九百六十多人，损失惨重。如北京第二毛纺厂因武斗停工四天，百货大楼停业两天。琉璃河水泥厂六、七百人停工达半个月。西单商场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数百人死于非命，多种商品、设备以及房屋被毁坏。清华园成为战场，武斗持续百日之久……

1. 1. 红卫兵组织分庭抗礼

最早的红卫兵源自苏俄。1917年，从沙皇手中夺取了政权的工人和士兵自称为新型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卫兵。列宁曾自豪地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是胜利的卫士。

半个世纪以后，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与它具有相同名称的组织——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卜大华等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策，首次使用“红卫兵”名称，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小字报。这一天，后来被作为红卫兵的诞生日。红卫兵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

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决心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小字报的末尾所写的“红卫兵”三个字后面有一百多人签了名。消息传出，在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里引起轰动。在他们的影响下，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亦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全面内战的展开，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通过分化组合，形成新的派系格局。在大专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对立。天派主要包括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地派则由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公社”等组成。

在中学，红卫兵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四·四派”。

“老红卫兵派”指红卫兵的发起者，他们多出身于高干家庭，或者是“红五类”，根正苗红。他们出于保卫红色政权、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热情成立红卫兵，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于是在1966年11月他们便成立跨校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1966年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这个讲话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

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他们自称为“四·三派”，这些人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

“四·四派”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的讲话命名。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应强烈。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又肯定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这一观点受到大部分红卫兵的欢迎。此派名曰“四·四派”，主要是平民子弟，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

派系格局的形成，无形中在两派之间撒下了冲突的种子。在中学内，“四·三派”与“四·四派”形成了尖锐对立。两派先是在校园内展开辩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继而出口就骂，动手便打。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为主体，他们是中学“四·三派”的后台。面临如此污辱，“四·三派”以及“三司”哪甘示弱？他们群起反击。冲突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1. 2. 杀向社会

红卫兵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杀向社会。

在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从8月19日清晨起，红卫兵在京城展开了“破四旧”的巷战。据估计。仅这一天，就有三十万名红卫兵冲向北京的各个角落，横扫“封、资、修”，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教授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当时自己

被红卫兵“武斗”的情景：

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泓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她穿上肥大的羊皮袄。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搽，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拚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一九五八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来本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扭脱臼了，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

最使我感到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趴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

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迫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淑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还只是武斗的初级形式。随着运动的深入，武斗逐步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文化革命”演变成“暴力革命”。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司机在北京东华门污辱毛主席像。此事立刻遭到红卫兵的质问和谴责。以此为契机，1967年7月，红卫兵联合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简称“联络站”）。

8月初，香港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记者。对此，外交部于8月20日向英国驻华代办处提出抗议，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记者，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和《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外交部照会发出后，“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立即开会决定：8月22日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一次“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

华罪行大会”，并商定英国政府若接受我外交部照会要求，立即就地举行庆祝游行；如不接受，即由“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带领一部分人进入英国代办处和住宅区，把代办揪出来声讨，查抄反华材料，切断通讯线路、降下英国国旗。同时，商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八个单位抽调二千至二千五百人，在英国代办处院墙外组成一道“人墙”，防止英国代办处人员逃跑。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对各国使馆“五不一划”，即不冲、不打、不砸、不烧、不截，划地为界。当天晚上，各单位群众集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声讨港英当局的滔天罪行。在声讨会进行过程中，发生了混乱，许多人冲进英代办处进行了打、砸、抄活动，并放火烧了汽车和代办处的办公楼，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1. 3.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群少年老成的红卫兵们正在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的子女，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已“靠边站”。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这些人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审时度势，满腹疑团：“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要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干到底。”经过一番议论，他们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发誓：“只有一条道路，拉出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

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联动”成立之后，锋芒毕露，四面出击。12月6日，“联动”召集人牛皖平率领十几个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之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不料，刚进大门就遭到“三司”的围攻。牛皖平等寡不敌众，只得夺门而逃。第二天，“联动”从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调出二十余人，来到“三司”门前，又被“三司”三千余人围住，脱身不得。经周恩来、周荣鑫等的调解，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二司”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矛盾愈来愈激化。12月6日，北京市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江青在大会的发言中，点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两人的名，说他俩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让他们到前台低头认罪。江青还大骂“联动”成员，说：“血统高贵算什么东西！”会上对“联动”进行了批判，并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会后，便对纠察队发动强大攻势，捣毁了他们的据点，严惩了“首恶分子”。

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联动”并不气馁，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先后六次冲击了抓走“联动”队员的公安部。据“联动”的死对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当时出版的《井冈山》报记载：

一冲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谈，不要动手

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之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人员只得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作了检讨。可是释放出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口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地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

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第二天，三十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地溜走了。

三冲 事隔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名暴徒，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到一个女同志，踢伤一个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 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

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五冲 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过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六冲 隔一天即一月十一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由于这份材料出自“三司”之手，其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所记载的事件经过，却基本上是真的。在冲击公安部之后，“联动”成员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窜来窜去，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对立而发生冲击，图书被撕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种物品筑营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

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1月17日，公安部负责人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卫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接着，在“三司”等红卫兵组织的配合下，公安部先

后将“联动”骨干赵××、邹×、任××、马××等抓走，捣毁了“联动”的各个据点，并在“联动”的大本营“八一学校”举行了“联动罪行展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也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各机关、学校组织群众参观展览，社会上广泛掀起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联动”受到迫害，一个时期内，成为众矢之的。

1. 4. 清华百日大血战

1968年，位于京城西北的清华大学，开始燃起派仗之火。交战的双方（以蒯大富为头领的“井冈山兵团”和以沈××为首的“四·一四派”）酣战百日，使昔日美丽、宁静的清华园一时枪声四起，碉堡林立，铁丝网遍布，成了现代战场。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续了三个来月，这就是闻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百日武斗中，共打死十人，伤残者不计其数。清华校内许多教学科研器材遭毁，科学馆被焚，闻名于世的高等学府变得千孔百疮，破烂不堪。师生们唯恐流弹长眼，祸从天降，人人自危。

“井冈山兵团”俗称“老团”，“四·一四派”俗称“老四”。公正地讲，打派仗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蒯大富的罪责更深一重。

蒯大富何许人也？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人士，1945年9月13日降生在世代务农之家。蒯大富的父母在他出生之前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观点来看，老蒯根正苗红，是天生的“革命派”。穷困至极的蒯家父母企盼他们的

长子日后能富起来，遂给儿子起名“大富”。谁料到，二十多年后的动乱年月，这话还真在大富身上应验。文革时期的蒯司令，大红大紫，富贵至极，其威风，其权势，是他的父辈们始料未及的。只可惜好景不长，大富仅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

蒯大富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农家子弟蒯大富才得以跨进校门。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蒯大富聪明好学，勤勤恳恳，学习成绩一直不错。1963年9月，18岁的蒯大富以六门功课480多分的成绩考入中国理工科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902班。按照文革前清华的习惯叫法，蒯大富是9字班学生。那时清华学制为6年，蒯大富应于69年毕业。

从63年踏进清华园到66年夏文革发动伊始，在强手如林的清华大学，农家子弟蒯大富却表现不俗。笔者曾询问过不少熟知蒯大富者，他们一致答曰：老蒯当年学习上一直拔尖，政治上虽不是特别红，但也热情不小，担任过系学生会干部，有相当的组织才能、笔才和口才。自52年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校方一直倡导学生们要又红又专，有意识地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在全国高校中首倡政治辅导员制度，教导学生做党的好儿女。蒯大富进清华的时候，适逢共和国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也跨进清华园。他们自然比平民子女更受人瞩目，更为校方关照。如果不是文革，蒯大富不可能成为清华园乃至全中国的风云人物，但或许以他的能力，对政治的热情会混个一官半职。文革造就了蒯大富这个“英雄”，也毁了他的青春年华。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狂潮席

卷全国，北京高校更成了运动初期的热点。作为红卫兵发源地的清华，自然不会风平浪静。热血青年蒯大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高年级学生齐聚圆明园废墟，讨论“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形势以及他们将采取的对策。卜大华等都是高干子弟，从小耳闻目睹父辈们的政治活动，使他们比平民百姓子女对政治热情更高，也敏感得多。在这之前，清华附中已出现过署名红卫兵的小字报。卜大华等一致商定，今后凡和他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一律署名“红卫兵”。据说这三个字是受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启迪。这一天后来作为红卫兵的誕生日。

清华大学紧步附中后尘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此时的蒯大富还没有资格参加。清华大学最初的红卫兵组织是由校内就读的一部分高干子女发起的。

蒯大富后来加入了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八·八派”。蒯大富政治上发迹是在同北京市委派驻清华工作组对抗之后。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高校的学生，仿佛穆斯林赴麦加朝圣般地涌向北大，去取如何围攻“走资派”的真经，以便回去如法炮制。一时间，北京各高校领导纷纷被揪斗，各校大乱。

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了以彭真为首的原中共北京市委。新市委组成伊始就公布了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党委书记、副书记职务，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以代行校党委之职，领导北大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各校红卫兵仿效北大聂元梓采取“革命行动”后，首都各大中学校全都炸开了锅。教师不敢上课，昔日被沉重的书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们，犹如脱缰之马在校内随心所欲。往日的校领导，学术权威以及知名教授们，一夜之间威风扫地。

新北京市委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仿照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先例，向少数折腾得极凶的学校派了工作组，对稳定学校的局势还真起了一些作用。于是，其它高校领导和少数学生上书市委乃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要求派工作组到他们学校，以维护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

1966年春夏之交，正是文革不断升温之际。刘少奇受命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首都高校出现的动乱，无所适从，对文革下一步究终如何搞心中无底，只得偕邓小平飞赴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嘱刘、邓相机处理文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刘、邓回京后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对待北京各大中学校内出现一混乱局面。与会者认为，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会议形成最后决议：仿照毛泽东同意的、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先例，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刘少奇形象地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派消防队救火那样快。”

按照这项会议的决议，北京组织了近万名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刘少奇立即将这一决定电告仍在杭州的毛泽东。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大学也进驻了以叶林为组长的

工作组。

工作组进驻学校之后，立即端出尚方宝剑——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八条规定的内容是用来救火的，即扑灭文革之火。

工作组开进清华园后，无疑是对原已垂死的党政领导班子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清华校内以刘×、贺××等为首的红卫兵组织也立即和工作组配合，开展工作。

工作组进校，遭到了校内许多学生的极力反对。他们说：“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叫嚷：“八条是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的，…是黑八条。”

清华园内对工作组抵制最凶的是工程化学系。工化系造反最急进的又是以蒯大富为头领的工化 902 班部分学生。

1966 年 6 月 21 日，蒯大富向工作组糊上了一张大字报，火药味极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问题。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们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看来，蒯大富对权视若生命，通篇都在叫嚷“夺权”。在此之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形成了两个派别，这就是以老蒯为头领的“八·八派”和以高干子女们为主体的“八·九派”。

蒯大富的大字报，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使本已平静的局势又掀起了新的骚动。工作组进校后，清华

园内的局势本已平稳。可这样一来，全校师生又蜂涌而至，对大字报一睹为快。

工作组进驻清华后，王光美还未公开露面。据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王光美公开与学生见面是在清华第七饭堂。那一带学生宿舍比较集中，共和国主席的夫人公开亮相，自然成了校园内的头号新闻。

王光美的出现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工作人员，她既是刘主席夫人又是刘办的秘书，人们很自然地把她看成了党中央的哨兵，是刘少奇的代言人。王光美就是联系党中央和清华大学之间的纽带。

清华大学各系、各班都希望王光美能亲自到他们班来看看，来坐坐，了解一下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情怀，同时也倾听一下群众的呼声，更重要的是通过王光美之口，琢磨出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工作组了解到工化 902 班要开一个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班会，据说，王光美表示有兴趣去听听。

工化 902 班学生对王兴美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诚，作了精心的准备，大家早早来到教室，静候王光美大驾光临。

早在蒯大富贴出那张火药味极浓的夺权大字报后，王光美就作出判断，“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工化 902 班与工作组的矛盾最尖锐，这一点深为王光美所知，但她还是想亲自去那里了解一些情况。

可不知何故，临到工化 902 班召开班会时，王光美却未到会，工作组派了一位秘书前来。

工化 902 班普遍感到被戏弄了。第二天，蒯大富等人

又贴出了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

这篇大字报名为质问叶林，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叶林等人面对老蒯的发难岂能漠然视之。那时，中央的日常工作仍由少奇主持，少奇支持工作组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决的。

当晚，叶林亲自主持召开声讨蒯大富的大会，揭发批判“右派学生”蒯大富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清华大学原红卫兵组织也加入了斗争蒯大富的行列。

笔者访问了当年“斗蒯”大会的一位目击者。据他讲，老蒯当时十分顽固，毫不示弱，公然与斗他的人辩论。清华西大操场，西大饭厅等场所都是老蒯当年舌战“群儒”之地。

蒯大富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又一次在清华园引发出大字报的狂潮。支持老蒯和支持工作组的双方都贴出了大字报相互攻击。

工作组组织了清华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活动，游行者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1966年6月27日、28日连续两天，工作组召开了批斗蒯大富的学生大会，校内到处贴满了批判蒯大富的标语口号和大小字报。原先紧跟蒯大富与工作组对抗的工化902班部分学生，也逐渐被工作组分化瓦解。老蒯此时孤军奋战，根本不是工作组的对手，只得以绝食来与工作组抗争。

清华校内有相当多的学生这时转向同情蒯大富，他们觉得工作组斗蒯太过火。蒯大富此时犹如一只待毙的羔羊，

只等着人家如何处置。但老蒯仍不认错，诚如工作组对他的评价那样：“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清华大学工作组把“反蒯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连连升级，最后，老蒯被当作囚犯一样关押了起来。据当年与蒯大富持对立观点的人说，工作组整老蒯有点过头；所采用的手法基本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这突如其来的厄运，蒯大富还真顶住了。老蒯这个政治赌徒倾尽赌宝，绝食绝水以示抗争。同情老蒯的多了起来。刘少奇同造反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他对文革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这加速了他下台的进程。

6月下旬始，各校工作组全线反击红卫兵组织，北京各高校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近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7月19日，刘少奇等受到指责：“往各大学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在后来不久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工作组受到谴责。会议认为：“工作组起了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刘少奇由于被指责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只得竭尽全力挽回局面。他首先下令工作组放过学生，改为集中火力猛批黑帮，以图化被动为主动，稳住工作组。刘少奇是派工作组到各校的拍板人，一旦否定了工作组，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他仍在尽力保工作组。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看望了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他前一段时期的“壮举”和“蒙冤”表示敬佩和慰问！据说，从未掉泪的蒯大富，感动得鼻涕眼泪一把抓。从此蒯大富时来运转！

在中央文革小组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刘少奇的防线

全面崩溃。7月28日，北京市委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

蒯大富于是成了清华园中头号“英雄”。如果说，前一段时间蒯大富被屈辱地遭受关押的话，那么，如今这一切都成了他光荣的“斗争史”。

工作组撤出清华后不久，清华在东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正式为蒯大富平反。大难不死，蒯大富而今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与北大的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五大红卫兵巨头。

这五巨头一呼百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直把北京高校乃至全北京市搅得天翻地覆。老蒯眼下被捧上了天，红得发紫，名震海内外，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章跟他握手，周恩来跟他在大会堂交谈，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更是与他频繁往来，常向他面授批“走资派”和“黑帮”的机宜。

首都红卫兵组织成立时，蒯大富“荣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的权力机关革委会成立后，老蒯又高升为革委会常委。蒯大富处于一生中的颠峰期时不过二十多岁，但这段“辉煌”的时光没持续多久。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点名批评了蒯大富。从此他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

但是，他还在挣扎，以武力维持其“霸主”地位。

清华园中交战的双方是“老团”和“老四”。要想弄清“老团”和“老四”的来龙去脉，首先必须回顾一下红卫兵组织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

清华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附中红卫兵们便开进清华来斗“反动学术权威。”一代古建筑宗师梁思成先生被他们揪到二校门前批斗，梁先生那本来就孱弱的身体又染上了沉疴。

清华大学内的一群高干子女，不甘落后，紧接着附中之后也成立起了红卫兵组织。由于他们的父辈在文革期间先后蒙冤，在血统论猖獗的岁月，他们毫不例外地受到株连。毋庸讳言，他们后来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然而，文革初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也令清华学生反感。他们政治上的优越感很强，对老百姓家庭出身的同学不屑一顾。自然，他们的红卫兵组织是不让普通人家出身的同学参加的。他们捣毁的清华大学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初的校门，建筑风格独特，与清华早期的西洋古建筑群相映成趣，在清华几代学人心目中占有极重的份量。直到1991年清华迎来了她的八十华诞，由众多的海内外清华学子捐资才得以重建。

工作组进驻清华后，他们与工作组联合掌权，遭到了以蒯大富为头领的造反派的敌视。老蒯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八·八派”，或称“造反派”，与其对峙的红卫兵组织称作“八·九派”，又叫“保皇派”。

“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如水火不相容。在文革初期，由于有工作组撑腰，“保皇派”的势力自然压过“造反派”。

随着工作组撤出清华大学，更重要的是随着刘少奇、贺龙，刘宁一，胡克实等人被打成“黑帮”、“走资派”，“八·九派”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从前，这些专斗“黑帮”的

小将们，一夜之间沦为“黑帮”的同类。贺××后来被投入监狱，惨遭迫害。而刘×，后来也厄运临头。

“八·九”派散伙后，清华园中只剩下老蒯所在的“八·八”派。“八·八”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人由于观点对立而开始分裂。

1967年4月14日，“八·八”派公开分裂成“井冈山兵团”派和“四·一四”派。前者惯称“老团”，司令就是大名在外的蒯大富；后者惯称“老四”，头领叫沈××。据说，沈某如今早已经商，任中关村某公司经理。

“八·八”派分裂成两大对立派系，其根源是文革初期流行于社会并引起激烈争论的“出身论”和“血统论”。

文化大革命目标十分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条指示一公布，便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特别是引起了那些自恃血统高贵者的极大恐慌。随着刘少奇被打翻在地，一大批“当权派”也随之相继跌倒，他们的子女便预感到大难临头了。

党内斗争的严峻历史，残酷的文革现实使大部分干部子女感到惶恐不安，心惊胆颤，如惊弓之鸟。一些过去高高在上饱享特权之福的子弟们，出自本能地要捍卫他们过去的权利。为了求得心理上的慰藉，他们时常凑在一起，谈及自己父辈昔日的光辉业绩和辉煌过去，自然也为父辈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而鸣不平，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当然也十分不满。在冲动和愤怒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的干部子弟发出了愤怒的心声，贴出了“文革时期”中国最著名的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山崩地裂，举世皆惊，其分量不亚于原子弹爆炸时释放的冲击波，并迅速传遍全国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对联为一些落魄中的干部子女带来了一丝光明，他们犹如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拼命吸收着对联的“养份”。但是，这幅对联也遭到了广泛的非议，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血统论”已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况下，一些“贱民”勇敢地站起来，捍卫自己失去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为此，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对联的大辩论，国人都象着了魔似的，无时不谈，无人不谈这幅对联。北京既然是这幅对联的诞生地，当然成了辩论最激烈的地方。

“老团”的头目蒯大富，其父母在他出生之前就都是共产党员，自然，他是极力赞同这种“血统论”的。而原“八·九”派中那些出身不那么过硬的人则坚决地反对这种论调，倒向了“老四”一边。“老团”和“老四”除在“出身论”和“血统论”问题上势不两立外，在其它方面也有不少分歧。

“老团”非常激进，极力主张对“一小撮走资派”和“黑帮分子”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相对说来，“老四”在这个问题上要温和一些。然而，“老四”在冲击外国驻华使馆的荒唐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老团”、“老四”都与中央文革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老蒯有向工作组作“英勇”斗争的“壮举”，特别是他被打伤遭关押获救送往医院后，“康老”亲去医院探视，当面夸他是“坚定的革命派”。有了这个光环。老蒯如今不可一世，

有些飘飘然了。“老团”俨然成了清华大学中的“正宗”红卫兵组织。而“老四”相对说来有些势单力薄，他们处于半地下状态，人数也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二。

笔者在时过26年后的今天，采访了一位当年清华园中的“老四”，他说：

我们同寝室七个同学，有“老团”也有“老四”，我高中时的一位同乡同学就是“老团”，平时我们倒也相安无事。可一旦谈到“政治”问题，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便马上翻脸了。特别是不能攻击双方的头头，如果这样，那非闹别扭不可，后来，“老团”和“老四”下了仗，从此大家再也无法同处一室。

今天，未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难以理解，“政治”又不是心头肉，为了那个“观点”犯得着大打出手？

可那时，观点不同就是水火不相容。文革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人性，至今余毒未灭。观点不同，夫、妻，父、子，兄、弟都顾不上了，都会反目为仇。观点相同的一方互相视为“阶级兄弟”，而将观点相左的对方则被视为“资产阶级”，是“不共戴天之敌”，是“蒋介石”，是“苏修”，是“美帝”，必须将其“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清华校内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更加使“老团”与“老四”之间剑拔弩张。

首先，在对待“罗、文、李、饶反党集团”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尖锐冲突。

老蒯此人，被人整时死不叫饶，倒也是一条汉子，可

一朝大权在手，报复起人来，那也着实叫人心惊胆颤。

罗征启，改革开放后曾任深圳大学校长；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中层干部。在清华，他们虽不是大“当权派”，但也被归于“黑帮”之列，倍受迫害和折腾。他们四人的观点由于与蒯大富一派对立，因而被蒯大富视作“反革命”和“敌人”。

但“老四”是保“罗、文、李、饶”的，在这个问题上，“老四”，“老团”大字报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老团”后来弄出了一台“智擒”罗征启的闹剧。由于罗的弟弟与其面孔酷似，被“老团”误当罗征启，罗征启死里逃生，但其弟却代兄受“过”，惨死在拳棍之下！

对于“老团”的一些过激行为，如在清华校内乱打乱抓，私设公堂，“老四”愈来愈反感，加之“老团”属于蒯司令麾下，有“康老”以及“旗手”作靠山，更重要的是，老蒯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老四”因而处处受压。“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条毛泽东语录文革中可是红卫兵们的口头禅。当时的清华园恰如一个火药桶。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后，全国已有不少地区发生了两派武斗。“老团”和“老四”跃跃欲试。特别是当老蒯亲手挑起战火之后，昔日同坐一间教室的同窗，便翻脸不认人，相互厮杀，欲置对方于死地。

双方都在临阵擦枪。

随着全国局势进一步混乱，造反之风日甚，红卫兵绝不满足仅呆在学校闹革命，他们要将造反的“真经”送往四面八方、各行各业。

早在 66 年 8 月间，仅北京一处的红卫兵就有如下“辉煌”表现：

23 日，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抢夺一空，文化局收藏的文物珍品，古玩字画，戏装道具被拉到国子监孔庙付之一炬……

20 日，宋庆龄在位于后海附近的一寓所接到红卫兵书面警告，必须改变她的发型，因为国母的发式的是“资产阶级”的。否则，红卫兵将对她采取革命行动。同时，五十多万红卫兵还把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总理禁闭在他的办公室达两天多……

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敢死队式的组织“红卫兵纠察队”。他们私设监狱、劳改所、刑堂、滥伤无辜。仅北京六中、一中的劳改所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 200 人。

整个社会全乱了，陷入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之中。红卫兵以天兵天将自居，无法无天，侵犯人权，侮辱人格，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与此同时，新闻却对红卫兵的野蛮行径推波助澜。22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各大报纸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面登出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

除学校外，其他行业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昔日在单位不得志又心怀叵测的一些家伙纷纷借动乱之机，跳出来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那些平日比较受领导器重的，尤其是以前的劳模等自然从感情上同情

“当权派”，于是各单位都闹起了“派性”。闹派性的双方都以左派自居。

像清华这样令世人瞩目的学校，自然不甘于人后。何况清华红卫兵是红卫兵中的贵族。清华红卫兵的贵族地位，在关键时刻多次得以体现。试举一倒。

1966年8月18日，这个本来平常的日子；由于在荒唐的岁月孕育出一批畸型儿——红卫兵，从而对某些人来说永世难忘！农历93年春节前夕，笔者在红卫兵运动过去20多年后，采访了一位当年千里迢迢从湖北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尽管岁月的风霜已使他头发灰白、皱纹满面，但一提起那难忘的“8.18”接见，此君依然记忆犹新。

8月18日凌晨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了。人们在半睡半醒之间只听见大街上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夹杂着红卫兵小将亢奋的呼喊者、歌声和笑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下，军队派车将分布在京城东西南北各个招待所、学校、红卫兵接待站的红卫兵们接到天安门广场。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如何在广场上站队，也颇费匠心。

金水桥两侧由五千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构成人墙。他们的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纠察队，后面，才分别是首都东西城的八十万红卫兵方队。首都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她的红卫兵自然要站得离“红太阳”近些。在首都红卫兵的后面，才是那些不辞劳苦从其他省市赶来北京受毛泽东接见的外地红卫兵。而观礼台的最佳位置，大都被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等校这些红卫兵中的“贵族”所占据。他们自认为只有他们对毛泽东最亲最爱，只有他们才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最贴心，只有他们才是

最最革命派。

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外出“传经”，他们还插手外单位的运动，按当时的话说就是“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老团”，“老四”都相继于1967年春季派人到全国各地“支左”。

在“支左”过程中，这对冤家又结下了仇，除少数观点相同外，他们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针尖对麦芒。

钢院与清华近在咫尺，钢院发生械斗的消息迅速传至清华。

“老团”，“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打仗不可无兵器。那时，除“老团”手中有少许枪支外，基本上还是靠拳头和冷兵器来征服“敌人”。

白天，双方都假装蒙头大睡。其实，各自的“侦察兵”早就在校园四处“探宝”。凡存放钢材，石头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武器的材料之处，都被“探子”弄得一清二楚。夜色一降临，大批人马便开始行动。

清华机械厂是专供校内学生金工实习的实验工厂，那里堆放着大量的钢管，角铁和其他边角废料。“老团”和“老四”都把目光盯在这座“富矿”上。

校园内凡可利用的材料，都充当起战备物资。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文革时期，尽管学校里的党政系统不灵了，“走资派”们一个个自身难保，不敢管“天兵天将”，但饭堂照样冒烟，否则，让红卫兵饿肚子那还了得？更何况，清华还在运动初期接待了大量的外地红卫兵，粮草还是十分充足的。饭堂里的师傅们也分成了两派，“战友”要粮食，那不是一句话？

于是，“老团”，“老四”抓紧时间，尽量弄面粉，弄炊具，弄煤炭以备战事之用。

“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一胡司令式的逻辑，在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还真令派头头的坚信不疑。光有冷兵器还远远不够，要想置敌人于死地还必须现代化的武装。但枪支大炮严格掌管在军队手中，虽然军队在“支左”过程中与不少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在民间流失了部分武器，可数量毕竟不多，难以满足武斗的需要。

清华是中国堂堂第一工科大学，各种专业应有尽有，加上校内教学实习工厂设备齐全，在极少数“革命教师”的指点下，造点武器谈何难？

于是乎，土枪土炮，燃烧弹，甚至连土坦克、装甲车都造出来了。至于炸药和手榴弹，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学机械的精于造枪造炮、造坦克，那么学化工的弄出点炸药也是易于反掌。学土木工程的岂甘落后？赶紧在校园察看地形，抢占有利据点，垒起自己的“杰作”，构造出象当年汤司令困守大上海那样“固若金汤”的地堡和掩体。

武器、粮草备足了，“老团”，“老四”赶忙着手成立武斗指挥班子，以便部署“战略战术”，发号施令。

1968年春夏之交，双方开始大规模抢占建筑物，以作据点。

“清华”二字原本知之者甚寡，只因后来有了名扬四海的清华大学，人们才追溯起清华园的历史。

清华园据称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侯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祖国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

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代对们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历经康、雍、乾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如今，高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大门上端的“清华园”三个大字，据说系咸丰御笔。这幅匾额可说是清华园沧桑历史的见证人。

清末，满清皇帝不得不作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被退回的一部分，创造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

1949年之前的清华大学，校内建筑以大礼堂为中心，分布在东临京张（家口）铁路，西至圆明园遗址东侧这一带。校园远没有今天这么宽阔。

1952年，蒋南翔由团中央书记改任清华大学校长。蒋校长眼光远大，深感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相应规模的场地。于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把京张铁路向东外挪800多米，铁路东移后留下大片田野并入了清华“版图”。清华校内著名的南北主干道就是昔日的京张铁路路基。

此后，以原铁路路基为界，清华分成东、西两区。西区仍基本保持了旧清华建筑物的原貌，东区则陆续建起了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东区最著名的建筑当推中央主楼。

中央主楼始建于60年代初，它的外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

中央主楼完全是苏联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副本”。它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之间相隔很高，连走廊都足有2~3米宽，十分气派、结实。整个大楼建筑面积

67000多平方米。到今天，它仍然是国内高校中的第一楼。

“老四”抢占了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位于清华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

“老团”毫不示弱，赶忙进驻位于东区的7号楼，8号楼，和西区的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等处。

双方占领楼房后便采取措施备战。从饭堂弄来的面粉，大米可挡住门窗防枪子。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都被拖到楼内，自然是作持久战的准备了。被子、衣物等都从寝室席卷一空。

“老四”进驻科学馆的“守军”整整100百人。

“老四”原来还占领了清华大学党政机关所在地——工字厅。

工字厅是典型的四合院，院内房间太多，加之房屋不很高大结实，不利于困守，“老四”恐兵力不足，遂将工字厅主动放弃而集中力量固守科学馆。

在后来发生的武斗中，“老四”才发觉当初放弃工字厅铸成了大错。

工字厅迅速被“老团”占领，为了彻底封锁科学馆内的100名“敌军”，“老团”作了精心布防。

为了领略一番蒯司令等人的“用兵”艺术，不妨勾勒一下科学馆和工字厅一带的地形。

清华西区的建筑以大礼堂为中心，大礼堂正前方是一大片草坪。草坪西端，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第一教室楼，第二教室楼、科学馆和阶梯教室，这几幢建筑的大门都朝东开。

科学馆的背部正是工字厅东侧。在工字厅四周的围墙

上，“老团”架起了枪支，从而使科学馆后门，后窗都处于射程以内。工字厅的后院紧倚着一池碧水，再往北就是一个小山包。小山上建有纪念清华大学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的闻亭。“老团”在闻亭一带挖了个大地堡，黑闷闷的枪口斜对着科学馆的西北端。

科学馆的南端是第二教室楼，二者之间约相距十米左右。“老四”进驻科学馆后，为了多一条退路，在科学馆与“二教”之间搭上了“天桥”，可这显然处于工字厅围墙上的枪支射程之内。“老团”唯恐这样的火力封锁还不够，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起了枪支。

科学馆的东门，也就是正门，同样几乎被堵死了。“老团”占领了大礼堂和第一教室楼，对科学馆正门呈扇形包抄之势。他们储积了大量的石块，足够“老四”“饱餐”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68年1月底，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在蒯大富的挑动下干了起来。

还是在4月间，在“老四”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老蒯怀疑“老四”网罗了他们“老团”中的叛徒，遂命人绑架了两个“老四”派的人。“舌头”自然逃不出一顿饱打，但严审仍然无结果。“老团”岂甘就此罢休？他们编造了一份“供词”，只须将录音小做手脚，便天衣无缝。

随后，这份“供词”被“老团”用来对“老四”进行宣传攻势，以证明“老四”都是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

以牙还牙，“老四”毫不示弱，他们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绑架了“老团”的一名分队长。

这场冲突的每个狂热者都红了眼，全然不顾后果，开始，双方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很快，当最后通牒不见效时，双方都恼怒了，逐渐产生小范围的冲突。小范围冲突随即被突击队行为所替代，小规模游击战逐步升级成正规战斗，两派在校园内的势力范围交界处发生了越来越多的遭遇战。

交战之初，双方仅凭拳头，可肉毕竟不如铁过瘾，双方立即用上棍棒、长矛和刀剑，肉搏战也上升成攻坚战。攻守双方都用上了弓箭和强大的投掷器。武器不够，就地取材，自行车内胎稍经加工就是有力的发射器，包上石头射向对方，威力无穷。

4月23日，双方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用大弹弓互射达3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又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而另一方死不答应，战事又起。

这样打来打去，每周都有人死伤，也有俘虏。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进一步膨胀，冲突升级。

5月30日之前，清华园内还有人自由行动，只要随身不携带武器，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

5月30日后，双方武斗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蒯大富挑起武斗的真正原因还是为了“权力”。

文化大革命进入68年后，由于出动军队“支左”，使有些地方的局势渐趋平稳。全国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权力再

分配——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老蒯自认为他最早在清华园造工作组的反，又是他最早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论功行赏，清华大学的革委会只能由他们“老团”单独成立。周恩来不赞成蒯大富的主张，指出要搞好大联合，应由各派组成“革委会”。蒯大富眼看胜利的“果实”将被“敌人”夺走，公然置周恩来指示于不顾，企图用武力逼“老四”就范。于是孤注一掷。

1968年5月2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会议，决定次日凌晨3点钟攻打“老四”控制的东区浴室楼，由鲍××担任总指挥。

1968年5月30日晨3点整，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全校断电，随即向东区浴室发起攻坚。

固守东区浴室楼的“老四”只有10多人，但均非易与之辈，表现得“英勇顽强”。

“老团”首先搭起云梯，企图冲上浴室楼楼顶，不料此举被“老四”识破。砖头、石块如倾盆大雨，砸得“攻坚战士”嗷嗷直叫。

此举不果，“老团”决定用自制燃烧弹火攻。“老四”中的一小头目被烧伤，眼看顶不住了，火速求救兵。

从主楼，以及“老四”的其他据点来了不少援兵。援兵手执长矛，棍棒，来势凶猛。

“老团”急调自制坦克助战。坦克开来后直朝“老四”压来。由于退却不及，一名“老四”被压死。

这下“老四”可红了眼，刀枪并举，“老团”中一小头

目当场被长矛穿身而死。

“老团”加紧了攻势。火攻再加上烟熏，“老四”因寡不敌众，只得弃楼退守科学馆。

“老四”进入科学馆的整整 100 人。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部所在地。

“老四”这 100 号人进馆之后，首先自然是构筑工事。门、窗等，凡一切危险处都采取了防范措施。

“老团”在科学馆四周设立封锁点后，被围困在馆内的“老四”坐卧不安。整天紧闭门窗，不知外界情况如何，度日如年。

一天，杨志军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从工字厅围墙上突然飞来，杨志军当场毙命，其余人一阵惊吓后连拖带抢，将杨的尸首弄回馆内。

武斗开始后，血见得多了，这些年方二旬的青年学生们也不知道害怕。他们连忙拆卸门板、箱、柜，钉成一简易“棺木”为杨志军殓尸。

据说，杨志军出身贫苦，父母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未料学业未竟身先死！

此后不久，又有一名“老四”成员被“老团”射杀。

“老四”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为了求生存，在其它地方的“老四”时不时给科学馆内的战友送一些蔬菜，粮食，但要将给养送进科学馆，困难重重。

在“老团”的严密封锁下，出入科学馆成了大问题。无奈，“老四”每次都全副武装，抓住每一个机会接送给养，以使困守的一百来号人不致于饿死。

随着封锁越来越严密，外面的给养根本无法进来，大米、蔬菜早已吃光，幸好还有一些面粉和煤炭。科学馆内的“老四”这下真尝到了孤军困守的滋味，他们每天不得不限制口粮，一日三餐，馒头就着盐水。

进入7月，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扬言“有进出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

自5月底被困，转眼已近两月。眼见弹尽粮绝，上“天”无路，只有入“地”了。

“老团”设在大礼堂的宣传点，还时不时竖起高音喇叭对科学馆展开心理攻势。在外部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被困在馆内的近百名“老四”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老团”将在科学馆四周挖沟壕，埋炸药，一举让“老四”连同科学馆升天的消息，迅速传进科学馆，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们入“地”。

“老四”动手挖地道。文革前，《地道战》，《地雷战》这两部电影在神州大地老幼皆知。没想到，当年对付鬼子的妙策如今在武斗中派上用场。

科学馆距其南端的二教仅十多米，二者之间原由“老四”在房顶搭起了天桥相连。但天桥处于“老团”火力封锁之下，从天桥上逃生，无疑是痴人说梦。

尽管孤军困守两个多月，大家几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一股原始潜能。

近百条汉子轮流上阵，学老愚公掘上不止。科学馆与二教间地道很快就挖通了，可“老四”暂时还不敢高兴得太早。二教旁边就是一教，那里也被一伙“老团”把守，昼

夜都虎视眈眈地监视着科学馆里的一举一动。若想逃命，就必须从一教地下穿过，然后再找出口。

“老四”继续往前掘进，穿过一教地下再往东，约二十来米就是老机械工程馆。那里是“老四”的势力范围，只要将地道挖到此处，科学馆里的人便求生有望。

眼看大功将要告成，可又生出横祸。

不知是“老四”挖地道的响声太大，还是蒯司令有别的奇异功能，“老团”竟得知“老四”企图遁地逃生。

“老团”也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也要把“敌人”揪出来。他们的地道将老四的地道拦腰截断，要不是“老四”溜回堡垒动作神速，险些被人家生擒。

“老团”在地道中塞满炸药。轰隆一声，“老四”近百号“战士”的血汗伴随着尘土和硝烟飘散在空中。

“老四”如今真可谓是雪上加霜，难道就只能在这黑洞洞的科学馆内束手待毙？

天无绝人之路。

工宣队进入清华园灭火。

1968年的盛夏，北京城上空仍弥漫着武斗的硝烟，这使闷热的空气更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两年多了，小鬼打大鬼的目的业已达到，但放鬼容易捉鬼难，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伢子”，“妹子”闹腾得太过份了，再这么下去，谁知道会把中国折腾得成何样子？

文革伊始，红卫兵充当了运动的主角。正是他们，才把中国这块沉睡的土地搅了个天翻地覆，四海翻腾！先文攻，后武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走资派”纷纷被

拉下马，但“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了。”

如果说，运动之初的红卫兵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过，现在，他们则逐步走向对立面。有朝一日，这群野马一旦脱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为，红卫兵已成为红了眼的公牛，若任其横冲直撞，将来完全有可能出现“炮打江山”的局面。

趁现在野马还未挣脱缰绳，要捉牛鼻子了。

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的产业工人组成的一支五千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清华两校。

工宣队的进驻，使清华园中的两派暂停了厮杀，调转枪口一齐对准他们。

工宣队的进校，来得非常突然，中央文革事先也未向蒯司令透露任何风声，骄横不可一世的蒯大富又认为可再一次显示其英雄本色，遂重操故技，拿出当年斗工作组的手法来对付工宣队。

但这回的工宣队不是当年的工作组。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

工宣队也是善者不来。他们虽辩不过钢嘴铁牙的蒯司令，但他们是由一批根子最红、成份最好、最革命的工人先进分子所组成，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有“尚方宝剑”，因而毫不怯阵，对蒯大富的发难针锋相对：“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对中国文革。”

蒯大富见世面多了，他岂能被这些“大老粗”镇住。

他把几千“老团”召集起来，将人数处于劣势的工宣队团团围住。工宣队员们只好紧紧地捏着“红宝书”当护身符，在困难之中呼喊一声革命口号给自己壮胆，同时也是为了让红卫兵理解。

红卫兵人多势众，不时瞅住战机对工宣队员进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单体弱的工宣队员稍有不慎，便被“老团”揪出，饱餐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更有甚者，痛打之后，被打者还被劫持到红卫兵的营垒，充作人质。

工宣队在红卫兵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蒯大富得意洋洋地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校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工宣队大小头目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得悻悻地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讨教对策。

得到答复说：暂时撤回。

只两个多小时的功夫，工宣队不得不鸣金收兵，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片“嘘”声中沮丧地离开清华。

这是红卫兵与工宣队初次交锋后第一个回合的大胜。他们欢呼雀跃，再一次感受到他们那无坚不摧的力量所在。

然而5小时后，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向清华大学挺进。

在这之前，红卫兵已封锁了通往清华的所有路口。但这一次工宣队有解放军护驾，加之人多势众，于是扬眉吐气，锐气逼人。

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们手中捧着“红宝书”，齐声高

呼“要文斗，不要战斗”的口号，向红卫兵的封锁线进发。

这一回，红卫兵抵挡不住了。大军压境，他们招架乏力，经过几番拉锯，最后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最顽固的堡垒内。

工宣队员潮水般地涌进清华园。

工宣队在清华立足未稳就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喝令“老团”、“老四”放下武器，实现“两派大联合”。

科学馆内的“老四”立即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

在这之前，科学馆屋顶已被蒯司令部属施放的燃烧弹烧塌，“老团”正准备从天而降，直捣“敌巢”！

在工宣队员的护卫下，“老四”被带到安全地带。困守百日，进去整整百名战将，如今有两名已成为枪下鬼。他们的尸首，在炎热的7月底，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可叹热血男儿，不是为国捐躯，而是死在“阶级兄弟”的乱枪之下，这是一代红卫兵的自祭！

这98名“守军”，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污秽不堪，发长过尺，犹如地狱中放出来的厉鬼。

“老团”仍在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堡垒负隅顽抗。更有甚者，躲在大礼堂的少数狂人居然向工宣队打冷枪。这一天，北京城大雨倾盆，倒在血泊中的5名工宣队员那殷红的鲜血仍然没唤起“老团”中少数顽固派的良知！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

乱石如雨。工宣队员不得不搬来许多课桌。他们头顶课桌，猫着腰，仗着人多，一拨又一拨地往旧电机馆强冲。那乱石直砸得桌面砰砰响，震得桌面下的脑袋昏昏然。但

工宣队员只要不被砸倒，一息尚存，就勇敢地往上冲！

旧电机馆终于拿下了。困在大礼堂中的“老团”孤注一掷，武装突围。蒯大富三次令“长矛队”打头阵，企图冲出工宣队和解放军的包围圈。

“老团”实在顶不住了，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司令等核心人物突围。傍晚时分，“老团”不得不打出“白旗”与工宣队谈判。

仅“7. 27”这一天，工宣队员计有5人被打死，伤者逾700，143名失踪。他们在危难时刻，有少数人也几乎被激怒得失去了理智，但被同伴劝住，基本上是采取“文斗”的方式，解决了“清华百日大武斗”。

清华园中的百日内战之火扑灭了，蒯大富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从大礼堂逃出之后，老蒯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昌平。祸不单行，车行至途中四轮朝天，蒯司令虽幸免于难，同车一女生的双腿却被压断，终生致残。惊魂未定的蒯大富，又突然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心中更加惶惶然，不知凶吉如何。

“7. 27”晚，通知发出后，毛泽东端坐大会堂静候被召见者。

毛泽东的两旁坐着林彪和周恩来。在毛的身后坐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及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当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先后走进会议室时，他们感到有点不对劲，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一个个表情严肃，中央文革那几个平素见了蒯大富亲热得

不得了的人，今天一个个紧绷着脸。

蒯大富被康生点将，“谈一谈吗，你们那里的情况如何”，蒯大富镇静地从坐椅上站起来。蒯大富语出惊人。他说：“清华园的形势确实不使人满意，井冈山五千多红卫兵自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原因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我们清华红卫兵更人的支持，反而指责井冈山兵团……”

蒯大富有意把目光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同时也盯着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红卫兵司令。

康生、江青、姚文元、陈伯达先后谈了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武斗一定要制止，然后恢复上课，搞好复课闹革命。

蒯大富嗅出了他们几个的弦外之音，他开始辩解：

“中央首长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第一，是‘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将要作出结论，可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我们不想过早地退出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发生的一切事情归结到我们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象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事实上，我们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有些地方的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

当江青将蒯大富和紧接着蒯大富发言后的韩爱晶奚落一番后，周恩来插话：“现在同学们回去，停止武斗，把工事拆了，把枪支和其它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的样子。”

王大宾、聂元梓、谭厚兰一致认为总理的话“办不到”。

蒯大富更是一触即发，口气强硬：“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我们的死刑。我想不通。”

韩爱晶也跟着起哄。

沉默，一种难堪的沉默。

毛泽东一锤定音，情绪颇为激动。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

毛泽东情绪太激动了，激动得嗓音都硬了。他呷了口茶，理了下思绪，以千钧之力，掷地有声：

“我再说一遍，如果谁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

蒯大富懵了，彻底地懵了，仿佛挨了一闷棍，直打得天旋地转……

蒯大富的命运从此每况愈下。1968年12月，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黄河之滨的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宁夏，蒯大富原打算过几天平静的日子。也许，疯狂过后，他渐渐恢复了理智，可人家并没有将他淡忘！

1970年10月13日，蒯大富接到通知：请他赴京参加

某会，可一下飞机便被弄到清华大学，有关人员向他宣布，他有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未交待。兴冲冲的老蒯这才如梦方醒。

一连三年，无数次的审查将蒯大富弄得精疲力竭，可终究也没作什么结论，只是将其下放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1978年，蒯大富被又一次带回清华，公开宣布被捕，4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将其押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

1980年，蒯大富作为证人公开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在此前后，他被移至秦城监狱关押。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进行正式审判。

蒯大富的罪行最后定为“反革命煽动宣传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

第二章 “广西不得了”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信息较为闭塞。然而，在十年“文革”中，这里是全国武斗最为严重的地区，武斗双方动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轰乱炸，血肉模糊。幸存者回忆当年，仍面如土色：“死那么多红卫兵，惨！”当时炮轰解放路，民房成为废墟；水淹南宁，尸漂海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草菅人命；“活人展览”别出心裁，斯文扫地……中央针对广西武斗，特地向全国发出“七·三公告”，但在这里，成为一张废纸，武斗仍在继续……

2. 1. 《广西日报》门前的拉锯战

广西“文革”之初并没有两派，1966年虽然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也贴出一些揭发本校所谓“走资派”的大字报，随后《广西日报》也学着《人民日报》的样子，批判陆地和钟林，把他们打成所谓“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代表人物”。同时，还出现过中央民族学院师生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要求回北京参加“文革”的“事件”，广西师院也就桂林的“八·七”事件派出代表到北京告状，并到南宁区党委请愿，静坐，但终因为串连大潮起，许多人纷纷外出串连，对于广西的文革过问相对较少，“文革”的破坏力仍然不很明显。有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问题，群众中才开始出现受“资反路线”压制的一部分人和拥护执

行“资反路线”的一部分人的对立；这种对立随着“资反路线”的被批判，工作组的检查，逐步趋向于明显。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围绕夺权与反夺权，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日益加重，广西群众围绕广西日报的夺权逐渐分裂成两派群众组织。1月7日，广西日报社的职工和外面的群众组织一起，夺了《广西日报》的权，把《广西日报》改为《每日电讯》出版。元月15日，以广西“工总”为主的25个造反组织，认为1月7日的对《广西日报》夺权不彻底，又重新宣布对报纸夺权，以“广西造反大军”名义重新接管《广西日报》，改出《新闻报道》。造反大军接管《广西日报》后，对广西的所谓“走资派”进行了“造反”，游斗了几位广西主要领导干部。1月22日还组成“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夺了区党委、区人委、公安厅、法院的权，从此全区各地基层政府被夺权，广西陷入了瘫痪状态。

这时，广西的大权转移到了以军区和各级人武部门为首的领导者手中。

由于中央要求各地军队领导“支左”，军队也因此介入地方的“文革”。1967年元月份，广西军区对造反大军的夺权，还是表示支持的，派代表出席了元月24日在朝阳广场召开的“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并应“造反大军”要求，派出五批解放军分别到“造反大军”所属的各工厂单位支持他们夺权。

“造反大军”由此神气起来，对以前的所谓“保皇派”——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等大加讨伐。“保皇派”压而不服。2月份，他们自己联合起来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

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自己“造反”，也批斗“走资派”。

像篮球场上处于裁判地位的广西军区分析认为：“造反大军”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邑联络站”四个群众是“革命左派”，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而对造反大军的其它组织则不明确表态，因其成份复杂，不能定为“左派”。被定为“左派”的多是红卫兵组织，这些年青的学生以“左派”自居，对“无联”等后起来“造反”的组织，横加压制，阻止他们“革命”，2月16日，“无联”开大会批斗广西的“走资派”，“左派”红卫兵得到消息，马上组织200多人冲击大会，说他们“无联”是“假批判、真保皇”，是“捞稻草”。种下了“保守派”与造反派互相仇视的祸根。2月22日“无联”也突然袭击“工总”总部及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9人，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其余人员“无联”自己放回。

从此，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加深。由于唯阶级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极左理论的支配，广西军区在支左开始，对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头头的成分看得很重，所以，一开始就认定广西“工总”的负责人“成分不良”，要砸烂，军区派出的支左人员，秉承军区的指示，以所谓“支持工总内部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名义”，指使工总组织内部群众自己“控诉”“揭发”“工总罪行”，把一部分群众宣布为“反革命”，并封闭了“工总”总部，抓了“工总”的熊一军，造成工总内乱。

自此所谓的“造反大军”瓦解。桂林“志多”，“八·

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组织不同意砸烂“工总”的做法。“造反大军”由此分裂，一些组织退出广西日报，广西日报社职工把《新闻报道》改为《红色新闻》出版。直到3月25日，军区奉中央指示对《广西日报》实行军管后，才重新以《广西日报》的名义出版。

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政委陈××率领工作组于3月18日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21日，陈××在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认为韦对援越抗美有功，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很多组织同意支持韦站出来工作，第二天大街上就出现了不少支韦的标语口号。

而“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造反组织，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对砸烂工总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因而出现了相反的不同派别。26日、29日，广州军区工作组，多次到各机关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并对“工总”也认为应采取相应措施，由于以军队出面，支持韦国清的组织越来越多。

不同意支韦的群众组织多是文革初期的造反组织，他们对韦仍然有气，加上军区砸“工总”，他们认为是包办群众的做法，因而持反对意见。

3月31日，两种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游行到区党委大院，由辩论而引起个别人的拉扯冲突。两派矛盾上升。

4月初持反对意见的组织通过大字报，大书特书广西军区支左有问题。他们列举了砸工总、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又上挂下联，找到军管的《广西日报》，逐日地逐

篇查看《广西日报》的文章，从中挑出“充当反革命复辟吹鼓手”的罪证，在南宁朝阳广场大肆张贴。并进行所谓“演讲”。经过反复宣传，“打韦派”的群众组织逐渐增多。13日，“打韦派”又在朝阳广场开大会，宣布新工总成立。14日，“红卫兵联络站”勒令《广西日报》的军管小组向群众“请罪”，承认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限军管小组48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一个“勒令”。16日，“打韦派”七十多个“造反”组织七千余人在朝阳广场集会，“声讨党内最大走资派”，会后游行，“工总”成员到文化宫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并挂上“新工总”的旗帜，部分学生则游行到“广西日报”社，召开“控诉《广西日报》罪行大会”。有人还冲上报社传达室房顶，把报社的广播喇叭给砸了，冲击的学生还广播了第二号“勒令”，要《广西日报》开辟专栏批判军管的《广西日报》“罪行”。第二天，六百多学生、群众到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送“最后通牒”，限军管小组24小时内撤离广西日报社。18日，“支韦派”在朝阳广场集会，后到广西日报社表示声援军管小组。20日，“打韦派”一千多群众在南宁火车站集会，表示支持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的《四·一九》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到《广西日报》，提出三点要求：1. 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2. 撤销军管小组；3. 砸烂报社的群众组织“58112”。限令36小时答复，否则静坐示威。”支韦派4万人则在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四·一九声明》。22日“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

造反组织万余人在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会后游行到广西日报，又向军管小组提六点要求，军管小组不予答复，他们便宣布静坐，并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宁4·22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总指挥是广西医学院学生曾春生。23日，“支韦派”四百多个组织约4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批判伍晋南等的《四·一九声明》，反对伍晋南等领导干部4月19日到广西大学发表支持造反派的声明。（伍晋南等领导干部后来被西大红卫兵保护起来，并和西大学生一起吃饭。这些经历被“联指”曲改为攻击对立派的笑料，“4·22”红卫兵由此挂上“馒头兵”的“美名”。）区党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出席参加了这次大会。区直机关54名厅、处级干部在会上批判《四·一九声明》。表明了区党委领导干部从此也分裂成两大派。由于贺希明支持“打韦派”。26日，广西军区党委撤销了其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职务，并向群众宣布。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军区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军区撤销贺希明的职务。并高呼“揪出军区内一撮走资派！”的口号。27日下午，“4·22”部分组织冲入《广西日报》，强占报社的大楼。《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冲击军管是违犯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尊严，破坏了军管的规定，冲击的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军管的广西日报。5月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敦促下，“打韦派”冲击群众撤离报社。5月1日，按照中央4月29日的通知，“支韦派”赴京代表组成共14人与乔晓光、安平生一起乘车去北京，5月3日“支伍派”代表12人与伍

晋南、贺希明、霍泛一起出发去北京。5月25日“支伍派”的群众再次集会，会后游行到广西日报，再度冲入广西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并宣布对报社实行“兵管”。“支韦派”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5·25”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5·25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联指”）。联指成立不久，随即几百人冲入广西日报社与冲击的“4·22派”进行辩论，并要“4·22”撤离。在辩论中动手强行拉扯“4·22”派的人员，以致双方发生了以石头、木棒为武器的武斗。双方指挥部和群众听到报社发生冲突，立即派兵增援。不多时，双方增援人马达五、六千人。广西军区一看大势不好，立即派出七辆宣传车到现场呼吁双方停止武斗，并派救护车救护伤员。但是武斗并不就此停息，人们用石头、砖块互相攻击，一直打到夜深，双方累了，才自然停止。26日上午，“联指”从报社后门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必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的口号，推倒报社的围墙冲进院内，先是占领电台，接着占领印刷厂、“4·22派”人员退守办公大楼，并关闭大门防守，“联指派”抬来大木头用力撞击报社办公大楼的门。只见门被冲垮，里面的“4·22”红卫兵仍然用手拉手组成人墙，力图阻止“联指”人员上楼、“联指”人员挥舞木棍、铁棍开路，人墙被冲散。“联指”一千多人一拥而入，口号声、嚎叫声、棍棒撞击声、石头打碎玻璃声混成一片。不多久双方受伤百余人，争夺办公大楼的武斗直打到下午四时。天空突然降下大雨，武斗被迫停止，“联指”占领了报社大部。晚上七时，“联指”人员自动撤离。“4·22”则

组织大批人员进驻报社，并重新占领电台，印刷厂，构筑各种临时工事，以防“联指”的进攻。

27日，“4·22”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并将当天已印好的报纸扣留，自己发表夺权《声明》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出批判军管《广西日报》的文章。从此围绕着《广西日报》，广西两派的派斗大开，广西人自相残杀的内乱从此拉开帷幕。

2. 2. 又一次较量

4月26日，“联指”到广西日报“赶走”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的“4·22”。但27日，“4·22”又回来占领了广西日报社，并发表了夺权宣言，不仅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还连篇累牍地批判军管广西日报的所谓“罪行”。这种与军区当局相对抗的行为，激起军区领导人的愤怒反击。4月29日，部队当局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部队领导机关出面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这是广西自砸旧“工总”以来公开的第一次，“联指”派人受鼓舞，而“4·22”派则玉而不服，更加火上加油，矛盾更加激化了。当日，“联指”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勒令“4·22”在30日凌晨5时前撤离广西日报社，否则将采取更加强硬的“革命行动”，而支持“4·22”的七十名领导干部联名向中央文革发电报，说南宁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挑动武斗，南宁“警司”的《忠告、警告书》引起武斗……

有警司做后盾的“联指”派，出动一个又一个宣传车，围住广西日报社，一个警告接一个警告。“警司”的宣传车

也夹杂其中，喇叭中的男声播音员，声音低沉而且激昂。“4·22”占据广西日报的多是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前段时间被捧到天上，俨然以“革命左派”自居，况且“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冲你军管两下又何妨？加上有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北京造反派的支持，虽然听起“警司”的“警告”有些“吃不消”，但革命造反“砍头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双方都用自己的观点，去鼓动本派的群众。一派对自己的群众说：“4·22”是“牛鬼蛇神”组成，他们冲击军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反动阶级本质的大暴露”，我们要坚决捍卫解放军，支持军管。另一派则对自己的群众说：“联指”是老保组成，他们与走资派相勾结，挑起武斗，想镇压我们造反派，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

于是不要文斗，专搞武斗就有了“理论根据”。5月30日凌晨，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升入天空，联指“驱赶”“4·22”出广西日报的“革命行动”开始了。

即日，南宁郊区九千多农民也奉命集结到市中心的朝阳广场，派头头对他们通知是到南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到广场，派头头又给他们“辅导”学习内容：“阶级敌人”夺了广西日报的大权，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们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回答是否定的。人们个个愤怒无比，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向报社走去……

不久，报社四周布满了头戴白色藤编安全帽的“战斗人员”。一部分人在报社正门前用石块攻击，引吸“4·

22”的“主力”。“联指”主力则集结在报社后门。很快，他们推倒后墙，从后面冲进了报社，报社后面的电台，印刷厂很快被“联指”占领，“4·22红卫兵寡不敌众，纷纷退回报社办公大楼。

大楼上的“4·22”紧张起来，纷纷把各式能抵挡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当盾牌或武器，离地面较近的二、三层楼都用桌子当盾牌拦在窗前，以防各式的“炮弹”打进来。这些石块武器是间歇地进攻的，“联指”先提供“炮弹”，“炮弹”飞上了楼上，楼上的“4·22”便把它握在手里，等待楼下的“送弹人”。只听“啊”一声，又一名“中弹受伤”。“4·22”人员因为不是“官兵”，所以无藤帽之类可发，时不时听到一声“哟”的叫喊，那肯定是“光荣负伤”了。受伤者被抬下底楼，医生们给他紧急包扎，有的一包扎好，是轻伤，还不下“火线”。“联指”兵个个手持棍棒，头戴安全帽或藤帽，打冲锋的据说是“沥血兵”，还有什么“红色公安”。不一会儿，底楼防线被冲垮；守卫底楼的“4·22”红卫兵有的被打倒，有的撤上二楼，有的往展览馆方向撤退……

一位在楼底抵抗的负伤者，在医院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才从昏迷之中睁开眼；他浑身疼痛，他只记得一位持棍者向他袭来时，他躲闪不及，脑子轰地一下便麻木不知了，救出他的同伴们告诉他，他被冲上来的人群当作了人梯，踏过他身上的不止几十人……

一位青年人被打中头额，额骨显露，伙伴们赶快把他背上救护车，到医院一看，伤口深约一公分，长6公分。

一位红卫兵与另一位持棍的藤帽者“搏斗”，不幸被推

出窗口，掉下楼底，血流满地……

有的学生与持棍者争夺木棒，被棍捅伤，很多人被木棍横扫，脚给打伤或打断。不多久，楼下的负伤者数目增多，有的抱住双脚哟哟直叫，有的血还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救护车已经往返医院多次，这一次却久久不见进来。原来，救护车路经另一派“阵地”时，该派战士齐声高叫：“打死他！打死他！”，“不要救这些坏人”。硬是把车给堵住，不准救“阶级敌人。”

激战的大楼，由于“4·22”的人员增兵赶到，才把冲上来的“联指”又都压了回去……

双方都增兵支援，而伤员越来越多，夜深双方暂时休战。但是，更大规模的血战还在后面……

2. 3. 南宁一中的血在流淌

5月份“《广西日报》大战”以后，广西的“文革”进入武斗阶段。各派以怕自己的所谓办公地点被对立派攻击为由，开始构筑防御之事，有些街道也拦起了障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晚上，朝阳广场人影稀少，百货大楼旁边的“造反楼”上放着七八个高音喇叭，代表“4·22”的“声音”在高声地“揭露”广西党政军内走资派挑起武斗的罪行。对面是桂剧院。“联指”的广播大楼，对着“4·22”的造反楼，也高声吼叫：“一小撮阶级敌人操纵和蒙蔽群众挑起武斗……”。以前的广场大字报棚，现在只剩下暗淡的电灯光，偶然有几个胆大的红卫兵前来贴大字报，反对派立即围将上去，拉住对方就进行所谓“辩论”。在所谓“文斗”阶段，这种“辩论”有时持续到天亮。一派说他们

“支书”是对的，另一派说他们“支伍”是对的，“支书”不对。各讲各的所谓理论，所谓的辩论利害者，无非是一些头脑发热的“红卫兵”。随着“武斗”风刮起，辩论变成了拉扯，由拉扯推挤就变成石头战。辩论人群一轰而散，分成两边。大多数中老年人便离开了这些“是非”之地回家休息去了，而血气方刚的一些年青人，则并不想住手，捡起石头向对方扔。这种相持一般到深夜便自然中止。这种在街头的小冲突，因为是常常发生，人们便见怪不怪了。一进黑夜，街上便只剩下灯光。有的地段的灯又给一些无知的少年打烂，几乎没有多少条街道的路灯是完整的。

进入6月，“联指”派对未能把“4·22”赶出广西日报还耿耿于怀。他们仗警备区作后台，正千方百计打散“4·22”，不打散也至少要阻止他们的发展。“4·22”则对警司的出面愤怒无比，6月2日召开大会声讨了“警司”的“罪行”后，又多次到广西军区大院抗议并涂写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为“王总”平反等，并封闭了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意在抗议广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联指”派也不甘落后，组织成千上万群众集会游行，到军区院外游行示威，抗议“4·22”冲击军区、军管会。

两派告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力图制止广西的武斗。6月6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布了《六·六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歪风。但是，当时的形势已远不止广西一个地方，全国各地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武斗之风已愈演愈烈，人为挑动起来的“两个阶级的大搏

斗”已处在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既然是“两个阶级”，那必定要有一派充当“反革命”的角色，至于“反革命”的“罪证”，则由一些人说了算。说你革命，即使你违犯了法律、宪法也是“小节无害”；说你是“反革命”，就是你起的姓名也是罪证之一。决策上层尚且如此，而下面所谓的“两大阶级搏斗”的群众就更不用说了。

在广西，既然认定一派是“反革命派”，那支“左”就不会有你这一派的份。因此，另一派耿耿于怀，自己来一个所谓“军管”、“军训”，大力宣扬 6955 部队支持桂林老多的“先进事迹”，意在指责广西军区的支左有问题。广西军区则不吃“4·22”这一套，照样支持“联指”不误。甚至在双方矛盾异常剧烈之时，屁股就是坐在“联指”一边，看你“4·22”能奈我何？形势既是如此，广西的武斗无法制止，愈演愈烈那就无法避免。

6月11日，南宁一中“指点江山”红卫兵34人突然回校，并占据军训团的宿舍即学校阅览室，作为自己的办公室。

6月13日上午，“指点江山”红卫兵宣布自己在校内搞“军训”，“4·22”红卫兵广西大学“革联”有18名进校“指导军训”。

这五、六十个红卫兵进驻到南宁一中这块几乎全是“联指”派天下的校园，而且强行占据解放军派来搞军训的军训团宿舍，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当即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的反对，并派人与“指点江山”辩论，由辩论而发展到你推我拉，发生小冲突。有人还故意把电闸给关了，全校一片漆黑。小冲突是当时武斗的导火线。一中

“指点江山”势孤力薄，感到不妙，立即把信息报到“4·22”总部。“4·22”在朝阳广场的“造反楼”上立即开动高声喇叭：“一中‘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500多人闻风赶去，封住一中大门。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一些人的围攻，紧接着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守卫一中大门的“红卫兵团”随即进行反击。不久，“4·22”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一中院内，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也组织力量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直打到14日凌晨5时，“4·22”派撤离，武斗方告一段落。8时，“4·22”派又重新包围一中，9时，“4·22”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联指”派的铝厂、化工厂、橡胶厂工人约四、五百多人也前来助战，双方用石头、砖块对打到15日上午结束。

这场武斗，使一中校门街道两旁居民房屋顶盖全遭毁坏，一中的教学仪器房也被毁坏，经济损失达5万元，双方各被打伤200—300人，重伤住院100—200人。南宁一中“6·13”事件揭开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当时的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是这样描述这场武斗序幕的：

在一中军训团长××的直接指挥下，一中的保皇兵对西大革联和一中“指点江山”战友进行突然袭击。随后“黑色公安”、公安厅“武斗兵团”、南宁橡胶厂“一摸三揪”等一千多人立即赶到，把一中围困封锁得水泄不通，将我二百多战士关死在校内用木棒、铁棍、小刀、石头等凶器进行毒打。惨无人道的暴徒除毒打

外，竟然行法西斯之道，挖掉一中革命造反派教工五、六岁小孩的双眼，并割去其鼻子，又将我受伤战士拖入一中的积水防空洞内，成簸箕成簸箕地燃放六六六粉毒品，然后用鼓风机鼓进防空洞内进行烟薰，当场能查悉的我战士就惨死6名，伤者200余名。

……暴徒们增至近万人，战场从一中扩展到附近的几条街道，绵延数华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这天下午四时许，公安厅悍然丧心病狂地用汽车调来了四排（约600多人）劳改犯，煽动他们“抓牛鬼蛇神，将功赎罪”，让他们手执木棒、头戴藤盔杀入现场，残酷无情地残杀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

惨剧一直连续了三天三夜，才收敛停止。据不完全统计（现因一中内仍由暴徒占领，无法入内查清）经查确凿死者，防空洞内就有27人，其它地方被毒打致死及在医院无法抢救死者5人，共32人，伤者达600余人之多。不少战士身负重伤，正处危险期，生命在垂危中……

广西大学“革联”“红卫兵总部”联合主办的《红西大》是这样描绘这场武斗的：

……突然，全校的电灯熄灭了。在一片漆黑中，暴徒狂呼乱叫，严重的时刻来临了。面对着一场血腥的镇压，“指点江山”、西大“革联”的战士毫无畏惧，他们排好队伍，大义凛然地高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战歌，准备再次要求××出来制止武斗。他们刚踏出宿舍门口，一阵石头迎面飞来。……战友们的头被砸破了，鲜血流满了脸孔，流满了全身，染红了衣服，染

红了地面，一个个战友昏倒在地……

……十二时左右，“红色公安”、“一摸三揪”、“捣黑窝”等暴徒数百人从粮食局那边冲了进来。他们个个头戴钢盔、白藤安全帽，手持木棒、刺刀，杀气腾腾向革命小将冲杀过来。暴徒一下子把“指点江山”二十多个人围在一间小房子里，用石头、锄头和扛来的大木头把门窗撞破，用空灯泡装着六六六粉、石灰往房子里掷，还用铲子把六六六粉抛进房子，顿时毒烟弥漫，红卫兵小将顿时感到眼辣鼻呛，中毒头昏欲吐。高六五四班×××被装着六六六粉的灯泡打伤左额，他用左手掩住，一块石头飞来，又打伤左手掌背，伤口深达一公分，血管裂，血如泉涌，昏死在地……×××看到×××被打昏在地，冲上前去抢救，却被暴徒当头一棒，打伤头部，且被石头砸伤三处，当即昏倒在地……归侨老师×××上前抢救，也被玻璃瓶打伤头，血流满脸……

……他们冲进房子把“指点江山”战士的蚊帐、被子、衣服、自行车等等能烧的东西统统搬进操场，点火烧，浓浓烟柱冲向夜空。

……他们抓住我革命战友，用皮带抽打，把打伤了的战友拖进了防空洞内，用鼓风机把六六六粉、石灰粉鼓进去；毒杀我革命战友，数百名战友倒在血泊中，数十名战友被杀害了，许多战友也失踪了……

……两个小孩的眼珠被残匪挖掉了，又一个小孩的眼珠被残匪挖掉了，血从眼窝里喷射而出。有的战友又被割掉了鼻子、耳朵……暴徒殴打前往抢救伤员

的医务人员。一中校医××被暴徒打昏在地又是一阵棍棒，打得鲜血直溅。暴徒从江边用木排运来汽油，企图烧灭我战友尸体，又调殡仪馆的车，企图偷运尸体，毁灭罪证。

……暴徒们把一中附近居民房子的瓦片全部拆掉用来打人，把五星路、卫国路几里内的房子拆成一片废墟，并在屋顶用沙袋修工事，不准行人通过……仅十五日初步统计，就有五百多名战友受伤，仅西大数理系被打伤的就有57人，到现场观看情况的群众也被打伤数十人。医务人员搬运伤员已两天两夜，但仍未运完……

至此，广西的“文革”已无什么“文化”的影子，剩下的只有武斗，派性的仇杀，而且一浪高于一浪。文化大革命不是说要“整党内走资派”么？怎么来来回回又整到了群众自己头上？这些当时的群众毫无所知，群众在一些人的挑动下举起屠刀只顾相互残杀，并美其名曰：“两个阶级的搏斗。”

2. 4. 广西内战大火燃起

南宁一中事件，仅仅是广西两派武斗的开端，一中事件后，两派的对立情绪更加高涨，由此，冷兵器的武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所属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赴邕调查组发表《就南宁一中6·13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文中这样写道：“……南宁一中爆炸了！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的鲜血教育了我们，

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党政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狰狞嘴脸。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疯狂进行垂死挣扎，一场黎明前血腥镇压的信号弹已经在南疆升起了……南宁、桂林、柳州，全广西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刽子手的绞刑！”

“全市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紧急行动起来，展开强大的战略反攻，直捣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窝！”

6月15日下午3时，“4·22”派一部分群众听说专政机关放劳改犯出来参加武斗，愤怒地向孤立无援的永宁公安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扑来。人们高呼“打倒黑色公安！”“血洗释放劳改犯出来杀害我‘4·22’革命战友的永宁公安分局！”整个房子被愤怒的人群所占领，公安分局的门窗全被砸烂，永宁公安分局副局长和永宁派出所指导员活活被殴打致死，躺在满是瓦砾的火堆旁。永宁派出所的铁门被推倒在地，派出所的楼板洞穿塌落，屋顶瓦片被掀翻，公文柜、公私财产全部被洗劫一空，户口簿、档案文件全都被投入水中。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年月，被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造反派则认为这是“长了无产阶级志气，灭了广西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威风”。

同一天，南宁市郊区“联指”派的一些组织头头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联指”攻打“4·22”。

6月16日，“联指”组织的农民入城，围攻“4·22”的航运“工总”、文艺干校等，所组织的武斗人员达2000多人，其中有“红色公安”、“一摸三揪”与农民600多人。航

运“工总”的北大码头仓库，被武斗的战火所殃及，国家财产损失严重，两派参战人员都有伤亡。

6月18日，广西水电设计院“4·22”所属“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修筑武斗工事，还抓捕水电厅长和水电设计院党委书记作人质。“联指”前往营救，双方爆发冲突。

几乎以此同时，“联指”组织一千多人再次围攻“4·22”占据的广西日报社，数天猛攻，损失惨重，但没有能攻下。

6月24日，“联指”调动工人和郊区农民攻打区水电设计院大楼，26日清晨大楼被攻下，设计院工人蓝良被钢叉刺死。“4·22”6人被殴打并关押，大楼上的广播器材，探照灯及所有资料被洗劫一空，“火种”成员龚华健被汽枪打瞎一只眼。

同在这一天中午，“4·22”的“红卫兵战斗楼”即座落在南宁市繁华闹市区的中华电影院被“联指”包围。“战斗楼”周围的高高矮矮的楼房、平房顶上布满了“联指”战斗人员，楼房的平台上架起用两个人才能拉得动的大弹弓。砖头是弹丸，一拉胶带，一放手，弹丸即刻飞到对方楼顶，其威力不亚于真枪实弹。总攻开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四面八方飞向“战斗楼”；地下，成群成群手拿木棒、长矛、钢叉的“联指”派战斗人员迅速向“战斗楼”逼近。“战斗楼”负伤的人员越来越多，防御力量骤然下降。不多久，楼顶就被“联指”的火力压住，楼下正门也被“联指”逼近，“战斗楼”有近二分之一的人员是女同学，她们虽然战斗英勇，可毕竟不如男同学。“联指”武斗人员从四

周房顶一齐向战斗楼围攻过来，他们高呼着口号挥舞着棍棒、刀叉占领了楼顶，楼下也就失去了战斗力。楼顶上，“联指兵”握着钢叉、长矛直逼“4·22”兵的胸膛，高呼：“缴枪不杀”、“投降！”有三位“4·22兵”拒不投降，竟然从楼顶高呼“毛主席万岁！”纵身跳下。据说跳下的都是女同学。一位同学跳下，被楼下的瓦房挂住，“联指”兵的一个头头竟指挥众喽罗用石块朝这位受伤者打去。楼上的“4·22”兵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得血流满地，大多数人见抵抗已毫无意义，便放下“武器”靠拢在一起，“联指兵”命令他们“举手投降”。但没有人举手，有的人竟无视投降命令，空手朝“联指兵”走去，被“联指”兵按住头猛揍，直到血流满面。下午，守卫“战斗楼”的“4·22”全部被俘，举起双手，押送到“联指”的市人委大院据点关押，直到7时40分，俘虏才被“释放”。

“释放”的俘虏并没有回家，而是带着伤血走上街头，向群众诉说“联指”的“血腥暴行。”

同是这一天，“联指”又攻下了“4·22”的“卫东楼”、“反修楼”等据点。

6月25日，“联指”乘胜前进，集中优势兵力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方面包围区文化大院，以解决这个文化单位的“4·22”分子。他们以推土机作先锋，紧接着是头戴钢盔、藤帽的“联指”兵，文化大院的围墙外围战斗很快解决，推土机轰轰向前推进。围墙被推倒，大股人流冲进大院。“冲啊！”“缴枪不杀！”这些在电影里看到的战争镜头，如今在现实中演开，一些从事文艺多年的演员、艺术家，被眼前的残酷现实所震惊，他们千万想不到，在社

会主义取得多年胜利的国家里，竟发生这种荒唐事。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第二天“联指”攻破大院并占领所有的大楼后，还当了“伤兵”和“俘虏”。27日清晨，“4·22”600多人被俘，有的被捆绑，有的被用布蒙住眼睛，有的用绳子串连起来，被排队押解到区物资局联指据点内，区物资局大院成了集中营。有的“犯人”被审讯，有的惨遭毒打。

周恩来总理对广西出现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曾多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对制止武斗作了重要指示。在中央的调解下，广西赴京两派代表团在1967年7月4日签订了《十条协议》，协议规定：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夺权、开枪等。

《十条协议》的签订，使广西两派的对立矛盾，由白热化而被泼上一盆冷水，相互对抗的战争转入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

2. 5. 抢枪风潮

1967年7、8月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说：“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整个国家处在武斗的战火中，因此，广西的协议虽然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冲突，但是更大规模的内乱即将开始。各派看到全国都纷纷火拼，广西岂能作世外桃源？于是表面上口口声声遵守协议，而实际上各自磨刀霍霍。

7月12日，广西北海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突破了签

订协议后的平静，双方用木棍、石头对打，激战两天，受伤达 100 多人，重伤 30 多人。

7 月 30 日，“联指”红卫兵突然袭击广西军区警卫区和驻区党校分部的野战军 6984 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 300 余支，轻机枪三挺，六〇炮一门和一大批弹药。这是广西“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抢枪事件，影响极坏。但是广西军区处理这一事件不果断也不积极，以致给广西两派抢解放军武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9 月 15 日，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的武器。经过策划，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 80 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 7.62 步骑枪 80 支，轻机枪 4 挺，九二式重机枪一挺，五〇式冲锋枪 50 支。

从 8 月份至中央《九·五命令》发布，全区有 19 个县市发生抢夺解放军武器的事件。

1968 年 5 月 3 日，广西“联指”常委颜××等人在开常委会议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的武器弹药。5 日晚至次日凌晨 4 时，广西“联指”组织 3800 多人，出动汽车 45 辆，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 7044 支，其中轻机枪 479 挺，高重机枪 49 挺，六〇炮 4 门，炮弹 60 发，子弹 120 万发，望远镜 50 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发生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所谓“抢枪”事件。

5 月 10 日柳州“联指”到 6985 部队和 519 部队再次抢夺武器，共抢得各种枪枝 316 支，子弹 11056 发，六〇炮，

迫击炮 2 门，四〇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 47 人。

1968 年 6 月 4 日，广西联指组织 13 个单位的人员再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去“抢夺”武器。3500 人共抢得各种枪支 1859 支，六〇炮 8 门，子弹 100 多万发。

1968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到 7 月 4 日连续 5 天时间，桂林市、桂林地区 12 个县的联指到兴安的军械库，连续冲击 11 次，冲击人数达 10000 多人次，汽车 400 多辆，抢走枪枝 5636 支，子弹 325 万发，还有手雷 10 多万枚，爆破筒 100 多根，各种军需品 700 多件。对此，广西军区默不表态。

联指派的多次重大抢枪事件，在当时并不是人不知晓，关于这种抢枪行为，对立派“4·22”也多次作了揭露。但这对于“一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又算什么行为呢？不仅不是违法行为，而且是“革命行动”。相反，对立派抢枪，那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1968 年 2 月 21 日，广西“4·22”一部分人到驻南宁解放路的 6912 部队抢枪，抢得各式武器 40 多支。

1968 年 5 月 21 日，柳州市“造反大军”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夺援越子弹共 1700 万发，25 日，驻柳部队就对柳州的这两个组织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包围据点后，柳州的数万群众愤怒前来与包围的解放军论理，形成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群众自发的反包围，致使部队 20 多人受伤，2 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了解放军的 700 多支枪，从此柳州势局进一步恶化。

1968年5月3日，“4·22”所属的一些组织到南宁体育场的驻军6936部队抢枪，6936部队另一个营的战士奉命前往制止抢枪。“联指”总指挥部得知，立即组织所属沿途组织拦截“4·22”，抓捕“俘虏”，当6936部队这一营的战士从体育场回营地时，途径中华路、朝阳路时，联指的“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以为是“4·22”的汽车，开枪扫射，打伤解放军31人，打死5人。第二天，“联指”倒打一耙，广播说是“4·22”抢夺部队武器，拦截6936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

1967年8月18日晚，“4·22”三百多人开到南宁附近的小站金鸡村，冲向载满援越抗美物资的列车。车上只有炮弹，他们把4000多发炮弹也运回了南宁据点。抢援越物资使全国震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极坏影响。中央文革不得不电令“4·22”交还炮弹，“4·22”只交还大部分。

同是在这个月，“4·22”400多红卫兵乘坐3条船到邕宁县武装部抢夺武器，很快200多条步枪、机枪和一大批弹药被抢到手。他们赶快乘船而回，岸上的“联指”闻讯赶来向“4·22”的船开火。但船已离开码头驶向南宁，邕宁“联指”立即电告南宁联指，南宁联指立即组织力量在青秀山拦截。船刚驶入青秀山的射程，枪声即呼呼作响，“4·22”6个红卫兵当即中弹身亡。“4·22”200多条枪立即一起开火，终于，船驶出了“联指”的封锁线。“联指”见岸上拦截不成，又乘一只机轮船在江上拦截，加上岸上的火力，把“4·22”的驳船压得抬不起头。幸好，“4·22”“工总”派出两艘小炮艇前来接应，才把这200多支枪

运到了南宁。

这是广西文革以来，第一次使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斗争”。从此以后，南宁市内石头、砖块的撞击声，被呼呼作响的枪声所取代。

2. 6.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经过抢夺武器，各派手中都握有钢枪铁炮，特别是“联指”派，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要把对方消灭，不能平白无辜，得动脑筋，让人家死得个“明白”。于是一个个“敌人”便被那些制造厂的老板们制造出来了。

造“敌人”得要有证据，证据何在？

首先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军训、军管”。这在前面已列出，不须赘叙。

再就是“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铁证如山”的。“联指”在攻克“4·22”民族电影院据点后，又攻克了东方红医院的据点，接着就举办“尸体展览”，公布“4·22”杀害联指战士的“滔天罪行”。

可两天后，两派代表会同军代表和首都医疗队的16名医师对“展览”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11具尸体，其中“4·22”派的有9具，“联指”派才有一具。

事实胜于雄辩，“联指”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反过来说别人“屠杀”它，恐怕难于自圆其说，“展览”也只好不了了之。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强调指出广西两派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封存武器，外出武斗人员回原单位，不准强占据点，不准动员农

民进城。

第五次接见后，解放军 6984 部队进驻“4·22”的据点，“联指”只好停止进攻。形势对“联指”不利。

从 1967 年 8 月至 1968 年 5 月，广西两派在各地还不断拼杀，但南宁还是处在表面“和平”之中。

1968 年 5 月，“联指”拦截“4·22”抢枪而打死了 6936 部队一营的 5 名战士，打伤 31 名。打死解放军，是“弥天大罪”，怎么办？嫁祸于人最好。于是“联指”总指挥部第二天经过高音喇叭一喊，杀害解放军的罪名，便洗得“清清白白”，而“4·22”便是罪上加罪。

1968 年 5 月 12 日“联指”“沥血”红卫兵在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开办“禽兽展览”。展出办法是把人关在木笼内让人观看。被展出人员当然是与“联指”观点相反的人：原区水电厅副处长林执真、原区地质局处长张祖贵、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黄海泉等 10 人被当作“展品”。“联指”指挥部带头搞展览，随即其下属组织马上行动起来大搞“禽兽展览”，全自治区有一万多人被当作“展品”在各地“展出”。一批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群众，由此被推上“敌人”的位置。为他们大开杀戒寻找舆论的根据。

以上“罪证”虽然“有力”，但因是两派纠纷，明眼人一看，派性的色彩过重，以派划罪，似乎有点心虚，也不好给中央交代，怎么办？

1968 年 5 月 17 日，广西区文革筹备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

捕获团长 1 人，副团长 3 人，政治部主任 3 人，经济部长 1 人，支队长 4 人，联络站负责人共 63 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4·22’派的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罪证俱在，怎么还不下手呢？原来有些“罪证”还要“追”，还要“集中”。对上报告振振有词，对下指示如何？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的指示。指示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1968 年 6 月 17 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还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自称——作者注）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所谓的“反团”案虽然到了1983年已得到彻底平反，证明是冤假错案，但它给广西人民带来的灾难，却令人难以忘怀。

所谓的“反团”案一公布，许许多多不同观点的平民百姓就成为了他们消灭的“敌人”。平民百姓对于当时那些握有权力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如虫如蚁，叫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他高兴今天你可以是“英雄”，他不高兴明天你就是“敌人”。至于“罪证”，简单得很，我说的就是。让我们翻开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主办的《广西日报》，看一看他们给当时的“走资派”谢王岗、袁家柯、霍泛、贺希明、傅雨田等所定的罪行，不难看出，那些所谓的“正确路线代表”所采用的手段也不过是极其卑鄙的流氓手段而已。请看，1968年7月19日《广西日报》《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1968年7月11日在欢呼“七·三”布告的大会上，当时的广西军区负责人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1968年7月18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攻打“4·22”据点的理由时，把自己指挥解放军用大炮炮击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引起民房起火，说成是“4·22”纵火焚烧居民房屋。因此，为了制止“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的纵火事件，我们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1968年7月7日石油公司“联指”人员欧飞海和李子书在区石油办公室弄一个自制手雷，不慎引起爆炸，李当场死亡，欧负重伤送303医院抢救无效也死亡。可是当晚，商业厅“红色商业”却在广播中把炸死的责任转嫁到“4·22”的头上，并煞有介事地向“4·22”提出抗议、警告，第二天开追悼会时，还把“4·22”派的人拉来跪灵，并抽打跪灵的无辜者。

南宁作为广西首府，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是当时广西的权力机关，他们及其在南宁的二将，尚且如此制造“敌人”。地区、县以至农村中的效法者，其手段和办法就更加难以形容了。

请看：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4·22”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4·22”观点的群众）。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21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干部23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0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11天打死338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7864人。

钦州地区7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还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

众。

武鸣华侨农场 1300 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 74 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 1337 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 221 人被抓捕，202 人被关押，162 人被吊打，107 人被打逼死。341 户人家被抄。

这些鲜血写成的数字，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只是一些主要的数字，那些“正确路线的代表们”所铺就的“功德”还远不止于此。

以上是制造“敌人”工厂所日夜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如何制成的呢？让我们与一些当时被这个“绞肉机器”绞过的人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便知道其制造“产品”的“奥妙”所在。

一天，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在一起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大会开始，一位老教师被虎视眈眈的“红卫兵”押上台前，主持开会的“工宣队”负责人宣布：“今天我们开大会，斗争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他们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为领袖，要反共复国……。”接着要“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教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他慢慢摊开讲稿，一字一句的交待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在本校还有同一派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当他一念到此时，他所念到的这十几个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

下子被“路线觉悟高”的另一些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推到主席台前。大家一看原来都熟悉，都是“4·22”一派的。所谓的“反革命反动组织”的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深夜，各种“侦破专案组”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梁上，索要“反动组织”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谁知道，“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动组织成员？”“不知道！”“不是！”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尽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挟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又突然松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工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是反动组织成员”了。但是不管怎么打，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怎么办？“反革命组织”已经讲出去了，证据却没有。人是打了，逼了，死了，证据却不见。

既然你逼人家成“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那为什么光我们是“反革命”，而你们不可以是呢？后来这十几个学生受到了“启发”，几个被打的人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罪恶”时把“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那几位“革命派”也联名“交待”，“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动组织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这一招果然厉害，“工宣队”吃惊不小。是呵，杀人灭口可是阶级敌人的一贯手法，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不

成，不能让这些人当“专案组”。不久“专案组”打人凶手被调开，“反革命”才得以减少了一些皮肉之苦。但是“文化革命”不结束，“四人帮”不倒台，他们精神上的创伤永远无法去掉。

十几岁的小孩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也被逼成“反团”成员，联系到几十岁的人，联系到在农村的人们，只要稍有一点观点与他们不同，不管三七二十一，枪杀、活埋、用木棍活活打死，就不知其数。

这就是他们制造“反革命”产品的生产流程，用这套“生产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便证明他们“阶级路线觉悟高”，因而便可以成为往上爬的阶梯。

在广西这部机器在1968年曾经隆隆开动，制造出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敌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怎么办？杀！先在农村各地杀！灵山县被打死3200多人，都安县被打死441人，百色地区被打死1073人，开鸣县被打死698人，河池地区被打死七千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使“阶级敌人”“闻风丧胆”。当时的《广西日报》一再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1968年8月3日）。社论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是迫害造反派，他们是什么“造反派”？根据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或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或是土匪和国民党，或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

于是广西更大的惨案，更激烈的“武斗”出现了。

2. 7. 歼灭“4·22”之战

有了大批杀人武器，又有了杀人的理由，杀人应该开始了。

1968年4月30日，部队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

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逼死的有108人。（该案1981年7月得到平反）。

5月初，出现“4·22”到6936部队抢枪，“联指”打死6936部队解放军多人的事件。

接着5月12日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

5月20日，广西“4·22”“青年近卫军”几个人遭枪击，（被华强粮店旁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开枪打死2人。“青近”以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攻占粮店。）

5月30日广西“4·22”袭击展览管对面的“联指”据点，打死“联指”成员12人，自己被打死2人。

6月16日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用高射机枪攻打“4·22”的百货大楼据点，致使三楼起火燃烧。

6月19日，“联指”组织大批武装人员攻打“4·22”区水电厅设计院的“火种”大楼据点。×××、×××等人亲自指挥。第一天白天攻打不下，是夜，他们派出爆破员，

扛上炸药，在密集枪声的掩护下，企图靠近大楼，但没有成功。20日又组织“沥血兵”去轰炸，但仍然没有成功。后来他们抓来两个“4·22派”的俘虏刘××和滕××，用枪逼他们接送炸药包。下午4时大楼上打出白旗，刘、滕两个俘虏被“沥血兵”开枪打死，这时战场上已经有7人被打死。

下午5时，“联指”冲上大楼抓俘虏，楼上61人被抓，俘虏被拉到大院内，其中55人当即被“联指”集体枪杀。杀死人后，“联指”又把尸体拉上汽车，把汽车开到江边，把尸体丢入江中。

这些杀人凶手后来被“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视为“文革功臣，”并委以重任。如果不是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下达，这类人物有可能仍然逍遥法外。

6月23日，“联指”攻打“4·22”的航运工总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联指”指挥部命令河南片“联指”“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和南宁化工厂的“联指”拉来大炮，对准停泊在河边的“4·22”船只就轰，轰轰的炮声，使40多艘轮船葬身火海，从1967年至1968年，联指三次攻打航运工总的轮船，致使166艘船被烧毁，损失达1000多万元，打死10人。

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布告为广西派性所利用。“联指”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了武装围剿的战斗。在广西，乱杀、乱抓之风愈演愈烈，被武斗和乱打乱抓而死的人不断增多，造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7月5日，区革筹负责人召见两派群众组织的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

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从6月23日“联指”报公布南宁警备司令部“关于破获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件公告”到7月3日“七·三布告”的发表，仅隔一个多星期，

7月11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随后几天，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如《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4·22”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是在“4·22”那里，坚决“镇压”吧，谁“镇压”得越多谁就是“英雄”。

临桂县革委会委员胥××，是临桂县“联指”派头头。

在“七·三”布告下达后，他亲自策划指挥杀害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 19 名县区干部。胥某亲杀 3 人，1971 年 9 月以照顾父母为名，调回四川綦江县还担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长。这个人杀人手段残忍，但为他们办理人事档案的派性战友，把档案写得干干净净，而且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了功”等等。1984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安机关逮捕了胥犯，但有的人对他的档案清清白白感到惊讶。其实联系当时是非颠倒，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7 月的南宁骄阳似火。汽车一辆接一辆，运载着身背步枪、冲锋枪的武装人员在来回调动。南宁郊区的山坡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些都是“联指”指挥部和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联防”的“岗哨”，公路上荷枪实弹的“联指”武装人员比比皆是，从南宁至宾阳的邕宾公路、邕武公路。邕北公路……每隔五、六公里便有一个持枪检查站，每一个汽车走近，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客车上的旅客要逐一验明证件，稍有怀疑，立即“逮捕”。对于这样的军事封锁，他们还不放心，南宁市革委的治安委员会还发出指示，对南宁市人口进行“大清查”，“清查”的武装人员办法特别“创新”。一般是半夜突击。一位当时曾在南宁过夜的外地人说，一个晚上要突然搜查旅社两至三次，命令所有的客人立即起来。检查人员如临大敌，被检人员如同战犯。被子、衣服、提包全给搜个遍。7 月 16 日一个晚上抓到 280 个“嫌疑分子”，有的光着身子，只有一条短裤，便被赶到治安委“审查”。有的人自从被抓以后，至今生死不明。有

的人被抓以后，由于证件没有，无人证明，便被当作“4·22”分子“处理”掉，先是毒打、虐待，然后枪杀……

7月1日，南宁警备司令部门卫森严。在会议室里，几位要人嘴里慢慢地吐着烟。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研究如何武装消灭“4·22”的“战略”、“战术”问题。广西军区调6个连的兵力，这是他们的打算。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还不够，怎么办？有的认为还要调各个县的“联指”入城。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力量，并划定兵力部置的位置。“联指”的头头当然懂得，此次会议事关重大，是经过有关方面批准的，是军区的部置。他们兴高采烈，脸上泛着红光，有的摩拳擦掌，有的激动地走来走去，就象是电影银幕上的“将军”。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带兵“打仗”了，而且这个仗是以百当一之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4·22”的部分群众，见到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有的开始对“反团”一案不怎么相信，但是看到“解放军”也这么说，不禁怀疑起自己身边的人，是不是就是“反团”。舆论压力导致许多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发生。8月4日，“4·22”指挥部保卫处的武装人员，对南宁警备司令部通辑的所谓“反团”首要分子陈××、覃×、潘××、唐××、陆××、白××，开始也不相信，但舆论压力所致，他们不得不把这6个人抓了起来。有的人主张关“警司”，有的人认为不对，上当了，有的人则主张自己“开庭”“审判”。结果，宣判6人死刑，立即执行。当把“犯人”押出刑场时，“犯人”喊冤不止，

但是，在“阶级斗争”激烈动荡的年代，谁能去“调查”这个冤情呢？尚且真正的“反团”才叫冤，欺骗我们再上当。为了保全更多兄弟不受“反团”之累，还是“苦”了你们吧。随着保卫处负责人一声令下，砰砰砰的枪声当即划破南宁市的天空。这是8月4日的中午。这是南宁解放路的枪声。在这个时候，在整个“4·22”都是“反革命”的时刻，谁又能再说什么？有的人是眼含着泪扣动扳机的，有的人心象碎了一般。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这个手指头是他自己愿意去扣动的吗？不！这个手指头已不属他自己，它属于历史……明明知道不是，却要扣动扳机。这历史的矛盾，诉说了这种是非颠倒的政治所制造的悲剧是怎样一个又一个发生的……

7月5日，“七·三布告”颁布，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南宁开3万人大会后，各地区、县马上纷纷效仿。全区有300万人参加了热烈欢呼的大会，并且纷纷行动起来，抓“坏人”，各地乱捕乱杀的现象加剧，各地被打死、杀死的人数比布告公布之前增加了几倍。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全家杀绝，有的对不同观点的群众搞所谓“批斗”，被吊打、逼供、活埋、枪杀的不计其数，滔滔邕江河，每天都有尸体在上面漂浮……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到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人们看到，江南的大炮在移动，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4·22”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7月的太阳象火一样滚烫，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他们有的人以前曾在靶场上打过一两发，很不过瘾，现在是真人真靶，

“多带劲”。有的炮手过后说，“当时我们也是听上面的，上面叫我们去打，我们就打。其实那里面也不会都是坏人，但上面这样说了，你能不信吗？谁比上面更懂……”

展览馆后面是南宁人民公园，公园在“文革”以前规模还比较小，有小小的白龙潭，有烈士墓，有几个动物笼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门票也给“革命”了，“劳动人民的公园”怎么能向劳动人民要钱呢？开门，免票。所以文革以后，门是经常敞开的。在派性越斗越激烈的年代，只有少数“逍遥派”躲在这里过清闲日子。但是，绝不能给“革命派”的巡逻队看见了。看到你那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肯定不是“好人”，凡被认定不是“好人”，就马上提起人们“阶级斗争”的“觉悟”。“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公园也不例外。“革命派”把“革命”闹到公园，公园也变成“革命大批判的战场”，谁还敢光顾呢？即使园门免费大开，人们还是望面生畏，1968年8月的南宁公园，已经变成“联指”的“兵营”，在公园中来往走动的是队队荷枪实弹的武斗分子。公园后面的高坡，从坡上一望，便可把南宁全景尽收眼底。这个高坡距离“4·22”的“指挥部”展览馆据点非常近。它是消灭展览馆“敌人”的制高点。但见“联指战斗员们”在树丛后面摆弄六〇炮、加农炮、还有一些老百姓不认识的“大炮”，一箱箱炮弹闪闪发光，有的“联指”兵和解放军分不出你我。据当时的群众传说：驻在那里的是广西独立师。独立师可厉害啦，差不多天天晚上出动，时不时，“4·22”的几个人又不见了，都是他们干的。这或许不是独立师干的，但人们确实这么传说过。

7月8日，天空晴朗，当太阳升得竹杆高的时候，人们看到天边出现两个白色的东西。渐渐地，轰轰的响声越来越远，飞得也越来越低。随着飞机飞过，人们看到飞机的尾部纷纷扬扬地飘出许多白点，白点越飞越远，越飞越低，人们好奇地奔跑过去，争着，抱着，都欲一睹为快。但是当人们拿到手里一看，不同的派别，心情各不一样。“联指”群众看了，认为这“七·三布告”是表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4·22”的群众看了，却感到压力很大。为什么？这几天从《广西日报》到军区领导，都讲“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而且全区各地正在纷纷镇压“阶级敌人”。在宁明，广西军区派部队8个连和联指民兵攻打“上石农总”26天，抓了“俘虏”40多人，通过公安机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4人，判劳改关押4人（于关押中死去），被打、迫害死108人，被判各种徒刑的22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曾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十恶不赦”的“罪证”进行调查，结果，除了派性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他们当时口口声声要反对别人的派性，他们自己“一贯正确”的党性何在？5月22日，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与叛徒、右派、下台干部、走资派等挑起武斗，加上牛鬼蛇神的阶级报复，南宁“工总”、德保“走资派”，车兰县的“走资派”来过凤山“活动”，还有香港特务也来过凤山，因此，他们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的先进单

位——凤山县被广西党内走资派“极端仇视”，“那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请看‘阶级敌人’跳得多么高，这种‘阶级敌人’就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因此，对他们要采取“强硬措施。”

6月1日，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广西常委、国务院侨委副主任）被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游斗，并把他押上街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众。示众之后，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还不够“革命”，还要一阵拳打脚踢，然后使之跪在烈日之下才“革命”，结果李在回家之后神志不清，再加上被“联指兵”赶出家门，当“4·22”老巢被攻破，邕江河水汹涌而来的时候，李老被大水活活淹死。

悲剧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桂林武斗严重，柳州武斗严重，还有武宣县、上林县……

一个接一个的“武斗”，“阶级敌人”被“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统统都被挖出来了……”

7月15日，这个日子，千千万万的南宁人都清清楚楚的记得。清晨显得那么烦躁和不安。从河北望河南那边，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和钢盔的，数也数不清。“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声音震动整个南宁，好象邕江大桥也在摇晃，处在中华路的水塔仿佛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中午12时，随着“最最强烈的抗议”的吼声，“联

指”历数“4·22”的“罪状”之后说：今天“4·22”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居然开枪打死我参加游行庆祝“七·三布告”发表的革命群众多人，“这是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和破坏“7.15”大会的反革命事件，我们要给予坚决的反击，彻底清算“4·22”一小撮反革命的罪行……

随即，“4·22”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的炮轰，一朵朵烟云从解放路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联指”的六〇炮手，昔日熙熙攘攘的广场因为武斗的对抗，变成了老鼠和兽类出没的场所。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短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主人，据当时当权的人说是“阶级成分特别复杂”，这里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是“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所以“炮轰”、把它夷为平地便是“英明”的“决策”。

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准备走到街头巷尾听听一天来使人听过而后怕的消息，听听战争究竟何时结束。张师傅抬脚往门外一迈，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一声巨大的声浪把他的大腿撕断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屋顶一下子升入半空，又重重地落下来压在他的身上……

火像着了魔的疯子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好在，前几年号召备战备荒，深挖洞，沿街附近都有大大小小的防空洞。人们看见炮弹纷纷飞向民房，知道“联指”要斩尽杀绝他们。凭着抗死的本能，为了活命，他们知道，只有朝防空洞跑去。年青人则拿起了武器。防空洞中，他们为战争所逼都已积留了一定的柴米油盐，老人、儿童、妇女是防空洞的主人，好在人们的“财宝”并不多，除了身上穿的，和口中吃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值得希罕的东西。他们静静地坐在洞里，倾听这轰轰的炮声，心里在想着许许多多迷或不解的问题。有的老人问：“他们这样做，毛主席会知道不呢？”是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应该说是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的。即使在这种时刻，人们还是希望有突然事变从天而降……但是，人们听到的是轰轰的炮声，接着是“哒哒哒哒！”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4·22”的广播喇叭随着这一阵轰炸，随即被取消了“发言权。”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广播喇叭声。广播是这样讲的：“‘4·22’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18点55分至19点30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南宁市的居民一般都知道，从解放路到广西军区的桃源路，没有现代的导弹是很难打到的，何况，解放路处在“联指”、解放军炮火的包围之中。

想不到这种破天荒的奇想，善良的人们以为“联指

兵”瞎造出来是只是想用来鼓舞士气而已，谁知竟被当作“4·22”的罪状报告给了中央。

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下午，只听联指的高音喇叭又震耳欲聋地吼叫了。它说，“4·22”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挑起更大规模的武斗，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七·三布告”贯彻落实的铁证……当这些坏人烧毁民房时，我“联指”战士勇猛冲上前去救火，去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却遭到‘4·22’据点的开枪射击……请看阶级敌人的面目多么丑恶……”

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19日，南宁“警司”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报告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4·22”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①组织了指挥所。②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③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21日上午9日至12点，“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

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联指”使用了高射机枪，四〇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当时曾听到“联指”方面的广播，还是说是“4·22”自己用炸药包炸毁的。南宁市革委会也这么说，南宁“警司”的广播和宣传车也是这么说，他们番号、名称不同，声调却一样。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派别”呢？

7月17日，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司”和广西“联指”也同唱一个调，说的是“广西4·22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犯下了“滔天罪恶。”

邕江边的船是那一派控制的呢？是“4·22”，航运工总控制的船。船也是他们自己的，可为什么“阶级敌人”要焚烧自己的船呢？原来这个焚烧船的“阶级敌人”并不是江北这边的航运工总，而是“联指”江南指挥部的炮兵。他们1967年8月曾向航运工总的1431号、1404号船内的汽油开枪，致使203.6吨装的汽油全部毁于他们的炮火之下。68年6月，“联指”又炮轰工总的船只。这是第三次炮轰。166轮船艘被毁于炮火之中，船中装载的3600多吨货物（有汽油、柴油454吨、大米700吨、杉木240立方米，干辣椒50吨，药品和药材165吨，薏米172吨，桐油132吨）全部毁于“联指”的炮弹之下。

战火已经燃起，广西军区接二连三打报告要求“武装掩护救火”，可是上面还是没有“指示”怎么办？

造舆论，接二连三的“战地快报”通过广播，通过油印，通过铅印发往四面八方。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但是“联指兵”还是不敢断然前去“救火”，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暗堡”还没有消灭，而且躲在“暗堡”中的都是被逼上了绝路的“亡命之徒”。这些“亡命之徒”不管“联指”的“政治攻势”如何“强”，他们有的人已经几次吃过“联指”的亏，知道联指的“受蒙蔽无罪”“缴枪不杀”是怎么回事，故而负隅顽抗。尚且，广西军区打给中央的“救火”报告，迟迟不见“批下来”，所以虽然建筑物已摧毁，但是“救火”还没有“救”完。只好相持下去。

这个时候，“联指”的外围“战斗”仍然不断。24日，柳州军分区调动8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4·22”据点，打死146人，共用去现金10万4千多元，吃去粮食5万多斤。

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时间里，他们也围剿“阶级敌人”，打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人民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村居民344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全家灭绝意味着什么？）。

1983年，指挥、策划这场悲剧的军队指挥者虽然受到了应有的制裁，但这种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法西斯行径怎么能使人们忘却呢？

7月下旬，随着工宣队和军宣传进驻学校，进行所谓

“斗、批、改”，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也惨遭厄运。广西大学教职工有 156 人遭到审查批斗，校党委副书记高仕克被南宁“警司”当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斗，并关押在“警司”七年，广西民族学院院长韦章平被毒打罚跪，长期关押，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7 月 31 日 15 时，“联指”开始向“4·22”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攻击，据说此时的展览馆已不是“4·22”的指挥部，“4·22”指挥部已搬到解放路。搬去解放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从一些群众传说中，我们也可探究其中的缘故。

其一说是，军区出面，劝说“4·22”搬出展览馆，那是 1967 年时的事。据说是展览馆有许多重要展品，需要妥善保管，群众组织驻扎其中不便保管等，故要求“4·22”搬出。

另一说是：1967 年 8 月 23 日南宁驻军 6984 部队为支持“4·22”而进驻“4·22”的造反楼、反修楼和展览馆。8 月 25 日驻柳 55 军也发表声明支持“4·22”的“柳州造反大军”，“联指”和军区大为恼火，但是又毫无办法。后来军区通过各种办法，于 1968 年 2 月把 6984 部队调离广西，“4·22”五千多人到军区举行挽留 6984 部队的大会。这是因为有 6984 部队在，无人敢进攻“4·22”的据点。但 6984 部队受军区指挥，不得不调离，离前交代“4·22”不要在展览馆设指挥部，“4·22”听从了驻军的意见而转移了指挥部。

其三是说：广西独立师驻扎在展览馆附近。6984 部队调离后，他们经常袭击“4·22”指挥部，故而“4·22”指

挥部撤走。

其四是说：1968年5月30日，“4·22”部分武装人员化装成解放军攻打了离展览馆只有一路之隔的“联指”林业厅据点，杀死“联指”成员12人，打伤1人，抢走据点里两挺机枪和十多支步枪，并炸坏了大楼和宿舍楼。“联指”发觉后，组织反攻，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4·22”的指挥人员怕“联指”猛扑过来，而展览馆的地势不利于防守，因而撤出了指挥部……

总之，各有各的说法。我们想从当事人口中了解当时的真相，但是没有人愿意谈。

这时的展览馆虽不是“4·22”的指挥部，但是仍然是把守森严，况且展览馆的墙基坚实，房顶也是坚固的水泥钢筋结构，要想打下它，还是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于当晚21时，6912部队2连接到了革筹和军区的命令，和“联指”一起解决展览馆的“4·22”。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用去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解决战斗，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被消灭。“联指”和部队一边开枪一边朝里面冲着，还一边对已停止抵抗的“4·22”人员喝令举起双手，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部队和“联指”被打死6人，伤50多人。

8月2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4·22’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军区某些负责人一边检讨，一边就在检讨的当天，命

令 6912、6966、6936 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4·22”的解放路据点。整个“4·22”控制的 12 条街道，虽被打成一片废墟，但处在灭顶之灾的“4·22”人员仍然拚命抵抗。攻打解放路时焦××亲自指挥，张××、印×是副指挥。

8 月 5 日，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4·22”人员 1340 人，抓获“俘虏”6445 人和居民 2500 人。从被打死的人数，我们可知道当时战况的激烈和残酷。战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死尸，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的有 680 具，就近火化的有 694 具，在朝阳沟掩埋的 75 具，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 52 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6 人惨遭枪杀。

“财司”是“联指”的一个重要组织。5 日下午，为了庆祝消灭“4·22”的胜利，他们吃完酒饭，感到还不够尽兴，其头头随即想出一个歪主意，杀人祭庆！杀谁？“把康兴带上来！”这康兴何许人也？原来是中共南宁市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市人大代表，又是财务方面的领导。此类“走资派”留下来岂不是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患无穷吗？先拉出来，抓住头发向后猛拉，猛扯，让“走资派”看一看“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的喜悦”，看一看“阶级敌人”的末日。“看”完之后，又让“走资派”“低头认罪”这种低头不是自己低头，而是“革命派”们创新的“低头法”，用手把康兴的头打到硬硬的地板上去，直到鲜血满地……刽子手们还不解恨，还要让“走资派”来一下“翻身”“松筋骨”，无数的皮鞋朝康兴的小肚和后腰踢去，有

的甚至用枪托猛砸康的脖子，一边砸，一边喊：“看你还神气……”直到把康兴打得奄奄一息，这些野兽还感到其兽性发作未够，又把康兴拉到单位后的废墟上举行执行死刑判决的“审判”，呼！呼！“无产阶级革命派们”又取得了鲜血铺就的“伟大功劳，”又消灭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头头们提着用人头组成的奖章，登上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宝座。”直到1984年，中央下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这些“功臣”仍未被人们忘却。当“功劳”变成“罪恶”时，凶手们是很想让人们忘去他的“功劳”的。但是，当年他们拿人头作炫耀时，他们未曾想到，对于拿人命作儿戏的人，人们是永远会忘记他的“功劳”的。

8月6日，“市民运联社兵团”即“联指”的一个组织的一名成员，在镇北桥头不幸被冷枪打死。他们怒火万丈，凶手在那里找不到，“民运兵团”的头头便带领部分武装人员赶到关押“4·22人员”的华西大楼，从“俘虏”中推出8人，押到一块空旷地方，让那8个人排好队，举起双手，只听哒哒哒哒，一阵冲锋枪扫射，鲜血滚滚而流……还不解恨，又回到“俘虏”中推出几个去“收尸”。“收尸”的人把掩埋尸体的土坑刚刚挖好，把尸体一个个地放入坑内，8个尸体刚刚摆完，只听站在远处手拿冲锋枪的“民运”分子扣动了枪栓。“收尸”人纷纷扑地而倒……

“88”是现代人说的一个吉利数字，为了这一个数字有的人不惜破费几十万人民币去求得以此为尾数的大哥大号码。可是68年的8月8日，对于广西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发财”的符号，这一天是“联指”消灭“4·22”的

最后一天。“4·22”躲在防空洞中的人员，因为河水暴涨（按联指的说法是“水淹了老鼠洞”。“老鼠们被水淹死不少”），许多人不得不从防空洞中爬出来投降。至此，“4·22”全部覆没。关于江水上涨，有人传说是“联指”在上游放水，目的是要水淹南宁，让躲在地下的“4·22”全军覆没。至于怎样放的水，传说很多，但谁也说不准。不过邕江的河水上涨却是事实。根据当时的《广西日报》报道，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还说，水不断上升超过了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去百货大楼，都要坐上船才能行走，可见水涨之高。而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一场大水，怎么正好这个时候出现呢？而且为什么涨得如此的高呢？是天作？还是人为？人们不得而知。只见随着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尸体漂浮上来。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断木和一些家禽尸体，如今的邕江河水驮浮的是广西千千万万的人尸，从南宁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时候，港澳地区的人们却发现了一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香港、澳门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广西当时的当权者一听，感到是揭了他的“丑”，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横县的西津水电站大坝，可以说是一大“景观”，一些胆子大的群众拿着长竹杆赶到江边，只见一大片人的尸体被拦河大坝拦在上游。用竹杆把尸体拉近岸边，只见有的手脚仍被绳子捆着，尸体已经发臭。有的尸体头上还罩着麻袋，有的尸体没有了头颅，有

的女尸全身一丝不挂。其中有一个木箱漂漂浮浮，打捞者以为有什么“财物”，打开一看，是一个小婴儿，这位小“反革命”放在岸上很久，后被一位乡亲带回去抚养了。按说，这位姑娘到今天应该是20多岁了，也许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也许她正在做生意，也可能正在读大学……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是否已经明白她的身世呢？她是否已经懂得她是来自何方的女儿呢？如果“四人帮”不被打倒，可以肯定地说，会有人非常卖力地去追查这位姑娘的来历的。这是因为卖力追查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功劳”，因为按他们的方法，反革命就是天生的，“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他们的哲学。历史在他们那里已倒退回中世纪的封建时代，可他们却说已“大大前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全面胜利。”因此要庆贺，要会餐，要杀人祭庆。据不完全统计，“联指”攻打解放路、展览馆据点，到8日为止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有265人，区交通学校的711人，南宁幼师的441人。这些人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有2324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和“联指”的炮火轰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子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分社，10000多户，50000万多居民无

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价值 6000 万元以上。

8 月 10 日，南宁“警司”举行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展览分为四个馆。第一个馆叫综合馆，第二个馆叫现场馆，第三个馆是“活人馆”，第四馆是群众观后馆。12 日正式开幕展出，各单位群众在“联指”头头的逼迫下，统统要到区展览馆看这个“反革命罪证”展览。人们静静地流动，似乎不是在参观，而是在哀悼和沉思。当笔者走进第一个馆时，看到许多照片组成的广西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各地“文革”的战况。一是“联指”的伟大胜利，一是 4 个城市“4·22”的“滔天罪行”。人们看到这些熟悉的照片，当然知道什么是“罪证”，什么是“胜利”的“功绩”。纷纷一走而过。进入第二个馆，是“4·22”打、砸、抢、烧、杀的罪证展览。有手枪、步枪，有金钱财宝，有各种长矛、短刀、衣服、粮食……这些实物据说都是“4·22”的，是他们“抢来”的，还有部分照片有“抢、杀”的镜头。最为“生动”的是第三馆——“活人馆”，各馆门口都有负枪实弹的人把守，一进活人馆，气氛更加森严。这里面排列三排，共 26 个“4·22”的“坏头头”。第一排是铁笼排，关人的铁笼只能够一个人站在里面。第一个笼是熊一军，他是工总头目，早在 1967 年广西军区就认定他是坏人，故而支左之时，工总迟迟得不到“左派”的头衔。到 1968 年，熊变成了“死有余辜”的人。只见熊一军双手被捆绑，上身一丝不挂，下身只穿一件现在叫“三点式”的短裤，如果是现在，那些健美表演的人可能还比不上他穿的少。脸发黑、全身肉发黑。8 月份的南宁可是颇冷的。光着身子一站就是 52 天，在铁笼里站 52 天。这是什么刑罚？

是文明社会的刑罚还是中世纪的刑罚？我们不得而知。其他几个“坏头头”也和熊一军一样，被关入铁笼展示，其他各位“铁杆分子”挂上一个大黑牌、捆绑着跪在铁笼之后，分成几行，以供人们“观赏”。这些“禽兽”关铁笼展出后，又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走进第四馆，名义上是群众观后馆，实际上是强迫群众表态馆。每一个单位都有“联指”派的头头站在那里，是“联指”的群众就可以免写“观后感”。如果不是，不管是不是支持“4·22”的，一律要上前写“观后感”，如果不写，或者在写时稍为对“联指”表示不满，那你回来就有“好戏”等着你，也许“第三馆”里又要添上一人……

因为“警司”带头搞“活人展”有“功劳”，广西各地马上纷纷效仿“警司”的榜样，也马上在各地搞起了“活人展”。全区有15万多名干部职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如此的“优待。”

南宁的“4·22”给消灭光了，剩下的是各地的“残余分子”，要赶快捕杀，8月10日，军区首长命令：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7·29”的问题。会后马上调宜山、河池、巴马等9个县的“联指”武装会同6911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3000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7·29”的武器，结果抓捕一万多人，枪杀打死1016人，被杀害的人中有国家干部、工人246人，参加过红军的20人，参加过赤卫队的12人，参加过游击队的117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大队有人遭“联指”枪杀。“围剿”“胜利”后，凤山县革委宣告成立。

8月20日，桂林的“造反大军”也被“十二级台风”刮

倒，被杀死害死 345 人。“造反大军”参加桂林市革委的 22 个委员中，有 19 人被关进监狱。而“联指”的 22 个委员因为杀人“有功”，后来不断得到提拔。

接着，全区的“4·22”只剩下一些“残匪”。例如凤山县的“残匪”居然跑入深山，有的甚至带炮跑入深山。“联指”故技重演，假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并强迫“残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残匪”韦明景被父亲动员下山，第二天韦明景便成了枪口下的鬼（年仅 17 岁），从此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广西军区怒火万丈，下令派兵围剿那三兄弟，居然从 1968 年围剿到 1982 年。

67 年 10 日，广西全州县在极左思潮和派性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仅全州县一个大队，两天时间集体坑杀 76 人。

10 月 2 日至 4 日，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和“联指”组织头头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对民兵班、排长们说：湖南道县有杀地富的情况，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的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受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

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1985年元月，这个“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法官”被处决。

2. 8. 广西善后会议

广西的武斗以“联指”全歼“4·22”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未一了百了。胜者为王自然高兴，败者为寇却不大甘心，因而“武斗”刚刚结束，“文斗”又开始了。

“联指”以胜利者自居，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愤怒谴责“4·22”派的“反革命暴行。”据1968年6月8日出版的《梧州联指》第四期的一篇文章报道说：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梧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一万多战士和革命群众，在市体育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对敌反击战”的辉煌胜利……

九时，大会在《东方红》宏亮歌声中开始。

梧州联指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梧州联指在四、五月份歼灭反革命武装暴乱，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对敌反击战战斗总结”报告。

联指代表用了大量的事实，指出中南井匪是一个“仇恨共产党，仇恨革命，仇恨人民的反动集团。”这个集团疯狂地屠杀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大肆纵火焚烧国家人民财产（梧州房屋被烧三分之一多）；枪杀前往救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使壮丽的梧州山城遭到了残酷的破坏和洗劫。梧州联指

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反击是完全正义的，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

.....

“联指”在这里所说的“中南井匪，”指的就是“4·22”派及其军代表。

关于1968年4月29日发生的“火烧梧州”事件及“联指”在广西各地对“4·22”展开围剿的详情，“4·22”派发表了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意见。7月上旬，“4·22”刊物发表一篇题为“南疆在呼唤”的求救文章，不妨抄录如下：

提要：“联指”发动武装民兵围攻柳州、南宁、桂林，五十六个县市惨被屠城，造反派至少五万多人被杀，小将走投无路，纷向云贵两湖粤赣各地逃亡。

广西四·二二在浴血奋战（原题）

红河在咆哮，南疆在呼唤，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变色龙、小爬虫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利用他们尚能掌握的一小部分权力、部门，纠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刮反革命右倾翻案妖风，并煽动其不明真象的群众，对造反派施行反革命大屠杀，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看，从东京湾的北海，东兴，到桂北高原的灵川、龙胜，从云贵高原到珠江平川，处处烽烟滚，炮声隆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正在自治区各地进行。多少忠于毛主席的四·二二

战士和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惨死在广西联指的屠刀下，倒在血泊中……。

南疆烽烟弥漫，红河鲜血滚滚。

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大屠杀（原题）

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一手摇着橄榄枝、高叫大联合、三结合，一手挥舞着屠刀，不断地持续地在各专、县城镇和农村中大肆屠杀，时而屠杀这个专区某县，时而屠杀那个专区某县，时而集中几个县，十几个县甚至几个专县的坏人，以闪电式的办法来攻打一城一池，时而把力量撤回以欺骗中央和蒙骗群众。他们为了实现罪恶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战略阴谋大批地屠杀农村中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人民群众。他们或明或暗打着反动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变种的牌子，任意抓打和屠杀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四月底，广西八十六个县市，就有五十六个县市被踏平屠杀，在被屠杀过的地方，白色恐怖笼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迫逃往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数以万计，仅南宁市和柳州市的就达二万多人，死在阶级敌人屠刀下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已达五万余人。到目前为止，屠杀仍然在进行着，最后剩下的柳州、桂林、南宁三大城市的四·二二造反派，被反革命两面派调动大量武装民兵包围，处境万分危急。

在桂西，云贵高原的凌云县，今年二月遭到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其操纵下的联指中少数坏头头进行突然袭击。

二月十二日，凌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纠集全县各区和乐业县的武装民兵近千名，配合轻重机枪，突然向四·二二凌云大军袭击。大肆逮捕屠杀凌云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四·二二凌云大军当时手无寸钱，毫无防备，被迫外逃。

在凌云城当天被残杀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有刘承禧（大军总负责人之一），曾庆鸿（大军战报编辑）等八人。那些逃出去被抓、杀的无法统计，在城里抓去准备杀的七十多名工人和干部正巧遇当时去接新兵的×××部队的解放军战士抢救，才免于受害。继城里屠杀之后，又对农村中参加四·二二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开刀，据初步统计，已被杀害的有103人，被逮捕近300人，被迫外逃的有3000余人。

凌云的怒火冲云霄，凌云的血债要偿还！

边城惨案（原题）

今年元月下旬，与友邦越南接近的边城靖西，发生了一场悲惨的大血案。

从元月二十四日起，靖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调动了全县的武装民兵近万名，把靖西城团团围住，用轻重武器，六〇炮，炸药包等攻击四·二二造反派据点。二十六晚攻下四·二二据点后，二十七日在全县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上午八时，大批的联指武装民兵，挨

家挨户搜查，一家人凡有一个参加四·二二的，都抓去押到体育场、农械厂、镇西小学等地审问、毒打……陈汉腾、周日雨等红卫兵小将，在二十六日晚突围出郊外，被联指暴徒抓着，二十八日被暴徒用冲锋枪扫射，残酷杀害了。

四·二二战士、县水电局技术员王洪仁同志被暴徒脱光衣服，抢去手表，强迫他下跪，王洪仁同志指着胸膛说：我就是四·二二，我有什么罪？朝这儿开枪吧！四·二二战上是杀不绝的！暴徒竟朝他胸部开了几枪，然后把他的头和脸砍得血肉模糊。

四·二二战士、气象站职工小杨，被暴徒从气象站绑架后，一路高呼，“毛主席万岁！”“四·二二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口号，狠毒的联指暴徒，当过日本汉奸的梁峰向小杨连开几枪，小杨同志倒下了，但又猛然站起……梁峰这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日本汉奸，又朝小杨开了三枪，英勇不屈的四·二二战士小杨，壮烈地牺牲了。

工总常委，拖拉机站工人黄华强，被联指拖出站外枪杀后砍头示众。

四·二二战上，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覃伟民，被联指枪杀后，把尸体砍成三截丢进牛粪坑里。

赤膊上阵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场大屠杀的靖西镇××部队，××，抓到城郊大队贫农社员黄定伟，连开了四枪，黄定伟同志没有倒下，他睁眼怒视这个杀人魔王喊：“打倒××！”杀人不眨眼的××朝黄定伟同

志头部又开了几枪……

血！四·二二战士鲜红的血啊，染红了秀丽的宾山，染红了清澈的龙潭水！这一场大屠杀，夺去了近百名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的生命，多少人被迫逃离家乡。

血洗宜山（原题）

北山昂立，龙江怒吼，宜山县是桂西北的一座山城，屹立在龙江河岸上。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广西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曾调动了两个专区二十个县的数万武装民兵围攻宜山城整整四十八天，但都被宜山的四·二二战士英勇地击退了。

但是广西的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死心。今年三月，他们看到宜山大军已经全部上交武器，觉得时机已到，便调动罗城等十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备轻重机枪，大炮等再次围攻宜山城。

他们采用围攻罗城造反大军的残暴办法，三月八日、九日用六〇炮和高射机枪轰击炸平城西一带的百余间民房，宜山大军枪少弹尽，被迫退守西南方一带四方楼据点。联指暴徒，于十日开始向城内进行大屠杀，他们把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居民从屋里抓出去，数百人举手跑在十字街头，然后将城内居民赶到城西农林局、城东××医院集中，不管男女老少统统举手低头，不准旁看，动则枪撞拳击。暴徒们认为是“坏人”的就抓去枪毙。水电厅设计处四·二二战士曾中

充等五人就是被从赶往城东的群众中抓去，在牛挡路旁枪毙的。四·二二战士蓝××被枪杀时腹中正怀着几个月的婴孩。支持四·二二的医学院年轻医生丘卓勋，赖×因为给四二二战士治伤，就被这群法西斯暴徒认为是给“土匪”看病，一定不是好人，从屋里拖出去枪杀了。红卫兵蓝××及无数的工总战士和居民被枪杀在街头。当天的四个多小时里就百余人被杀害，暴徒装满了五卡车的尸首运到西郊三合村的土河弃置（编者按：如果此说可信，这就间接证实了港澳浮尸来自广西）。

十二日，暴徒占领了整个县城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城。被轰毁的照相馆的房顶，悬挂着被炸居民的手、人头。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士大量被迫外逃，整个山城凄惨万状。而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深夜的城郊不时地发出乒乓的枪声。这就是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噩耗。四·二二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龙江河水，洒满了宜山县城。

继三·一〇大屠杀之后，三月下旬，宜山硫磺矿的一千多名四·二二战士，又遭到血洗。他们仅有四条枪，坚守了七天七夜，牺牲了二百名战士，最后大楼被炸平了，他们又转入地洞。但是地洞被挖开了，战士们被迫突围，七百多名战士突围出来时只见三百名，沿途被冲散、抓走，最后到南宁只余下一百多人！

宜山，在广西反革命两面派，联指暴徒的血洗之下，夺去了数百名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的生命。

三光暴行重演右江革命根据地（原题）

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右江地区这个革命根据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的英雄儿女继承了前人的光荣传统，英勇的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战斗，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对她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今年二、三月起就对这些地区残酷地实行了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在巴马、东兰等县的西山、甲占、乙墟、燕乐一带，许许多多的四·二二战士被围歼，许多四·二二战士的家被烧毁，东西被抢光，一个人参加四·二二则全家受累。所略区有一位革命老人谭××，他们的三个侄儿都参加四·二二被联指暴徒抓去杀了。暴徒们又到家中把这位老人绑架起来要拉去杀，这位老人被迫拉响手雷与暴徒同归于尽。有些地方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被迫跑到山上去躲，联指暴徒就在山脚下放火烧山。在巴马、东兰、平果一带的城镇和农村，随便被惨杀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不知多少。

在巴马、甲占区，三月中旬被杀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在巴马那桃区，三月被杀的就七十六人。在巴马城车站，一次客车刚到，联指暴徒就蜂涌而上，把参加四·二二的或被怀疑的共十九人拉到一旁就地枪杀。

平果县城关区雷平公社的一个数十丈深的洞里，每天都有数具或数十具尸体浮上。

平果县反动势力的某些人甚至订出：民兵进城屠杀时，每天给人民币三元。抓到一般的四·二二战士

得一百五十元，抓到四·二二负责人得一千五百元。就象国民党××派“清剿”右江苏区时所采的“悬赏”一样。

对四·二二力量较强的凤山县，则调动几个专区数县的武装民兵去围攻，直至现在还把凤山县团团围住。

白色恐怖笼罩着右江老革命根据地。右江地区的革命人民在流血，右江地区的革命人民在呼唤！

火烧梧州（原题）

座落在西江、桂江汇合点上的美丽水乡梧州市。她是广西通往广东的门户，是对外贸易的港口。数万名四·二二战士组成的梧州造反大军在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集中数万兵力的袭击下，被毁于漫天火海之中。

从四月十三日起数万名武装联指暴徒向四·二二梧州造反大军驻地发动了总攻击，到十八日攻打不下，就灭绝人性地使用凝固汽油弹。整条街日夜不停地燃烧，十三条大街，三千余间民房被焚成灰烬，美丽的梧州给葬送了。四·二二梧州造反大军指挥部被攻破了。多少英勇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多少各民族人民的好儿女，多少革命老人、妇女和小孩倒在联指暴徒的枪弹之下，葬身在梧州火海之中。就连躲在水道下的二百余名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也不放过，这伙暴徒在施放高压电和毒瓦斯的同时把洞口炸毁，惨无人道地把四·二二战士处死于地道中。

梧州造反大军驻地暂时失去，但是梧州造反大军

却没有被消灭，她们继续在战斗。不揪出广西的杀人魔鬼，不揪出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梧州造反大军战士死也不瞑目！

今日的法西斯（原题）

见过日本鬼暴行的人，想起当年的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无不怒火满心头。然而在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操纵下的广西联指暴徒的暴行却更胜过当年日本鬼子也！

陆川县一个叫良田的地方，联指暴徒在三月二十七日的那天，一次就集体屠杀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三十九人。

县莲塘区路边联指暴徒一次就用机枪集体屠杀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九十多人。

在灵山县的大屠杀事件中，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被害的竟达到一千多人。在这个县的平友公社，联指暴徒把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五十九人硬塞进瓦窑里，安上炸药包活活地把他们炸死。

桂林工总×××被暴徒抓到后活生生地被用开水来烫死。在马山，一个年轻的母亲被联指暴徒枪杀后砍去头脚挂在一旁，她背着一个未满一岁的小孩在哭啊、喊啊，没人照管，就这样活活给饿死在母亲的尸体上。

在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进行残杀的同时，对于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实行法西斯屠杀，在钦州专区一次就杀了科、局长以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十二

名。许多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部长等级的革命领导干部，在大屠杀中被联指暴徒或明或暗的给杀了。

四·二二战士在英勇奋战（原题）

广西四·二二战士被杀绝了吗？没有！四·二二战士在奋战！每座城池，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在喷射着四·二二战士愤怒的火焰！

看！四·二二战士英勇的自卫战！

博白：这个座落在桂东南平原上的一个小城镇，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数千名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二二战士实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在摧毁了周围县乡的革命造反派之后，就调集了全专区各个县和梧州等地受蒙蔽的武装民兵三万多人来围攻。博白的四·二二战士被迫退到一座大楼房里，联指暴徒就把大楼团团围住。发动了数十次进攻，但都被击退。我英勇的四·二二战士和红卫兵小将们日日夜夜地坚守在这座红色大楼上。

联指暴徒要用炸药来炸大楼，但是却被我英勇的四·二二战士迎头痛击，上来一个被消灭一个。一个被蒙蔽来参加武斗的民兵扛着炸药包冲上来，守卫大楼上的红卫兵小将喊：不要上来，来者必歼。但他不听硬要上来，红卫兵说，你再上前一步我就要打断你的左手。暴徒不听，刚上一步，一声枪响，左手被打断了，炸药包掉在地上。

又有一个受蒙蔽的民兵行上来，红卫兵喊：你再

上就打断你的左腿。暴徒不听，刚迈一步，一声枪响，腿骨被打断，动不得了。

联指暴徒屡次攻打不下大楼，于是就运来了国防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大炮，还开来了坦克。暴徒们先用可射穿几道墙的高射炮和一百多斤重的炸药包来轰大楼，再用坦克车开路。

顶层楼给炸垮了，战士们转到下一层；下一层又被炸垮了，就转下最底一层。最后大楼被炸平了，但是不屈的四·二二战士们就转入地洞里去继续战斗。

在地洞里没有粮食、没有子弹，洞口又被封住。为了打开一个缺口突围，他们在地底朝联指暴徒据点挖去，不巧和联批暴徒挖过来的地道相通了。但我四·二二战士英勇机智，向联指进攻乘胜追击，缴获了联指的一批枪枝弹药。

二月底，在地洞里坚守着的四·二二战士和伤员，他们已好几天没有看见粮食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战斗，他们是多么的想念北京，想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他们围在一起低声唱着：

北去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哎

写封信到北京，

四·二二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驻在当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这紧急关头，为博白的造反大军打电报给党中央、周总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复了电。周总理指示××××部队要速派一连部队去保护造反派。

整个博白欢腾！革命群众得到消息后纷纷送衣、送粮、肉、蛋等来给四·二二战士，他们路经联指据点时，联指对群众说：五角钱买一个蛋。群众说：再给多也不卖给你，把钱放满我们的篮子也不给你。

有个老太婆今年九十多岁了，是个五保户。她做了四个大粽子，每个五斤重，赶了二十多里路送到四·二二驻地。四·二二战士知道老太婆是五保户后就不肯收下老太婆的礼品，老太婆急得哭起来。最后还是收下来，但谁也不肯吃，最后，这几个粽子成了纪念品。

英勇的博白保卫战最后取得胜利了。虽然有不少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战士离开了人间，但是他们的事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却像日月星辰那样，照耀千秋万代。

活着的战友将永远纪念你们（原题）

马山县到处是重山峻岭，马山的四·二二战士一个个像屹立的高峰！

今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下旬，整整一个月时间，广西的反革命两面派，调动两个专区，好几个县数万名的联指武装民兵围攻马山的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马山被攻下了。五百多名四·二二战士和革命群众，倒在联指暴徒的屠刀下。余下的组织突围。通过联指的层层封锁，道道关卡时，又有一批好同志倒在路旁和山野上。

有三十六个红卫兵和工总战士在突围时被追赶包

围在一座高山顶上。在弹尽粮绝时，山下的联指暴徒纷纷狂叫，并向上发射子弹冲上来了。

投降吗？缴枪吗？做俘虏吗？不！四·二二战士决不能低下革命头，大家举手宣誓：“生为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革命路线而献身！”就是这样！一切可耻的懦弱的念头都否弃了，三十六名四·二二战士，在这南疆的高山绝岭上最后一次情深地向北京探望，然后一个个的从高山峻顶跳下……四·二二战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呼声，永远地、永远地回响在祖国的南疆！

这篇文章虽说是“4·22”派的一面之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双方“武斗”的残酷情形。

事后，“4·22”和“联指”各派代表“上京告状。”为彻底解决广西地区的派仗问题，1968年7月25日下午1时5分至6时15分，周恩来、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双方代表，协商解决分歧。据香港出版的《红卫兵实录》一书记载：

康生：“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全国。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跑到阴沟里去活动。我要问同志们，你们如

何执行‘七·三’布告？刚才同志们不是喊过忠于毛主席吗？但是同志们不来，或者来到北京不到学习班住，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尽量讲。但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来不是打官司的，不能讲条件，更不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讲条件。广西问题，铁路不通车，拖了两个月之久。我现在要问问你们：你们反美不反美？（众答：“反！”）你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众答：“支持！”）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你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革命！希望你们有的人不要耍两面派了！有的人已走到边缘，再走下去就变修了！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黄永胜：“你（指朱仁）要讲老实话！”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什么黑会？搞了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陈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康生：“你是什么地方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什么成份？（答：“中农”）地主也叫农民，富农也叫农民。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

业的？（答：“六〇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那你到广西很久了，谢王岗是你的上司吗？（答：“没见过。”）在北京见过吗？（答：“没有。”）你说没有见过是撒谎！”

姚文元：“你还没有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周恩来：“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是……”

周恩来：“现在铁路要恢复通车，首先要停止武斗，那派也不要侵占地方。对‘工机联’、‘造反大军’的考验就是要把抢去的援越物资，全部交回，把抢去的枪全部交回。‘联指’也要把抢去的枪交回。不然，恢复铁路交通就无法保证。双方在这里开会，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听从解放军指挥，由解放军全线护路。‘联指’张林、张麦生你们能负责吗？（答：“能！”）你们也不要跑到南岸去。（答：“没有”）柳州铁路大桥，由解放军接管，两派撤出。今天是二十五日，你们两派二十六日要达成（柳铁）协议……南宁、桂林铁路来的人与柳州合在一起，由铁道部军管会、总参军交部的同志，同你们一起协商讨论，立即达成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解放军来的人，也参加签字。”

“造反大军”代表：“‘联指’抢了六千多支枪。”

周恩来：“有没有这件事？”

“联指”代表李年生：“有这件事。”

周恩来：“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象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好嘛！”

“4·22”代表刘振林：“‘联指’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周恩来：“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在一起，搞一个协议。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了没有？”

景伯承：“已检讨”。

康生：“（对景）我听说你检讨得不大好哩！上次开会是点了名的。你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我看你是‘联指’的黑后台。”

黄永胜：“是后台，两边都有，一四一师也是后台。”

周恩来：“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区的，要把桂林市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周恩来：“（问一四一师的韩更）‘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韩答：“不知道”。）”

黄永胜：“你们一四一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康生：“我有个要求，要求你们思想上首先懂得你们来北京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各派都带来了很多材料和你们认为的证据。你们来的目的，是想打官司的，作为打官司的依据。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是来打官司的，若打官司，广西搞成这个样子，全国人民同你们的官司是打不完的。你们不是有‘控诉团’吗？全国人民的控诉比你们大得多！”

谢富治：“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对广西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

康生：“你们不要只看到南宁、桂林、柳州，你们要看到全国。‘七·三’布告到了上海，工人看了大吃一惊！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广西有这样一些事情。你们脑子里就没有一点敌情观念！刚才问你们反美不反美，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你们口里讲反对美帝，实际上不反。你们口里讲支援越南人民，实际上阻碍援越。你们口里讲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口里讲揭露“反共救国军”，实际上帮助他们。口里讲反修，还有人的名字叫王反修，实际做的是修正主义高兴的事，不管主观如何，客观上帮了修正主义的忙。你们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实际上是反对，不仅在你们那里有人反对，你们在北京居然贴大字报、标语，向我们示威，向北京七百八十万人民示威！你们没有敌情观念，不顾大局！两派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某些军队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也有这个问题。你

们不要只想你打死我一个人，我打死你一个人，要想想大局，要想想敌人，恰巧他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想想这个呢？”

在这次“广西善后会议”上，唱主角的实际上是“中央文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涉及到广西武斗的一些冤、假、错案才逐步得到重新处理。

善良的人们啊，请记住这带血的教训！

第三章 广东战火

在广西血战惨烈的同时，广东也不甘落后，造反派一边夺权，一边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其惨状不堪入目。阳江血泪，海丰厮杀，此起彼伏……

3. 1. 两起所谓“严重的政治事件”

广州的局面也一天天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自8月下旬，红卫兵冲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捣毁黄花岗烈士墓碑顶端的“自由神”，手持“自由神”之头发表宣言：宣称“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今天决不能再毒害人民。广州市内到处是标语、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到处集会演说，发通令、倡议书，改地名，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式，甚至冲击寺院、古迹，抓人、揪斗、抄家、游行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

从北京南下的大学生，横行广州，到处煽风点火。8月31日，清华大学南下的两名大学生给中共广东省委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互相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10月初，北京来的“首都红卫兵”在广州印发两张传单，指责广东省委把运动引人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认为省委“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派，打击了左派。10月19日，

华南工学院红卫兵“强烈质问省委”，指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说他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省委不敢出来制止。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入广州。一些中学红卫兵在各招待所中大吵大闹，闹伙食，闹待遇，强行向单位借款，纠缠不休，甚至随便抄家，对现金、金银，衣物等抄走不给收据，不登记，对方不服即大打出手。有的红卫兵离开广州前还抄一次家，抄得财物即带走。这是大串联的恶果之一。恶果之二，是造成了交通的混乱，由于火车车次有限，许多学生滞留广州，北上不成便日夜赴省委吵闹。许多步行串联的学生，由于走肿了脚，要求乘车。在这种情况下，广州站更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1966年11月16日晨，一列火车刚进站，万余红卫兵便拥挤抢车，当场踩死一名女生，数人受伤。恶果之三，便是外地红卫兵在当地“闹革命”，与当地产生摩擦，酿成武斗事件。1966年底发生了两起殴打外地学生的“一二·六”、“一二·七”事件，当时被红卫兵称为是“两起严重的政治事件”，“罪魁祸首就是大名鼎鼎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据香港《天天日报》刊载的当时红卫兵“内部通告”披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二·六事件 十二月六日下午三时许，上海红卫兵“打狗队”在龙津东路破四旧，三时半他们在二百零四号（接待站）对面看到两个青年，不象工人，也不象学生，其中一人穿尖头皮鞋。红卫兵就向穿尖头皮鞋的人指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属于四旧。”但这人态度十分傲慢，对红卫兵的指责置之不理。

这就激起了“打狗队”同志们的愤怒，要求他把皮鞋脱下来，但这人硬说他的皮鞋不够尖，不属四旧之列，拒不交出皮鞋，并肆意逃走。这时，“打狗队”一队员把这人的皮鞋夺去一只，于是这人就抓住那队员的两只手臂，狠狠地向他肚子上蹬了两脚。同学们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反而诬说：“红卫兵抢皮鞋，打了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外地学生打了本地人，都纷纷赶来。有的说：“现在不是破四旧的时候，要破也不需要你们外地师生来破。如果要破，我们广东人自己破。”有人又说：“你们抢皮鞋，是武斗。”于是，推推拉拉，把那几个红卫兵团团围住，为了避免武斗，“打狗队”的同志们冲出层层包围，回到接待站。

但此事并未结束，穿皮鞋的人带着一、二百人吵吵嚷嚷，大叫大喊，一直拥到接待站门口，扬言要“交出凶手”。这样吵了很久，穿皮鞋的人走了。但这时吵得更凶，一部分人歇斯底里地嚷道：“交出皮鞋！”“交出凶手！”“我们广东人联合起来，打死外地人！”他们一边呼叫，一边往里冲，在接待站住宿的外地革命师生知道这事以后，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文斗，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不要用武斗。这时，第一层的玻璃被他们砸碎了，接着又砸二层门，把门打破了一个大洞，有几个人还用大石块砸门。当时，住在接待站内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同学拿着毛主席语录，对大家说：“要听毛主席的话，有什么事，摆事实，讲道理。”可是有一个却从洞里伸手把他的语录本夺了过去，摔在地下，连声斥骂：“混蛋！”“他妈的！”这

时门拉开了。外面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喊打声：“打倒北方串联学生！”“北方串联学生滚回去！”“混蛋！”有人还喊“打”！这群暴徒不分青红皂白，将外地学生推推拉拉，朝外地学生身上拳打脚踢。

这群暴徒冲进屋里，捣坏了家俱，开了电灯，又往楼上冲。上楼后，用弹弓打人，用石头乱砸，摔墨水、打茶壶、茶杯、撬邻居门板，打开水龙头，使水流满地；往楼下扔东西，还破口大骂说：“串联同学扔东西。”这群暴徒还打碎花盆，折断和毁坏花木，打破水箱，打断铁丝，把串联学生衣物乱丢。在接待站外边，凡是外地学生都受到围攻，遭受殴打。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总站的宣传车刚到现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却被暴徒们团团围住，车上工作人员许多被打。如××同志就挨十六拳，棉衣被撕破……

十二月七日深夜一时左右，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急忙穿好衣服跑到楼下，看见我们宿舍同学用椅子把门顶上，外面有人正在“砰、砰、砰”打门。当时，我向大家了解情况以后，说：“同学们，我们都是在党和毛主席教育下长大的，我们一定要听党的毛主席的话。挨打，不还手，挨骂不还口。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手打人，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都说：“对！”

这时，外面已经把第一层门的玻璃打碎了，又砸第二层木头门，这时我和几个同学主张把门开开，还没有商量好，门已破了一个大洞，有几个还用直径十

五厘米的大石碰门，我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对他们说：“咱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有什么事，摆事实，讲道理”，可是一个人却从洞里伸手把我的语录夺过去摔在地下，一边骂：“滚蛋！”“他妈的！”

我和几个同学在这种情况下，把门打开，我站在门口对他们说，“有什么事情，我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摆事实，讲道理。”人群静了片刻，立即又爆发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打倒北方串联学生！”“北方串联学生滚回去！”“混蛋！”还有人喊“打！”接着就有人把我拉了出去，一些人就乘机往屋里冲。

把我拉出去后，拳头就象雨点一样打在我头上、前胸、后背，还有些人用脚踢我，一边还蛮横不讲理地骂我，并一把抓下我的眼镜。我始终举着语录本，连声喊：“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打人”。可是这一群人把我拥来拥去，这个打几拳，那个打几拳。我说：“大家不要受坏人挑拨，串联的同学绝大部分是好的，广州群众绝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不要发生冲突，不要发生冲突！”

后来，有些工人把我围起来，他们也纷纷喊：“不要打人，不要打人”，“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人想从人缝里打我，有的工人就推开他们的拳头。这时有一个工人，一个转业军人，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有些工人对我说：“走吧！”“跟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就把我送走了。

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大多数是十六岁——二十岁的青年人。打我以后两天了，我的头

还很疼，我相信广州革命人民一定能把一小撮捣乱分子揪出来，一定能克服这些牛鬼蛇神的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师范学院 姜昆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

十二月六号五时左右，我到食堂去吃饭，吃完饭后回住处（向阳路二零四号接待站）。当我走到二零四号门口时，门口挤满了很多人（我去吃饭时没有这么多人）。我想进屋去，就叫他们让开一点，他们不但没有让，反而回过头来打我，我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一时闪也闪不开，被打了几十拳。当有几位同志把我拉住，才没继续挨打。这时一位接待站的同志把我拉进了接待站，进屋后我仍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打我。

上海黎明中学 张治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

十二月六日下午四时左右，上海红卫兵“打狗队”在街上破四旧，看到一个穿尖头皮鞋的人，就问他：“看你自已穿的是什么鞋子。”但他理也不理，一直向前走，后来被问得没有办法了，就自已把鞋子脱下来，马上递给他们的同伴，要他的同伴快跑，自已拉住同学。这时就有一位“打狗队”的同学跑上去拉住那个穿尖头皮鞋的人，叫他不要跑。这人回头看是什事情。这时候，我从后面跑上来，站在这个穿尖

头皮鞋人的后面；看到他坐在地上。我顺手从他的屁股底下把尖头皮鞋拿了出来，并举起来让群众看。这个人马上站起来转过身子抓住我的双手，用脚狠狠地朝我的肚子蹬了两下，还想用拳头打我。这时，在场的群众把我拉开了，我才免遭毒打。当时我的肚子被踢的很痛，直到现在（十二月八号）被踢处仍很痛。

当我回到住的接待站，只见门口围了很多人，都踊跃着要冲进去。当时只有一个接待员守门，我也站在门口。这时有人乱挤并扔石头，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捣乱？那知这一来，马上就有一个穿蓝衣的人把我拉了出来，打了我五六拳，后来我校同学来了，把我拖走。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是铁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湖南衡阳二中 沈贵子
一九六六. 十二. 八.

一二·七事件 十二日七日晚上赵紫阳正在我联络站举行会议，我们几个六日晚遭到围攻毒打的同学向赵紫阳控诉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控诉未完，我们又接到电话，在《红卫报》社门口有二、三千人在那里围攻，殴打横扫四旧的外地红卫兵。一个红卫兵无故被打昏送进医院，另一个红卫兵被打得皮青头肿，站在台上求救。这时《红卫报》社中有个工人同志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保护这些红卫兵战士，结果竟遭一顿无理毒打。一个广州“八·一”中学的同学为了进行调解也冲进去解释，一小撮暴徒听见他非本地口音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十数只拳头打在他的头和身上，当这同学一再说明自己不是外地人而是广州“八·一”中学的学生后，他们才停止，并在一片“老兄，老兄，生在湖南，死在广东”的煽动性的呐喊声中把他赶出来……

当我联络站同志闻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南局和广东省委，中南局书记处金明同志和省委赵明一同坐宣传车赶到了现场。这时现场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宣传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播“广州的工农兵、革命师生们，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外地革命师生横扫四旧”，立刻遭到了自称为工人、革命群众的的人的围攻。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纷纷爬上宣传车，车的前身和后尾都坐满了人。他们隔着帆布狠打我们的广播员。这些暴徒切断了我们的广播线，随后又强行撕开帆布棚，狠狠地乱打我们的广播员。其中一位男同志通身遭打，棉衣被撕破，钱包被抢走。他们还抓着头发，把它剪下来。另一个女同学被一群暴徒无理地又推又拉，拳打脚踢，还有的同志腰部被打伤……

暴徒对学生的围攻，持续到深夜两点半钟。

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二·七”事件中，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工作人员受害情况。

汪家意 衣服右下边连口袋一起被扯得稀烂，里面钱包被掏走，丢掉钱四十元，粮票七十多斤（即一百多天的

外出串联钱，粮票和学样的补助费)。

- 胡长青 打掉一副眼镜
周汉谟 被踢两脚，被拉头发，有人从暗处踢其肚子
黄促坚 腰部被打八拳，被揪三下
乔瑞贞 两次到现场，均被拳打脚踢
陈忠年 被猛击数拳，裤子上扯破了一个口子
郭小华 浑身挨打，肩部被咬伤
徐勇 头部腰部挨打不知多少拳
丁占才 丢失钱包、学生证、介绍信、像片、钢笔一支、饭票二天、粮票十斤，被打十来拳，袖子被扯断

3. 2. 造反派夺权

11月下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广东省委和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处境日益困难。11月23日，中山大学“红旗”等群众组织批斗了赵紫阳。28日一些群众组织到省委大楼静坐，抗议赵紫阳“拒不参加”省委机关群众批判省委的大会。12月许多群众组织又召开了两次10万人大会，“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紫阳等省委的领导被迫前往接受批判。

12月下旬，广州的红卫兵造反活动逐渐升级为“炮轰”、“火烧”，使得省委无法正常工作，省委书记的住处及办公地点经常变换，以防红卫兵冲击。

1967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使广州各界震动很大，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加速了全面混乱。

元月11、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肯定和支持了上海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林彪亦煽动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在强烈的政治鼓动下，得到全国闻名的“左派”组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的驻穗联络站支持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于1967年1月21日至22日在广东省夺了权。“省革联”以中山大学“红旗”为主，包括若干个群众组织。

1月21日傍晚，“省革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入省委党校，将正在那儿开会的赵紫阳等几位省委书记强行绑架到“省革联”总部中山大学，并强行夺了省委的权。22日他们把省委、省文化革命小组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大印夺走了，同时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他们的“夺权通告”，宣称：“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

但是，这些红卫兵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领导这么一个人口接近四千万的大省，同意了赵紫阳等省委领导提出的监督他们工作的夺权办法。所以夺权后的省委仍然办公，

处理日常事务，红卫兵仅保管了省委和省文革的两枚大印，需盖印时，由他们负责盖。

“省革联”夺权后，又匆忙向省委各机关派出自己的“监督小组”，监督原“当权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其他造反派的不满，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严重的是这次夺权未得到以黄永胜为司令员的广州军区的支持。1月25日，“省革联”派驻广州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负责人与“广州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的负责人之间发生权力之争。当日，“省革联”调集上千人冲击市公安局，与“一总部”人员发生了流血冲突。26日凌晨，广州军区插手，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广州军区对市公安局进行军管。

2月2日，“省革联”所属人员为了控制广东省广播电台，与广州军区的军管人员在电台发生冲突。8日，“省革联”又冲击广州军区机关，进一步激怒了广州军区。于是，广州大部分的造反派组织在广州军区的支持下，纷纷起来反对“省革联”。2月19日，广州5万多造反派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声讨“省革联”，要夺“省革联”刚刚夺到的大权。

在争权混战中，由“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与反“省革联”派控制的《南方日报》大打文字仗，互相攻击，直至2月28日，广州军区明确表态，对《广州日报》实行军管，这场争斗才以“省革联”垮台而告终。

3月15日，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主任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军管会”成为广东省的最高权力机构。

2月28日广州军区对《广州日报》实行军管前后，广州市内治安十分混乱。2月25日，广九铁路石龙桥附近的路轨被炸毁，致使当天上午由广州开出的火车误点。广州军区号召市民加强对破坏路轨的坏分子的检举和揭发，并派人与警察分布各区，加强防范。

3月，广州市“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造反派间的冲突亦日益严重，大部分的工厂均已停工。在实行军管中，由于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所以造反派间的冲突中又增加了与军管人员的冲突，流血事件屡屡发生。同时，各派开始在自己的据点修筑防御工事，以防冲击。

3. 3. 武斗迭起

成立广东省和广州市军管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广州市的各级党委，解放军开入了各机关、工矿企业，领导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制止“经济主义卑鄙诡计”的行为，清除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坏分子，这些行动，在一些工厂里受到了抵制，触发了多场武斗，严重影响了生产。

3月15日，在一次庆祝广州“大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大型集会上，军区负责人对支持“省革联”的人说，他们必须缴出他们的武器及炸药，加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间隙。

此后，“省革联”退至郊外，继续与占领市区的受军区支持的造反派抗衡。郊区工人与部队的冲突已层出不穷。各种大字报、传单、谣言、密闻铺天盖地，各派高音喇叭互相攻击，唇枪舌战，真枪真刀，闹得腥风血雨，老百姓一刻不得安宁。军区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由全部支一派转而

各支一派，形成对峙，同时展开了“应否公开批判刘少奇”的争论，并发生冲突。6月，中央发布命令，指出全国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无票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手段限制车辆通行；煽动武斗，破坏铁道、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失去理智的造反派们并不理会，为争夺对车站的控制权，经常在火车站大打出手，后果极为严重。

7月23日~25日，铁路工人与红卫兵因争控香港——广州铁路线，进行了三天武斗。这些红卫兵指责那里的工人支持刘少奇。工人们用石头和削尖的棍棒与红卫兵对打，直到一名省委领导从广州赶来调解，才使流血中止，达成妥协，这已是25日晚了。这次武斗，有100多人丧生，24日交通停顿。

自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以后，广州的武斗更是急剧升级，发生了开枪打死群众的事件。

以下是当时曼谷《世界邮报》关于广州市武斗的一些报道，我们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67年7月24日深夜，广州郊区一座大型化工实验厂遭到造反派的破坏，造反派还在那里散发传单。这段时间，广州甚为混乱，全市陷入武斗状态，市郊和南北火车站均有流血武斗、爆炸失火等事件发生。红

卫兵、工人、学生、军人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伤。空军用直升飞机散发传单，要求停止流血冲突。广州的造反派实际上已分化成“红旗”和“东风”两派。“东风”派连日从四面八方调大量的红卫兵到广州，而“红旗”则策动农民向广州集结，双方有展开一场大战的姿势。广州各工厂、企业均陷停工状态，各学校也十有八九停课。市内警察不断巡逻，所有通往郊区的主要公路，均增设岗哨。入夜后，实行检查，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城，两派组成的暗杀团在黑幕中横行霸道，展开了谋杀活动，所有攻击者不是佩戴太阳眼镜就是带着面具。

8月初，广东代省长林李明被捕，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也开始受到抨击。

8月8日中午千余名红卫兵在设于珠江桥畔的“第二工人娱乐俱乐部”内举行一次会议，热烈讨论如何领导红卫兵运用小刀、铁条、三角锉、大铁钉以及铁椅等去斗争。后来他们与护桥的解放军发生了冲突，解放军战士命令他们停止进攻，但他们的心已经被愤怒的烈火熊熊燃烧了，满眼满脸都露出了视死如归的情绪，奋不顾身地向守桥战士冲去。战士们高喊：“别过来，再过来就开枪了！”然而红卫兵们象潮水一般冲了过来，铁条、石头、三角锉……铺天盖地，满天飞舞。在对峙中，战士不得已开了枪，红卫兵人墙纷纷倒下。这场战斗造成了两百多人伤亡，其中解放军战士十多名死亡。

同一天，《南方日报》社亦受到红卫兵的搜索与抢

劫，他们包围了《南方日报》社，缴了守在报社外面的军管人员的枪械，高喊口号，报社内的呼救声在两条路口外均可听见。

8月10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时突然停顿三个小时，也未作任何解释。8月11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继续延迟播送中央电台节目。近日来，羊城虽然实施军事管制，但实际上混乱的情形有增无减。在两派的激烈战斗中，以一派的工人与另一派的红卫兵打得最为激烈。双方均以最残忍的手段对付对方。有不少人的眼睛被殴打伤致残，甚至失明。两派均设有黑狱和刑房，用以拘禁和审讯对方群众，武斗中落入对方之手的均称为俘虏，把对待敌人的办法用于迫害群众。广州市的交通混乱不堪，公共汽车上挤满企图逃往市郊以躲避城中武斗的市民。至8月9日，全市所有公共交通均已停驶。在广州码头，运载军火前往越南的货船，被一派攻击，夺走了大量的机关枪及弹药。8月10日，白云机场原定六时起飞的往北京的飞机，提前半小时起飞，以避免被武装冲突波及，致使54名日本观光者赶不上飞机。机场曾有射击事件，有1人受伤。

8月12日晚，广州市突然发生火灾，大和路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相传是由抢劫之歹徒所纵，烧毁了好几间房屋，许多人受伤死亡。这时形势尚不明朗。当救火部队赶到失火地点时，有一人曾听到步枪和机关枪声响，枪声给弥漫着硝烟的夜幕更增添了几分恐怖。老百姓都闭户谢客。相传北方的红卫兵将于16日

从武汉乘火车南下广州，以支持广州受压制的红卫兵，打击另一派别，这又给广州增添了几分杀机，老百姓极端紧张，害怕随时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在极度的混乱中，两派为控制铁路和车船，不断发生冲突，省内铁路交通停顿，水路亦处于瘫痪状态。广州街头的尸体多数肚穿肠流，有些甚至双目也被挖了出来。集体式的强盗掠夺事件时有发生，据说曾有30名歹徒在市内打破房门，进内搜掠所有值钱的物件，杀害屋主及其家人7口。这种武斗造成的混乱，给市民精神带来严重的威胁，也给市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8月12日，激昂慷慨的红卫兵群众又在黄埔攻击运载军火前往越南的货轮，从那两艘船上搬走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8月13日，为了制止广州的混乱状态，军队派47军的两个营开进广州。部队进广州后，市区夜间枪声减少，逐渐恢复正常，公共交通开始通行，广州至香港的火车亦再度通行。当这两个营抵达广州时，即开始在夜里巡查市区各街道，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43军支持反对派与47军对抗，当47军向43军射击时，广州市民非常担心发生内战。16日晚由北京调广州的47军与驻广州的43军发生冲突。那天白天，市内各街道均未有军人巡逻，只集中驻留在沿珠江的长堤一带。那天黎明起即发生枪击，一直延续到当天夜里，全市的居民都听到猛烈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声，人心惶惶，通宵不眠，整个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双方伤亡数百

人。43军的两个营被缴械后遣到湖南，长堤一带被宣布为军事管制区。救护车川流不息出入该区，抢救负伤战士。

8月17日，一万多人云集广州站要离开广州市，以避免战火硝烟。火车一进站人们便争先恐后抢上火车。

连日来，广州两派对交通运输部门和宣传机构的争夺更为激烈了。广州铁路局，港务局公路外及《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广播电台等机构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武斗。《广州日报》已被冲击，并被一派所控制，然而由于冲击时破坏性很大，致使内部设备多遭损坏，短期内无法出版。

激战在广州市内蔓延着，两派群众组织和部队都在加紧布防，形成割据局面。南下的47军与驻军发生激烈巷战，双方伤亡惨重。43军失败，立誓夺回机场的控制权，所以激战一直不断，仍在广州蔓延。广州内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曾采取步骤，欲对这个华南大城市进行调解，可是武斗仍然继续。周总理派出一架运载前来北京和谈的若干位各派的红卫兵领袖的专机，于8月17日开抵广州机场时，在那里相对立的红卫兵集团却已经发生了战斗。战斗在珠江北岸最繁华的地区进行了三天三夜。

由于白云机场被驻军所占据，冲突亦从广州蔓延到粤北，曲江武斗死伤人数已接近广州。广九线上的东莞也发生冲突，由香港返大陆到达东莞的旅客，已被劝告迅速返港，以免牺牲。越来越多的部队源源不

断调入广州，以巩固其派别在该地的军队势力。第63、64、65军正在不断调入广东，广州已不是在统一的控制之下，而是由各区驻军割据。广州的局势已处于不能控制之状态。据报道，两派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塞满了澳门医院，他们都是受伤后乘舢舨或者其它小船到澳门的。

8月20日，2—3万广东人，其中有红卫兵和监狱逃犯，从混乱多事的广州及广东各地步行走向香港边境，来到了港九铁路的中途站樟木头，企图越过中港边境，逃往香港，以躲避极端严重的动乱。两营解放军战士迅速被派往边界布防，以遏止难民逃亡。而在深圳边界，也有一万人挤在旧货仓边和山边，企图越境。但因为受到解放军战士的严密监视，谁也不敢贸然行事。数百名从广州派至香港边境工作的红卫兵，计划潜入香港，但无法越过边境。当他们发动第二次进攻时，香港警方向他们发射了催泪弹和烟雾弹。

这几天，第47军精税部队15000人已全部调至广州，与63、64、65军三军一同包围了整个广州，试图镇压广州的动乱。

外电报道：隶属47军的两营“恐怖部队”残忍横暴，引起了市民的刻骨仇恨。他们试图镇压疯狂的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

8月30日，一艘武装机帆船，被解放军炮艇轰击破碎。接着，解放军又在广州出动坦克对付一派群众组织，武斗情形惨烈。一派群众组织的舰艇突然倒戈叛变，在与一艘机帆船的追逐战中，十人丧生。

在文化宫外，一派夺取了另一派的两辆坦克，这两辆坦克是解放军借给后者对付其对立面的。然而，那些青年对坦克的驾驶知识知之甚少，所以，当坦克被沙包包围，又遭手榴弹袭击时束手就擒，并被拉下坦克，另一派群众开起坦克，扬长而去。领导这一派的是“八·一兵团”，这个组织号称10万人，由复员军人及调任文职的军人组成，该兵团5月间已被指为“反革命”，领导人已被军方逮捕，但后来很多人获释。

从8月初起，工厂已停工，工人奉命制造尖刀，以抵御横行的红卫兵的可能暴动。几乎每天都看到红卫兵与工人的冲突。大批的援越食品在广州以西约60里的一个货场失窃，盗者留下字条说：这些货物，被“红卫兵运输队”搬去保管了。附近的另一个货仓也同样发生失窃现象。

8月31日，“八·一兵团”云集7—10万名群众从外地进入市区，开始和另一派红卫兵展开街头血战，数十名红卫兵当天被击毙，数万名受伤，许多尸体在珠江上漂浮。这场内战蔓延至广州周围地区，激战四天四夜从未中断。部队加入了双方的战斗。广九铁路交通自激战始即完全停顿，客货车辆绝迹，罗湖、广州水陆运港货物减少，一般广州渡船均被攻击并被掳去。4辆运送军人的卡车在开往香港边境深圳的途中被伏击、缴械。港九铁路一带仍可听见大炮及机关枪声。

广州“八·一兵团”的反扑斗争扩展到了海上。包括万山群岛及沿海一带，有些武装机帆船和小炮艇已被他们控制，南海舰队亦有官员倾向他们，并与另一

派展开以打、抓为中心的斗争。

两派的斗争还扩展到广九沿线，各县发生抢枪、劫夺粮食的事件，军运瘫痪，混乱紧张。

两派的武斗，还扩展到广深铁路沿线各县。连日来，石龙、茶山、樟木头、平湖、布吉各站，均发生枪战，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沿线到处发生抢劫及纵火案，双方都抢夺运往香港的粮食。在经过一场激战后，石龙、茶山、樟木头各站及广州附近的战略据点，都已由“八·一兵团”及支持它的部队占领控制。另一派则加紧部署进攻，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指责“八·一兵团”派抢夺火车和军火的文章，气焰十分嚣张。

市内的武斗也未停止，许多居民离开广州，躲避武斗的冲击。大批农民涌入市内，参与掠夺和杀戮。

两艘去日本的缅甸商船在广州被“八·一兵团”派夺来的炮艇攻击，另一派则予以救助。

9月7日，中立的解放军部队下令武斗双方在午夜前交出枪械。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在广州发布这种命令。在此之前，他们是避免（至少不公开）介入派别冲突的。广州现在面临的困难重重，其中最主要的是铁路交通几乎完全停顿，二十多个火车头在红卫兵与铁路工人经常发生的冲突中被毁损，广九火车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几周来时常停驶。由于北京方面对另一派的支持，军队的介入，使得“八·一兵团”派对广东的控制岌岌可危。而“八·一兵团”派的大部分已逃到乡下，重新整编，以期再攻广州。

47军支持的那一派控制了混乱的广州后，彻底清除反对派，对一些人未加以审讯就把他们枪决，恐怖笼罩羊城上空。

9月10日，占领罗湖以北博古市火车站的2000名获释囚犯，与进入该市的、拥有加农炮及重机枪的4车军队发生冲突，数里外均可听到枪炮声。从广州开往香港的火车在该处被耽搁了2个小时。在激战中，5人中弹身亡。此后，47军又与反对派发生流血冲突，开枪打死从监狱逃出的囚犯，并声明可以随时枪击逃跑囚犯，宣布“八·一兵团”派的人员将被判入劳改营。

第47军开始设法迅速恢复铁路交通，同时加速对反对派的肃清。他们曾搜出反对派的一个据点，搜获大批炮弹、地雷、火药及机关枪。此时，一些不法分子亦趁机作乱。一个称为“红龙”的组织，扬言要杀掉任何佩戴毛主席像章或携带毛主席语录的人。

两派激烈武斗至此已历时一个多月，此时解放军收缴了两派的大批武器，同时，悬赏捉拿现在乡间的“八·一兵团”派头头。

也是由于军队支持了一派，引起了受压派的强烈不满。9月14日，“八·一兵团”派炮轰了广州城的部分地区，珠江口的黄埔海军基地亦被炮轰，夺得了数艘炮艇。成千上万的“八·一兵团”派冲入市区与反对派进行激战。16日起双方开始炮战，市内又筑起了碉堡。43军与47军的部属均已开入市区。双方用自动武器，手榴弹，甚至大炮公开作战，战舰则在河上巡逻。广州实际上已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广州的铁路、机

场和高地均被“八·一兵团”派控制。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各死200多人。“八·一兵团”派炸毁了一座6层楼的反对派的据点，当反对派仓惶逃走时，隐藏着的狙击手即开枪打死了他们。有一晚反对派穿上白大褂，在医院中用毒气把所有嫌疑的“八·一兵团”派毒倒，然后杀死。

9月16日，黄埔两派互相使用轻型武器隔岸对射，致使一艘停在黄埔港的欧洲货轮遭受池鱼之殃。不过船上的船员尚无人受伤。

至此，中立的军队已完全偏袒反“八·一兵团”派，利用坦克大炮来制止两派武斗，严格说来是对付“八·一兵团”派。他们一方面尽力使“八·一兵团”派参加谈判，一方面则动员40万居民在街头和郊区赶建防御工事，以防“八·一兵团”“血洗广州”。同时尽力制止难民逃往香港，企图越境者遭到了枪击，而边境上仍有2万广州人伺机越境。

9月19日，广州市内流血武斗不断，完全成为一座死城。市民夜晚完全不敢出门，外国游客则被警告入夜后不可离开旅社外出。市内各主要十字路口出现障碍物，市入口处，聚集有百八十万入。

支持“八·一兵团”的若干名空军军官因计划爆炸一批准备在国庆节空军飞行表演中使用的米格喷气式战斗机之事披露而被捕。广东军区某副司令员因被指责应对两派权力斗争的混乱局势负大部分责任而在家中企图悬梁自尽。为保护那些米格机，大批坦克被调往机场。

国庆前的30日，两派又发生了战斗，有200多人丧生。“八·一兵团”派焚毁了反对派的宣传品，并张贴宣传本派观点的大字报。

国庆后，广州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取得了预定于10月15日开幕的广交会的管理权，并接管了码头、公共汽车站和公私合营的市场、国营商场及工厂等，以防“八·一兵团”派可能进行的“破坏活动”。国庆节后双方亦常发生零星冲突。

广交会筹备期间，大家都忙于展览各地展品，冲突渐少发生。

11月9日，广州的工人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解放军驻穗军官与新成立的委员会在越秀山举行群众大会，庆祝筹备小组的成立，参加人数达到十万人。一位负责人在会上说：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革委员筹备小组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下成立的，它得到了驻军的支持，获得了成功，现在广州的工人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与会者联合致函毛泽东主席，向他致敬，并表示永远沿着他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实现大联合后的广州，大字报已消失，以前市内张贴大字报的木牌全部拆除，市容焕然一新。

11月1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指出广州军区是中央所信赖的。决定建立由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

备小组。11月14日宣布成立革筹小组，保证了广州交易会是在有纪律的气氛之下举行。11月15日广交会胜利开幕，陈列的三万件商品，反映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盛况空前。

11月17日，“八·一兵团”派一千多人袭击反对派总部，双方以小刀和木棍交战。格斗半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前往阻止，又引起流血冲突，许多人受伤。

12月下旬，红卫兵再度与军队发生冲突，爆发了猛烈的战斗。两派都在加紧活动。广州军区发出命令，限各派红卫兵、工厂工人及学生领袖在12月25日前缴出他们的武器，但没有人上缴。

12月24日，广州城内出现了号召市民奋起反对黄永胜的传单，两派红卫兵又发生武斗，双方均有伤亡。

广州市内的造反派不停地发生冲突，激烈悲壮，血流满街，幻想争取北京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承认为真正的造反派。由于事态非常严重，军管会动用了因遭到清除而靠边站的市公安局领导和群众来协助维持治安。

1968年元旦，广州又有6辆公共汽车被焚烧。烧毁后，市内公共交通陷入停顿。而广州西南的佛山市曾时常发生猛烈的武斗，佛山很多居民已纷纷逃往军事管制区广州，以避开猛烈的武斗冲击。

元月下旬，红卫兵在广州各处邮局抢劫邮包和挂号信。尽管军队在各邮局外的巡逻增加不少，但这类抢劫还是很猖狂，解放军不得不向抢劫者开枪射击。

据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反对派及“特务”正在广东省展开新的破坏活动，企图阻止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并报道了动乱发生的情况。

2月21日，酝酿了数月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终于宣告成立。60万广州军民召开了庆祝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上了广东省革委员会主任，包揽了广东省的军政大权，成了广东的第一把手。

广东革委会成立后，将权力收到自己手中，并忙于统一两大派组织，号召“大联合”，组织批斗广东党员中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各造反派组织和省革委的头头们，并不因此而团结起来，仍在或明或暗地争夺权力，打击对方，冲突还时有发生。

3. 4. 海丰厮杀

海丰是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其中一派是以县委主要领导人李××、陈××、王×等为首的“海丰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左委”），其主要由全县机关、企业、学校、民兵的绝大多数所组成，人员约25万人。另一派是以县委委员林×、尧××等为首的“海丰县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人总”），由机关、学校、居民和城郊农民的少数人所组成，人员5万左右。

当时，海丰的驻军是6882部队，团长和政委在立场观点上有分歧，前者支持“人总”，后者支持“左委”。“人总”与“左委”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酿成武装冲突血案。

事件的起因，是如何对待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彭

湃的母亲周凤老人。当时已有96岁高龄的周老太太被“左委”认为是漏网了18年的“地主婆”，要揪出来斗争示众，清算她的“罪恶的剥削史”。他们还认为，彭湃在1927年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因而对县内用彭湃命名的“彭湃中学”、医院以及红场、红宫等都要废除。但“人总”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彭湃的革命历史应该肯定，周凤是“革命烈士”的母亲，不能清算。双方辩论，彼此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武斗危机，一触即发。

1968年5月20日，两派争夺当地“水利建设指挥部”的办公大楼。“左委”有20余人在楼上被困。一部“支左”解放军战士前去解围，与“人总”发生冲突，结果“左委”及战士有20余人被打伤。自此之后，双方准备决斗。在他们分别控制下的农具厂、铁器社等企业，全部停止生产农具，改产尖刀、铁尺等武器。“左委”为了增加实力，又以县委名义，通知公社代表前往兵营慰问解放军受伤战士。但“左委”的意图被“人总”觉察，于是立即派战斗组人员把守各主要路口，不准郊外各社人员进入城内。

8月22日，头河公社的农民敲锣打鼓准备入城，被“人总”拦截，引起武斗。结果头河公社不敌，被迫撤退。

当晚，“左委”即在县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抗暴前线指挥部”，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同时，他们还召开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组织人员于26日再次入城，如受阻，立刻进攻。

“人总”也不甘示弱，他们也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先下手为强，消灭县城里“左委”的总部。

8月26日，大屠杀开始了。“人总”先行一步，除了守

住各路口之外，在城内发动总攻击，截断所有电话线，使“左委”失去联系和指挥。第二天凌晨，“人总”便攻占了手工业局、粮食局和炸毁了县供销社。

但是，“左委”预先占据了县城所有制高点，使“人总”无法靠近。电话虽然不能联系，“左委”却能利用各个据点的播音器相互联络，并用设在县电讯局和电影院的探照灯，向城外公社求援。公社的代表在城外各路口受阻后，全部退回汕尾、公平、可塘、梅陇等乡镇，先将各地的“人总”组织消灭，然后召集全部武装民兵，进城攻打“人总”总部。在内外夹攻之下，“人总”开始惨败，纷纷外逃，除部分人逃往广州、汕头等地投靠“旗派”外，大部分逃到银瓶山与莲花山区，苟延残喘。

据“军管会”事后调查统计，在这次武斗中，170余人死于非命，500余人伤残。据说在海城公社，被暗杀及活埋的就近100人。彭湃的侄子彭科，在武斗中被砍头示众。

第四章 楚豫劫难

楚豫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文革”武斗时，红卫兵和其它派性组织都没有忽视这块战略要地。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文革”旗手江青特地深入河南郑州，煽动派性组织起来进行“文攻武卫”。几天后，就在这个口号下，河南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惨案。湖北的武斗深入城乡各个角落，展现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蛮横风格。湖南“圣地”起风雷，武斗时的泼辣劲不亚于“九头鸟”。下面是当时派性小报反映出的两湖及中原地区武斗的“壮烈场面”：

一九六七年八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一千余名B派，穿着军装，出动三十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八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六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的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八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十三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住几十个A派，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一A派群众被B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小辫子，打了

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到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四个专区，行程二百八十三公里。

八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而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三十余人压在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两名。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〇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先打了迫击炮，而后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八十余名C派，冲入某某车间，D派二十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把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〇炮轰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一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方则用手雷回击，当场被打死十三人……

如果不指明背景，人们看到这些材料，肯定会以为是解放战争时期某一重大战役的一个悲壮场面。刺刀见红，你死我活，或同归于尽，简直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演！在武斗风盛行时，造反派高呼“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口号，引起中原大地一场混战……

4. 1. 河南玻璃厂三千人大搏斗

据说，1966年9月6日那一天，一位青年人路过玻璃厂门前时，被红卫兵拦截。红卫兵指责他的头发太长，骂他为“牛头”，说罢，两位红卫兵从兜里取出小剪刀，要动手剪掉该青年的头发。该青年不服气，与之辩理，红卫兵却蛮不讲理，动手动脚，强行剪理。

正在此时，从玻璃厂里走出一名干部模样的人，对红卫兵的作法“看不顺眼”，乃为该青年讲好话。但在他说了几句话后，红卫兵则转而指责这位干部偏袒该青年，有位红卫兵高呼一声：“他是反革命分子，大家清算他！”这位干部一听，大声斥责说：“我当了20多年的干部，几经出生入死，你们竟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妈的，那时你们还未出世，知道些什么？”

但一群红卫兵却不由分说，你推我拉的要抓那位干部。这时，厂方负责人闻讯后赶来，为那位干部和青年解围，同样被红卫兵指责为“反革命”。由于红卫兵人多，一下子就把该青年和两位干部绑起来，脱掉衣服，并以剪刀轮流刺他们的脚板底！然后以针刺他们的面部，将头上的头发逐根拔下来，折磨了两天两夜，直至相继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

但是，红卫兵仍不罢休，找到医院“算帐”。医生表示该3人的病况很严重，请他们不要接近，但红卫兵却说，如果是晕厥，用针刺也不会有感觉，所以，可以用针试试他们是否仍然晕厥？

红卫兵与医生经过一番争吵后，医生被迫让步，任由

红卫兵为所欲为。于是红卫兵真的用针再刺这3名“病人”，由于没有反应，才罢休。

事件发生后，红卫兵借口该厂负责人是“反革命分子”，认为该厂也有问题。所以，先后聚集了3000人，包围该厂，准备进攻。厂里200名职工认为两位厂领导无辜被斗、被打，简直欺人太甚。于是聚会商量对策，决定进行武力抗争。终于在8日晚上10时40分，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经过3小时撕杀搏斗，结果造成重伤70余人，轻伤500余人。

4.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江城武汉在劫难逃。

来汉“串连”的北航“红旗”造反兵团头头对武汉“工人总部”打气道：“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武汉被自然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武昌是文化区，有着碧波荡漾的东湖，景色秀丽的珞珈山、瑜家山、桂子山等，几十所大专院校和众多的科研机构座落在这里。然而在1967年，这里曾是武斗的司令部。汉口是商业区，古代就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它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其中，中山大道则是闹市中的闹市，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各国的租界，因此，房子都是各式各样的欧式建筑，非常漂亮。现在临街的房子都变成了商店，显得热闹而繁华。年青的情侣们今天漫步街头时，大概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里曾架起机枪，成为无辜群众自相残杀的战场。汉阳则是工业区，是三镇中较小的一部分，有许多工厂，当年武斗中的许多武器就出自

这里。

武汉的武斗始于 1967 年。

1967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7 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兵团”）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号称 10 万人大会，连续批判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 月 30 日，又召开批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大会，宣称“以王任重和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是黑省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湖北省的中共组织，从省委到基层组织全部陷于瘫痪。

随着 1967 年 1 月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两股狂风席卷武汉，省、市党政机关及全市 90% 以上的基层单位迅速被夺权。

2 月初，武汉军区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在此之前，“湖北日报”社、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和武汉电视台的“造反派”，相继夺取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领导权。

2 月 8 日，“工总”等 12 个造反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此后，凡拥护这个声明的，即自称为“造反派”；反对这个声明的，就被斥为“保守派”，两派之间斗争越来越激烈。

与此针锋相对，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指出《二·八声明》“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3月17日，武汉部队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把在武汉地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抓抄的朱××（原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原武昌造船厂工人）等人拘捕起来。

紧接着，武汉军区发布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吸收一批原省市负责干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动乱局面一度有所缓和。

然而，这种相对安宁的局面只是昙花一现，江青还没过够瘾哩！她要的是把武汉真正搞乱！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搞倒！只有这样，她们一伙才能乱中夺权。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战斗队赴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4月6日，配合这篇社论，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于是，武汉“二司”、“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红色造反司令部）和“工总”等造反组织的成员纷纷上街游行，冲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抵制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

老谭”（意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当时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把斗争矛头直指武汉军区。

4月9日，武汉部队撤出派往武大、华工、湖大等院校的军训团。10日，撤出市一中支左小组。13日，武汉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工总”一部分被押人员。23日，“工总”全市联络站成立。

4月16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煽动冲击武汉军区。

这样，武汉已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了。

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至此，武汉地区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正式形成。其中，“三新”（新华中、新华农、新湖大）、“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联”等属于所谓造反派；“百万雄师”（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三学兵、职工联合会、公检法）等属于所谓“保守派”。

“山雨欲来风满楼”，两派群众组织冲突加剧，双方大量集结人员，抢占据点，修筑工事，制造武斗器械，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6月17日，在汉口最繁华的地区——中山大道六渡桥段，两派群众展开了大规模武斗。

那天，武汉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然而，“勇士们”的斗志丝毫不减：刀出鞘，弹上膛，“我自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哪里还是同胞？！

昔日繁华的中山大道，现在架起了机关枪，双方“勇

士”们躲在由沙袋堆成的掩体后射击，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像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街垒战。

“造反派”这边的机枪手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长得高大英俊，充满青春的活力，大概是个大学生吧。此刻，他紧握机枪，狠命地把一梭梭子弹射出去，他心中升腾着一股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他觉得是在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

忽然，小伙子的手哆嗦了一下：他看见了对方人群中的一个俏丽的身影——他的恋人，他曾热烈爱慕的姑娘。因为各自的观点不同，他们前不久分手了。那时的人们，革命第一，哪能缠绵于儿女私情！分手后，革命豪情很快冲淡了他心中的些许惆怅。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今天会与她相逢于兵戎相见的战场！革命真是太残酷了！打还是不打？他的心在颤，他的手在抖。不过，已用不着他考虑了：他旁边的“战友”已把一颗子弹射出去。他听见声音抬头看去：那挺起身子高呼口号的姑娘，此时身子象蝴蝶一样飘起来，又落下去……

历史老人啊！原谅这些疯狂的人们吧，他们的灵魂已被扭曲了！

6月24日，在汉阳轧钢厂、汉口友益街、武昌武汉河运学校等处又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

从当时“激战”后写就的几首广为流传的红卫兵诗歌中，“激战”的场面及参斗者的心态可见一斑：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接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摘自《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牺牲英勇性的战友》

放开我，妈妈！别为孩子担惊受怕。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我绝不作绕梁呢喃的乳燕，终日徘徊在屋檐下；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摘自《放开我，妈妈！》作者吴××，武汉人

此诗作于“七·二〇事件”前夕，反映了武汉地区武

斗的残酷、激烈。透过它，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无情地进入了每一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人们的宁静击得粉碎。

6月在武汉已是盛夏时节，武汉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其气温可想而知。然而，革命的温度更高，武斗的“辉煌战迹”——死尸遍及街头，在烈日下暴晒，其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武汉曾经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抗日战争初期，这里发生过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成千上万名抗日志士在这里高唱一首忠魂曲。今天，先烈们九泉之下若有灵，看到在他们洒过热血的地方发生的这一幕幕景象，又该怎样地扼腕痛哭？！

可悲的是：武斗的双方都实实在在地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场英勇的战斗，是在捍卫革命事业，捍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些年青的红卫兵们是怀着一腔青春热血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去把子弹射向自己的同胞的！

十年后，陈伯达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感慨地承认：“那真是发疯的时刻！”

谁之错？！

据统计，在1967年上半年度内，武汉地区共发生武斗事件300多次，有1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轻伤。

4. 3. “七·二〇”事件

1967年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江总”翻案；同

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这个《公告》无疑对“造反派”是个打击。于是，大势急转直下。“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等组织退守到华中工学院。在瑜家山口，“造反派”们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日夜思念您。”——那时，只要谁倒霉了，就会吟唱这首歌。

武斗有增无减。

这时，江青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中央文革摆出一副貌似公允的面孔，把对“工总”的暗中支持转化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责难。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康生批准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28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文革26日来电，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仍没有控制武斗局势的发展。7月1日以后，“百万雄师”以武力夺取“三新”、“三钢”等组织的据点，战斗更趋激烈。

7月14日清晨，周恩来总理亲自飞抵武汉。周总理希望平息紧张局势，说服两派和解。同时，也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

中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

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了武汉。

当天晚上，毛泽东到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

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背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到武汉街头去看大字报，并有目的地到湖北大学，同造反派谈话，公开了他们的身份。王力还独自乘车去华中工学院，一进大门，他就高声宣布：华中工学院现在是武汉的红色根据地！“新华工”是真正的造反派，我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的心沸腾了！热泪在脸上不尽地奔流，热血在胸中尽情地翻滚。7月15日，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以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一遍遍地高呼：“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会上提出要给“工总”平反，放掉朱××；并认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由谢富治、王力委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是有意加剧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7月18日夜间，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到机场送走周总理后，谢富治、王力急得连住地东湖

宾馆都没有回。便迫不及待的直接遭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

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王力拒绝戴“新二师”群众递上的毛主席像章，却煞有介事地戴上造反派袖标，又是视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的人员，并召开大会发表了讲话。

王力像个天才演员，手舞足蹈地喊叫：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播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什么要为“工总”平反，什么造反派是革命派，什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现在，该轮到另一派“日夜思念毛主席”了。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十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做工作。

谢富治首先讲话，指责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并不许与会者作出解释。接着，王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又即席发表一通他的高见：“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有些干部实在听不下去，愤然退场。

会议直至晚上11点多钟才结束，陈再道和钟汉华当即

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胡××等人。可就在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和部队的一些战士，采取了异常的“造反”行动。他们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

在军区大院，“百万雄师”的群众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几位领导人一面赶到现场做群众工作，一面向王力报告这些情况。他们心急如焚，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

而王力呢？听了这些情况，只是冷笑了几声，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情形，他还唯恐乱得不够哩！否则，日后他怎么能成为反军乱军的“英雄”呢？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的另外一部分成员头戴钢盔，携带棍棒、大刀和梭镖，乘军车占领了武汉市的机场和铁路车站等军事要地。

在那些地方，他们得到 8201 部队装甲车的支持。武汉在一夜之间，到处刷满了“打倒王力和谢富治”的标语。

仲夏之夜，武汉像个大蒸笼，没有一丝风，没有一丝凉意，使人感到闷热、烦躁。静寂的街头，弥漫着几丝血腥和硝烟味儿。

一场重大事件似一座即将爆炸的火山，一触即发……

7月20日来临了。这是老将军陈再道戎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它给他带来的屈辱和创伤将永远烙在他的心灵深处。

清晨，陈再道怀着复杂烦闷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东湖宾馆谢富治住的房间。

刚一坐定，“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然地冲了进来。把守东湖宾馆的8201部队正和他们是一派，敞开了宾馆大门。因此，他们没有受到阻挡，就冲进了谢富治的房间，叫着要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住在隔壁房间的王力，一听见找他的风声，吓得呆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了。

陈再道和谢富治把群众劝到外面去谈话，结果谈得颇为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一起。

谁知，刚按下了葫芦却又起了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以独立师和29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旋风似地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

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群众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

到了军区大院，先是围攻，后是“喷气式”，接着就是游斗，王力的一条胳膊被打断，这次的苦头吃得着实不小。不过，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成为“英雄”添加了资本。

与此同时，武汉三镇街头象开了锅。数千辆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武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

威游行，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人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打倒王力！”“……”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群众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想以此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

邱会作对毛泽东说：“武汉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林彪了解这里情况？”

“他很了解，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怎么关心？”毛泽东似乎很感兴趣。

“25军的3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预计今晚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杨成武：“谢和王的情况怎样？”杨回答：“周总理来电话说，已从小洪山转移到了武空手里。”毛泽东又问：“陈、钟二人呢？”杨成武答道：“林彪已调二人进京。”

此时在北京，周恩来惊悉武汉出事，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当机立断，连夜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然后自己又带了两架飞机，亲自飞临武汉。这就是周恩来，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像个消防队员，哪里有警报，他就立即出现在哪里。

周恩来飞抵武汉前，曾秘密通知武汉军区，不得走漏消息。但是，当飞机离武汉只有100公里时，却有25辆满载“百万雄师”成员的大汽车开进了机场。在空中，周恩来临时决定：一架飞机按原计划着陆，他自己的座机改在离武汉60公里处的山坡机场降落。

周恩来一着地，就听说了王力被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转移到29师师部的6号楼后又突然“失踪”的消息。周恩来真是心急如焚。因为，如果那位“钦差大臣”真的出了什么差错，那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呀！

周恩来在电话里严厉命令陈再道、钟汉华：“你们要保证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绝对安全！如出任何不测，都要对你们军法从事！这是我给你们下的命令，听清楚了没有？”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7月20日下午，武汉军区负责人叶明担心有人再次把王力抓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便把他交给了29师政委照顾。

29师政委对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搞暴乱，已经包围了这个师的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于是，吓得屁滚尿流的王力跟着该师政委躲到了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

在山上，王力对29师政委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宾馆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的。武汉的天已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已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29师政委对武汉军区抱不信任态度，闭口不宣王力的住处。

7月21日，武汉空军副司令、林彪的死党刘丰得知王

力在 29 师，便找到 29 师政委，大骂武汉军区，29 师政委则投其所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 月 22 日凌晨，王力由李作鹏、刘丰护送至机场，飞回北京，谢富治也同机飞回。

这一天，刘丰率领临时调来的原驻武汉市郊的 8191 部队（空降兵师），将驻长江大桥的“百万雄师”解除武装，并接管了广播电台与电信局；驻湖北孝感的 15 军也开抵武汉，控制了市区的局势。与此同时，李作鹏指使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在李的操纵下，发表《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29 师政委在刘丰的唆使下也宣布 29 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这样，周恩来原来想稳定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设想破灭了。

接着，林彪、江青在北京摆开架式，以“七·二〇事件”为借口，要开展一场舆论大围剿，拉开“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

林彪，江青先是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欢送谢富治、王力。当王力垂着伤臂出现在机场时，那些不明真象的群众的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王力俨然成了一个英雄，他那时大概忘了他挨打时的惨样。

那年月，谁都演戏，谁都能演戏。

江青不愧为演员出身，挽着王力和谢富治的手臂，绕场一周。那架式，就像在奥运会上得了金牌、好不得意！

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

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决定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另外，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

7月24日凌晨三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陈、钟一住进北京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便受到林彪、叶群指使下的三军造反派的冲击。在叶群的亲自布置下，“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布满了北京街头。同时，他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林彪、江青亲自参加了大会。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谢富治先放了“第一炮”，声称：“七·二〇”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过去曾经是陈再道的部下，对陈尊重有加。现在，陈再道低着头、弯着腰，听着谢富治的一派胡言，心

里实在想不通：这就是以前那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人么？

其实，这并不奇怪，自古就有句俗语叫做：翻脸不认人！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吴法宪已经跃跃欲试了。吴法宪一心要讨林彪的好，此时该是多好的机会！吴法宪说道：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他还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徐向前早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

赳赳武夫吴法宪此时显示出极高的想象力，信口雌黄。徐向前实在忍无可忍，愤然退场。

吴法宪越说越激动，最后竟冲上前去，伸手打了陈再道两耳光。陈再道据理申辩，吴法宪不等他把话讲完，就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去，撕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帽徽、领章，同时一阵拳打脚踢。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不忍再看下去，悄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走到吴法宪身边，伤心地说：“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又不是小孩子！”

江青却心花怒放，说：“吴司令，不错，是造反派的风格。”

就这江青还觉得不过瘾，转脸见陈再道坐在椅子上喘息，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斗他呀！轮流作战！”

站在外圈的秘书、警卫人员，一哄而上，表示了他们的革命义愤。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对一位屡建革命战功的老将军施以拳脚，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是“文革”武斗的一大创举。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什么：“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他们自己挑起武斗，却说别人是法西斯，真是“贼喊捉贼”。

也就在这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至此，林彪一伙利用“七·二〇事件”打倒军内老将陈再道的目的达到了。

在声讨“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冲击下，全军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还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让其撤离武汉

进行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被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

据统计，湖北全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万4千余人，仅武汉市就有600多人死于非命，6万6千多人伤残。

4. 4. 狂潮后的余波

“七·二〇事件”随着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下放，大批干部、群众被捕而告一段落。

然而，狂潮过后仍有余波。劫难并未过去，江城依旧混乱。

1967年8月1日。一个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

数十万群众和部队战士涌到江边，准备举行渡江活动，以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

长江时值汛期，水已涨到警戒线上下。毛泽东头年下水的地方江面宽阔、浪花翻滚，波涛汹涌澎湃。

当时，正是“七·二〇事件”大局已定之时，人们的心情有的亢奋激动，有的悲愤难过，都处于高涨状态，都急需寻找宣泄情绪的地方。在人们眼里，眼前的长江水仿佛已不是水，那简直就是人们狂热追求的革命！

勇敢地跳下去！前面一拨跳下去后还未游开来，后面一拨儿就已入水，人挤人，人压人，岸边看热闹的人有的也被挤入水中。一时间，江面上乱成一锅粥。更糟糕的是，下水后两派的人又开始了武斗，都认为对方不配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现在的青年恐怕对当年的这些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不可置信，可那时的人们却真的是为了革命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悲惨至极：当天下午，就在下游打捞上来 200 具尸体，有的身上还插着凶器。

200 个家庭一日之内失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

当晚，天气骤变，暴雨倾盆而下，苍天仿佛有灵，它也在为冤死的魂灵哭泣！

1967 年 8 月 9 日，林彪发表了臭名昭著的“8·9 讲话”，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同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等在接见武汉军区新领导人曾恩玉、刘丰和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时提出：“造反派要团结，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把枪支发给左派；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武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对‘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打人凶手要实行专政。”

在林彪、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武汉地区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大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遭到残酷批斗。

1968 年，林彪、江青一伙又出新招，掀起所谓“三反一粉碎”（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在这股恶浪的影响下，武汉地区派性更加恶性膨胀。“钢”、“新”两派展开全面内战，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在这里，让我们也运用一下电影中的“蒙太奇”技巧，通过镜头的移动向读者展示一下当年武斗的几个场面。

镜头一：1968年5月3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钢”、“新”两派以厂区为战场激战犹酣。

近景：“钢”派“勇士”向“敌人”扔出一枚枚自制的手榴弹。

远景：手榴弹爆炸之处，尘土飞扬，哭喊声一片。

镜头轻摇至“新”派阵地。“新”派成员已有好几名被手榴弹炸伤，其余人悲愤不已。一个神枪手手持机枪大喊一声，向“钢”派阵地猛扫。

再看“钢”派那边，一个成员因刚才的胜利兴奋而得意忘形了，竟站了起来，整个身子露出掩体外。随着机枪声，他年轻的身体倒在地上。

镜头二：1968年5月4日，在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钢”、“新”两派易地再战，以厂房为工事，用步枪和迫击炮互相射击。

这回，“钢”派取攻势，“新”派取守势。几十分钟后，“新”派退守到食堂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在二楼，他们架起机枪向外射击。

“钢”派先向楼内投掷手雷，“新”派两名“战士”当场被炸死。然而，他们决不投降！“钢”派一时冲不进去，又向楼内投掷了燃烧瓶。

顷刻，大火熊熊。

“新”派战士一个个勇敢地二楼跳下来，跑到食堂作最后抵抗。跳楼时，两人摔成重伤。大楼的火一直烧了三个小时才最后熄灭。

夜幕降临，“钢”派停止了攻击，用机枪封锁住从食堂向外的各个出口，准备次日再战。

次日凌晨，80余名“钢”派敢死队员手持步枪、机枪，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冲入食堂。“新”派“勇士”拉响了手榴弹，20余人当场同归于尽……

让我们把镜头收回吧，这人间悲剧实在惨不忍睹。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人们！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

1972年3月，陈再道重新出来工作，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虽然为副职，但它毕竟昭示着国家政治气候的松动。严寒终将过去，春天又要来临！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祖国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些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希望！

1978年7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联合向中央写了《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七·二〇事件”应予平反、昭雪。11月28日，在湖北省会武汉市，为“七·二〇事件”召开平反、昭雪广播大会，参加和收听平反、昭雪大会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们含着热泪听了中共中央关于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决定。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讲了话，因故不能亲临会议的陈再道给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写了一封信。

至此，沉冤11载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4.5. 血祭朱奇武

顺江而下，距武汉二百余里水路处有一个广济县（今武穴市）。广济县有一个朱奇武垸，因武斗而闻名全国。据北京市的一位市民张某说，他曾在天安门城墙上看到了有关声援湖北广济朱奇武武斗的大字报。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表示“非常重视广济的武斗形势”，并说：“是反革命行为一律要坚决镇压。”中央军委（一说中央文革）还架设了“广济事态专线电话”，以便及时反馈广济武斗信息。那么，何以一个小小的朱奇武垸，会引起中央的如此高度重视呢？朱奇武武斗惨案是怎样酿成的呢？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在此有必要首先交代一下当时的派性发生情况。在全国性的“抢班夺权”冲击波的影响下，1967年1月26日，广济县“红艺兵”率先夺权，使派性意识在一大批具有造反“基因”的群众中复苏。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经过一周多的大辩论，逐渐形成两大派的雏型。支持夺权的一派称为“红色”，反对夺权的一派自称“工交”。

“红色”一派建立了“广济红色总部”，下设“工造司”（工人造反司令部）、“农造司”（农民造反司令部）。“工交”一派则成立“鄂东抗暴总指挥部”，下设“工总”（工人抗暴总指挥部），“农总”（农民抗暴总指挥部）。互相对峙的两派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需要说明的是，鄂东武斗与武汉的冲、杀、打、砸、抢是息息相关的。据一位当年广济“工总”副司令披露说：“工交”派是武汉钢派（“工人总部”）在鄂东地区最敏锐

的“触角”，钢派是“工交”在上头（指湖北）最坚实的“台柱”。他坦率的承认，武汉造反派头头朱××在一次接见中说，你们亲钢派“是对的”。一位曾参加过“农造司”的负责人说：当时广济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武汉的上午就是广济的下午，武汉的晚上就是广济的第二天早晨。”表明广济的武斗与武汉的动乱息息相关。

辩论越辩越激烈，武斗的气氛越来越浓。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辩不过对方就拍桌子骂娘，另一派难耐羞辱就动手，从骂到打顺理成章。起初是徒手揪搏，拉拉扯扯，搽来推去，后来是拳打脚踢、摔耳光，照着穴位、要害处打，到最后发展成为借助桌椅、器械互殴。逐渐地，一些人就赤裸裸的备好栗木棍、红樱枪。以骂还骂，以打还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犯我，我也犯人。尝到了手中家伙的“妙处”之后，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赤手空拳还不是个办法”，幡然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

基于这一发现，两派都把目光盯住了人武部、军分区仓库等有枪支弹药的地方。枪和派别斗争结合在一起，便吹响了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1967年2月24日，一场精心组织的歼灭战在进入广济的第一站——古城梅川打响了。它第一次大开杀戒，把武斗推进一个新阶段。出手不凡、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标志着广济武斗一开始就沾染上浓稔的鲜血。

还在这之前，两派枪劫了各区人武部，获得各种类型的枪支、手榴弹若干。武器在握，双方忆及被殴打的情形，怒火中烧，迫不及待地四望区交手。初次交战，难分伯

仲。就战术水平而言，似乎旗鼓相当，真可谓棋逢对手。相对的说，“工交”派的“先弃后围”还显得棋高一着。

“红色”派在领教了“工交”派的厉害后，把军械装备放到了突出位置。但是，他们手中的枪支没有多少子弹。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们通过中心记者站的联系，通过县人武部与浠水县人武部的和睦关系，与浠水记者站搭上了桥，用枪支换取所需的子弹。简单的“物物交换”，蕴藏着一个血色希冀，初步显露出武装屠戮的端貌。

2月23日，“红色”“梅川分部”率一个班20余人七、八条枪，分乘两辆大汽车、装载数百条枪，前往浠水换子弹。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重大线索，不知怎地被“工交”截获了。不摧毁这一举动，日后自己将如履薄冰，时刻都有灭顶之灾。必须斩断这把高悬于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工交”派急行军百里许，火速赶到梅川，于24日袭击了“红色”驻守力量，并大获全胜，抓获“俘虏”70余人。有2人在武斗中魂归极乐。还有一人为了活命，躲进厕所，把整个身子浸在粪窖里，仅仅只露个头在粪面上，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厄运，被抓获上来。

“工交”派把战俘关押在中心汽车站里，旋即组织大批兵力，在进入梅川的交通要道三岔路口处，以重兵埋伏，要用伏击战歼灭对方。

却说“红色”派换取了子弹后喜不自禁。为防止意外事故，当天早晨，花桥一个班被派往浠水，乘一辆大汽车接运这批军火。他们乘三辆汽车从浠水启程，兴高采烈地直驰广济。这支接运班也把“工交”想攻打梅川的口风吹

给了换子弹的负责人。为了做到“有备无患”，这支车队没有贸然冲进古城，而是在驿墙上停了下来，驻足观望，察探军情。

就在停车的一刹那，埋伏的重兵枪炮齐鸣，霎时烟火弥漫，枪声大作。一场流血冲突拉开了序幕。“红色”派见势不妙，立即加足马力驱车冲防。一些没能返回车厢的“红色”队员顿成“瓮中之鳖”，落入“敌方”的包围圈中无处藏身，手无寸铁。猛烈的炮火，使他们顷刻丧身。一些机敏的为了活命，趴在战友的尸体旁装死逃生。

激烈的炮火持续了几分钟，“工交”派担心走漏了风声也仓促收兵。短暂的战斗宣告结束。

速战速决，大开杀戒。在这场“短平快”流血惨案中，共有7人战死。“2·24”事件一共用9个人的生命作价码，刷印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惊叹号！

“2·24”首开杀戒后，“红色”“工交”两派都在迅速的调兵遣将，加紧备战，积极酝酿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朱奇武事件是两派矛盾尖锐的必然结果，也是宗族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1967年3月3日，泛白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半空中。令人没精打彩的天气最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不祥的预兆。就在头一天晚上，“工交”派的“侦察员”刺探到“红色”派的300多人马汇合到朱奇武堽密谋要事这一军情，并探明最重要的打击目标——“红色”派头头也聚集其中。这个消息给“工交”注入了一支兴奋剂，“把他们一举歼灭在朱奇武”的决策定了出来。于是“工交”一派即刻统率八大支队1000余人马，携带辎重去围攻朱奇武堽。

却说“红色”一派正为兵力不足而大伤脑筋。战线过长，牵涉面太广，兵员匮乏，都严重地困扰着其军事行动。加之各地“钢派”力量又很强大，特别是经过“2·24”事件的惨重打击，迫使“红色总部梅川分部”带领部分人马，投奔100多里外的“浠水革联”，以期养精蓄锐卷土重来。其时在风起云涌的鄂东地区，有两处硝烟浓烈的地方，一处是广济，一处是浠水。

这里插述一下浠水的情况。同全国各地一样，浠水也有两派组织：“浠水革联”和“巴河一师”。两派的军事首脑是“二王”。亲钢派“巴河一师”的统帅王××（后逮捕入狱）原是北大学生，贴过刘少奇的大字报，后在进驻工作组时被遣送回家。与广济情况恰恰相反的是，广济“工交”县里工作人员多，武器装备先进；浠水“革联”县里头面人物多，军械也不错，其主要负责人王××女士，就是当时县委常委、妇联主任。浠水两派的军事较量不断线，小战天天有。而投靠“革联”的“广济红色总部梅川分部”，最先抵达浠水的只有三、五十人，随着广济“工交”力量的壮大，“武装割据”现象愈演愈烈，“红色”派兵员外流越来越频繁。到后来，涌入浠水的人员高达万余。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通过浠水“中心记者站”（派性联络组织）的接头，被安置在浠水县城，驻扎在交情颇深的人武部。他们严格奉行着“不惹事，不打仗，一日三餐大米饭”的休整策略，在浠水“革联”毛羽未丰的羽翼下秣马厉兵，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在东山再起，“衣锦还乡”。只有在“革联”倾巢而出，与“巴河一师”殊死搏斗的时候，这支流亡的兵力方担当起防守县城的重任。

形势的发展对“红色”派明显不利。“工交”派依仗手中的先进武器和大批人马，随时有可能对“敌方”发动军事袭击。留驻广济的“红色”一派，既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又要照顾远在浠水的大队人马，可谓心有余而力所难及。因此，开辟“根据地”，建设“大本营”，针对不利形势制订出周密的战略战术，成了“红色”派的当务之急。不期“工交”尾随而至。当“红色”派发现这一“阴谋”，实已为时过晚。“工交”派层层围剿，已使“红色”派无路可逃。于是双方定下心来，意在决一死战。双方都在积极垒筑工事，修挖沟堑。“工交”派将“东方红”履带拖拉机用双层钢板改装成“土坦克”，准备攻城；“红色”派兴建碉堡严阵以待。在开始的一、两天里，双方没有动刀动枪交火，都在埋头建造工事，只是在劳动之余休整的时候，两派互相观望的群众偶尔对骂。

工事一完工，双方都转入荷枪实弹的军事对峙阶段。到了第三天，也就是3月5日，两派便发生了武装冲突。

据参加过这场血腥杀戮的一位围攻方的支队长吴某回忆说：

我当时负责指挥一支队。我们待命的地点，照当时的“军事术语”说，叫“团鱼藏沙”。那是一片开阔地中的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大坑岸，可以架设3挺机枪。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它既可以切断外界力量的军事援助，又能够阻止对方的突围。特别是在发起总攻时，我们能以少制多，封锁住对方的火力。在后来破城过程中，我们的3挺机枪火力猛，打击范围大，掩护我们一支队攻了进去。

交战开始后，各方都动用了当时先进的军事武器，尽可能地杀伤对方。在这些武器中，有六〇炮、八二迫击炮、土坦克（前架炮、上架枪），还有捷克、加拿大、美三〇机枪以及俗称的歪把子机枪、转盘机枪。威力令人胆颤心惊的“汤姆”冲锋枪也装备了武斗的两派，只是由于弹头有毒，被明令禁止使用，交火的双方才没有将这种新型杀伤武器投入到这场流血事件中。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据守城内的“红色”派依据地形优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使攻城的“工交”派伤亡较大。困据在碉堡里机枪的强大火力，使对方无法迫近，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

“炸掉碉堡！”

“工交”派别无选择！

时间就是生命。“工交”派迅速实施炮轰计划。

“瞄准！”

“放！”

“轰！”一声炮响，烟尘四起。这第一炮打在一座无人居住的仓库上。顷刻，仓库的一角坍塌了，发出沉闷的响声。此后接二连三地放了几炮，都没有打中碉堡和居民群中。”“我们是在警告对方”，有的参战者解释说，“我们总司令吴××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的枪法、炮法难道不准？我们这样就是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据知情者说，“工交”放了几炮后，“红色”的火力确实有所减弱。

这并不标志双方握手言和或一方投降缴械。事实上，交战至此，双方的军事对垒已趋向白热化。在诉诸武力三天后，两派均有伤亡。战时休整，重谋对策，卷土再来，双

方都渴望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恰在此时，“工交”派弹药告急。加之被震慑的“红色”派对城外炮弹的惊疑，双方暂时休战。

“工交”派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实施“三管齐下”的方案：用一批兵力留驻原地，迷惑对方以不致被探知弹尽药绝，时不时的放几枪，开几炮；并动员工、农、学、商各界群众，组织慰问团，犒劳“工交”“指战员”，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为解决燃眉之急，组织一溜精干人马，火速弄来弹药。他们于8日跑到隔江对面的阳新县人武部抢来各种型号的子弹，共计28万发。被围困的“红色”派并不象“工交”派所想象的那么急得团团转，相反，他们在分析优势和劣势，研究突围。他们提出“全民皆兵”，“号召全朱奇武人要“不屈服于郭、陈、刘”，“把一切外来侵略者消灭在朱奇武门口”云云。

在此，我们不能不谈及驻扎在浠水的“红色”大队人马了。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浠水的几千人马对围攻朱奇武一无所知。就在“工交”派团团围住朱奇武的时候，以郭熙盛（后被公安机关逮捕）为首的“红色”游击力量，为了保障浠水那批人马的供给，抢了中国人民银行武穴支行人民币20万元的存款。这件事对于武穴、湖北直至中国人民银行的冲击，不亚于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一艘舰艇奉命前往武穴武装押运银行储款（上级为防陆路意外，特选择水路）。遗憾的是，这艘舰艇非但没有完成使命，反而在武穴港又遭郭的武装抢劫。最后，郭乘水路，怀揣20万元的巨款，辗转武汉后又窜到浠水，并将朱奇武围攻情况一一诉诸“红色”流亡总部。其

时朱奇武战斗趋于尾声。驻扎在浠水的“红色”力量闻讯勃然大怒，迅速组织人员，直奔黄冈，洗劫黄冈军分区宝塔军库。据当年一位参与者回忆说，这批武器用途不大，都是破旧的玩意儿，可用率不到百分之十。等枪抢回来后，朱奇武已被攻破。他补充说，3月24日，我们又抢了黄冈军分区，获取大量的苏7.62口径的各类枪支，包括步枪、机枪、冲锋枪等。

却说攻守双方都在紧张地思考对策：请求增援、挪调兵力、高压逼降、实行突围……。

从阳祁县抢回来的弹药，无疑给“工交”派注入了新的战斗“血液”，从而加速了步伐。短暂的战间休息，被更疯狂的火力喧嚣淹没了。直至3月11日晚上，朱奇武依然没有被攻破。

强大的火力，无坚不摧的信念，敢死队的冲锋陷阵，使“工交”派在吸取头天晚上的战败教训之后，于3月12日发起了猛烈的破城攻势。旷日持久的反围剿，消耗了“红色”派的精力，弹药粮草告罄，迫使“红色”派背水一战，不突围也得突围。终于，“红色”派火力开路，从攻城力量薄弱的西北方向冲出重围。到此，历时九天十夜；投入兵力近2000人的朱奇武事件宣告结束。

朱奇武在战火飘摇中度过了血雨腥风的228个小时。在这次流血事件中，共死亡34人（战斗中死亡32人），双方各死亡17人，也就是说，每5个小时就打死1人！这还不包括自伤，误伤。打伤了百余人。今天用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次流血惨案时，我们发现有许多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地方。

请看看这场悲剧的几组定格特写：

镜头一：吴××和方×分别是攻守双方的最高武装司令。这两名“前敌总指挥”参加过抗美援朝，具有一定的战争经验，作战能力较强。我们绝没有把这场悲剧简单的归罪于两人之意，但不能否认，两派的军事对抗僵持不下，不能不说是两派指挥官的一次实践“杰作”。方×是黄冈地区太百湖农场党委书记，在朝鲜战场上曾任某团团长；而武穴机械厂工人、“工交”派司令吴××其时还只是一个小兵。七别三日，今非昔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战场英雄，却被自己的部下在今天围困于一隅。历史就这么奇怪。派性使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大动干戈，残酷逼杀。终于，英雄团长泪洒疆场，落荒而逃。

镜头二：她也算得上是一个“神枪手”，枪法准、打得狠。她完成了朱奇武“全民皆兵”的实践。接受了短期培训，武装辅导，加上几分聪颖，几分天才，李桂枝一跃而成为女中豪杰。血与火的洗礼，使她褪去了女性特有的秀气和娇媚，锤炼成强悍和好斗的男人品质。武斗扭曲了人性。李桂枝在打死数名攻城者的同时，也惹祸上身葬送了自己。对方认识到是她“一夫当关”的“严重危害”，便群起攻之，无情的子弹将她撩倒在战场上，巾帼英雄饮恨家门。由于战事激烈，李桂枝人棺未埋、“工交”派攻破堡垒后，难却心头之恨，将她的棺木放火焚烧……

镜头三：这是一个姓甚名谁无人知晓的“无名英雄”，人们只是在他死后才知道系远方来客。看样子，他至多才18岁。为了声援广济的革命斗争，他告别九江故土，凭着年轻的旺盛斗志，抛家离乡，加入“九江敢死队”，只身前

往朱奇武。在一次攻城中，他驾驶一辆土坦克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不意一颗子弹穿胸而过，壮志未酬身先卒，人生无成歿他乡。身先士卒竟无人收尸，一直露尸荒野，直到破城后才有人于心不忍勉强将他入殓。

镜头四：“一枪三命”实在是惨不忍睹。而发生在战火熄灭的处境里更使人潸然泪下。这枪口上的毙命者，也是朱奇武惨案的最后一个遇难者。我们将花较大笔墨，叙述这一血案，意欲昭示世人，控诉派性武斗的罪恶。

先补叙一下惨案死亡情况。朱奇武悲剧一共使 32 人丧身，“红色”派 15 人，“工交”派 17 人。“工交”派清理战场时，在一个薯洞里抓获了一个未能逃出去的“红色”队员，由五支队中两人武装押送往总部。行至半路上，两人旋风般地甩掉大部队，故意把已降的对手推往岔路，“砰！砰！”就是两枪，枪响人仆，一命归西。宗族矛盾刺激了人的原始欲望，催化了兽的行动，把枪作为自己心理平衡的杠杆，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丧尽天良地涂炭生灵。“红色”派的死亡簿上，又多了一个冤魂。

相比较而言，这最后一个殉难者，从主观上说，毕竟比上一个牺牲品幸运一些，但依然死得冤枉。她是继李桂枝之后的第二个“女鬼”，也是这场武斗中唯一的一位误伤死亡的群众。因她住在“红色”“老巢”这一边，故把死亡数记入“红色”里。其时正值“工交”破城而入欢庆胜利忘乎所以。那当儿她作为一个良家闺秀，心境超然，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对热闹喧嚣的场面不闻不问，专心致志地在房中纳袜底，以至在“工交”派进门让她烧水喝时，她才起身应付。

一支队的王××，“枪欲”亢进，非常渴望能有一支枪，那怕是摸一摸，故在休息时对放在地上的一挺美30机枪发生浓厚的兴趣，垂涎欲滴地搬弄到怀中鼓捣起来。枪和“枪盲”在一起肯定不是件好事。悲剧发生了：放在地上的机枪，枪口昂对着房门，那烧水姑娘正从房间端茶碗出来，王××的手正摸动了扳机，“嗒！嗒！嗒！”连发子弹正打在姑娘的胸部、腹部和头上，可怜的姑娘在浑然不觉中真的走到了另一个世界。王的母亲听说儿子犯了人命，翌日在家中吓得上吊自杀，气绝身亡。而王××本人，也在落实“一·一·三”指示时被捕入狱，未几，郁郁而死。“一枪三命”蘸着殷红的鲜血，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朱奇武悲剧终于落幕了。鲜血，并没有擦亮热衷武斗的群众的眼睛。相反，双方在派性争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人们无法走出打人与被打、杀人与被杀的怪圈。事实上，朱奇武事件为后来进一步争斗种下了祸根。“七·二五”惨案、方洪事件都是朱奇武悲剧的反攻倒算。“七·二五”惨案打死“红色”派7人（当时风闻36人），更煽起了“红色”派的复仇欲望。方洪事件就是在这种欲望驱使下的一场大屠杀。它使“红色”一派从蛰伏近一年的处境中一跃而起，共打死打伤对方一百多人。从此，双方势均力敌，武斗进入相持阶段。到1967年底，两派除零星的冲突外，没有酿成大动作。

在文革武斗结束后，根据上级指示，这些武斗“精英”都进了学习班。经查证，在朱奇武事件中，这些好斗分子该担当的罪行，该负担的责任，都有了比较公正、客观的处置。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惨案，我们今天

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据来自“学习班”的资料透露，这场武斗“派性掺杂了宗族矛盾、宗族矛盾激化了派性，派性和宗族矛盾互相作用，联合演出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分析两派的成份来源，就会发现，两派虽然汇集了各自的力量，但据守朱奇武的“红色”主要依靠的是朱姓，进攻的一方“工交”却是凭借郭、陈、刘、廖、冯、梅、桂七大姓，其中尤以郭姓两垅为最。郭、朱两姓相隔不远却仇隙颇深。“文化大革命”给残余的封建宗族思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床，武斗的血风腥雨使之迅速发芽、生长以及裂变，席卷全城各地的武斗象万能胶一样，把派性和宗族紧紧的粘合在一起，衍生出一个恶煞怪胎。这样，朱奇武惨案在特定的背景下，在所难免。

4. 6. 湘南杀人如麻

韶山是革命圣地。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岁月里，湖南人以是最高权威的家乡人而自豪，对最高权威的“最高指示”奉为“圣旨”，因而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相当“出众”，以为只有这样做，才是紧跟伟大领袖，才不辜负老人家对家乡人的期望。

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湖南省的武斗始于夺权风波。早在1966年11月14日，叶卫东、胡勇、张厚等人经过策划，即纠合一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达20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元月15日，叶卫东纠集一些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10天

之久，妄图以此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为了混水摸鱼，他们挑动群众进行武斗。造反派头头胡勇一手制造了“长沙解放路武斗事件”。1967年8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见机会来了，乘机挑动武斗。8月21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胡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周××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47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24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58万元的重大恶性事件。

另一造反派头头叶卫东，却是涟源“九·九”流血事件和汝城、涟钢武斗的罪魁祸首。1967年8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47军，与张××等人指派柳××带领200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电告省革筹和47军，省革筹和47军要求他们的队伍“撤回长沙”。叶卫东接到命令后，阳奉阴违，指使柳××去追查打电报的事。

以致造成“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11人，打伤12人，损失国家财产近30000元。

1968年6月中旬，汝城县彭××、何××、陈××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请示怎么办。叶卫东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7月11、12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激战6天，先后打死16人。

1968年6月底和7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王××和湘中机械厂的郑××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在叶的指使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7月16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6人，打伤68人，非法关押29人，损失国家财产190000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在湖南的边远地区湘西，武斗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著名风景区张家界的所在地大庸县，当时曾发生过一场持久的派战。全省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组织力量，赶到大庸，支援自己在当地的“战友”。双方动用了机枪、大炮，死伤无数。一位老红军参与了派战的指挥，因下令枪杀湖南省军区派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而在战后被处决。

在湘南道县，武斗进行得更为惨烈，城里城外交相辉映，杀人如麻。

当时道县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造反组织，一个叫“红

联”，一个叫“革联”。

尽管双方都高呼“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都把对方视为反动组织、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对立的两派，谁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红联”靠着自己的特殊关系控制着农村的基干民兵，并通过区、社武装部，先掌握了一批枪支；8月8日晚，“革联”在“湘江风雷”组织的配合下，夺取了县武装部的枪枝，弄到了比“红联”多得多的枪支弹药，并在县城中心的道具第二中学建立了总指挥部；“红联”也不甘示弱，火速召集了各区、社的武装部长，组织了大批民兵，在城郊营江公社建立了总司令部，并声称“要以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消灭“革联”。“革联”骂“红联”是“手段残忍的法西斯分子”；“红联”骂“革联”是“勾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暴徒。”两相对峙、剑拔弩张。终于，双方动用了枪炮，拉开了武斗的序幕。加上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于是，形势骤变。

道具县城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而街道两侧的墙壁上却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这些都在显示着“红联”与“革联”正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一张“革联”的大字报这样写道：

……道具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之流指使下，策谋已久的……他们集结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民间铁匠大肆制造杀人凶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

多种会议，欺骗贫下中农，堵塞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于他们的屠刀……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一张“红联”的大字报这样对应写道：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

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道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抄、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者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圩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野战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分子的操纵下，一部分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

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整个道县城内，笼罩着浓郁的恐怖气氛。居民家的门多半是紧闭的。除了巡逻的造反派外，几乎没有任何行人，街头的恐怖显得更加凝重。

8月23日上午，“红联”组织了上千民兵在县内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高举毛主席像，喊着口号游行。走到“革联”总部——道县二中门口时，队伍停下了。游行的人高呼：“‘革联’是反革命组织，一定要消灭！”。

“革联”的头目们一听，顿时大怒，派了一群人冲将出来，抓了喊得最起劲的“红联”的两个人进二中。

“红联”的头目大喊：“‘革联’抓我们的人，我们要与反革命拼到底！”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红联”向二中冲去。

当时“革联”的枪已被6950部队封存在二中的一间教室里。当发疯的“红联”冲进来时，只见“革联”的人撬开了武器房的门，进去端起了一挺轻机枪，朝着人群就猛扫。中弹的人纷纷倒地，未中弹的人没命地往外跑。

这次共打死“红联”12人，打伤和相互踩伤的达50多人。其中正在人群做劝阻工作的两位部队同志也受了重伤。

8月29日、30日，道县的“红联”与“革联”又发生了激战。据一位当时参加“革联”的人回忆：“革联”的巡

造队与“红联”的人在县城街上相遇，双方当即发生争吵，互不相让，直至动手打起来。“革联”的人被抓走了10个，还被打伤了好几个。于是，30日凌晨，武斗进一步激化，城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一场大规模武斗开始了。双方动用了重、轻机枪、步枪。在对打中，6950部队的刘兆丰副参谋长带着几个人冲了过来，手里举着“红宝书”，大声喊道：“不要开枪！”。刘等人来到“革联”头目面前劝说，最后劝说无效。双方又开枪打起来。共被打死了5人；每边各两人，还有一名是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

此前，道县农村由于“公、检、法”被砸烂，各地纷纷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此机会，为所欲为，竟随意将人判处死刑。达到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地步。

当时道县的一份材料这样记载：“今年八月以来，道县农村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被害人数上万。老至80岁，小至几个月的胎儿，除四类分子及地富子弟女外，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国家干部、复员军人。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铤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个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烟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削鼻、剖腹、割乳、断肢等手段，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方圆几千平方公里的道县农村土地上，一时间“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让我们来倾听一下这潇河水、这山洞、这山脚地窖的呜咽，让历史老人开口说话吧！

8月下旬的一天，九井河边夜幕显得特别沉重。在小河边的黄土坝村，蒋姓的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灰暗的灯光下，做父母的脸上呈现着恐惧和绝望的神情。本来，大儿子刚从湖南大学回来，他们一家该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团圆饭。可今晚，他们怎么也难以下咽。因为前几天，一股杀人风忽然刮到了九井河畔，他们已隐约感到死神在悄悄地降临到他们头上。

大儿子不相信有人说的那样：道具在到处杀人。他依然能吃下饭，因为他确实感觉到有点饿了。

做父亲的望着这个本应远走高飞的大儿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轻声地说：“你能吃，就多吃些吧。唉，这一次，你不该回来啊……”说完，两眼发气，手中的筷子掉到了地上。

儿子安慰父亲：“爸爸，毛主席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我虽然出身不好，可我走的是革命的路，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多么幼稚的孩子。

父亲名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以后长期在道具中学当历史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具一中的校长。因出身的缘故，于66年底被开除回家。

大儿子蒋小初，正在湖南大学机械系读书，眼看就要毕业，学校突然搞起武斗来，他便回家了。他以为，现在普天之下，武斗狼烟四起，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的家乡。谁知竟是故土的人们将他“斩草除根”。

第二天，天还没亮，蒋勋被喊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

来——他被用柴棒和锄头打死在河边。天亮后，大学生蒋小初和弟弟蒋小钟被他们的乡邻们抓走了。

一天下半夜，一弯冷月横挂在空中。被关在村中一座破庙里的兄弟俩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判官喊了出来，用棕绳五花大绑，往九井河边押去。蒋小初以为这是送他们去另一个地方关押，万万没想到，是押着他们去砍头！

来到九井河边，暗处的乌铳响了。蒋小初连中三铳，身上打满了铁砂。但是，他没有倒，他痛苦而愤怒地叫喊。这时，聂××一边咬牙切齿大骂，一边举起马刀狠命地朝蒋小初的颈部劈去，叫喊声嘎然而止，头颅滚进了九井河。接着弟弟蒋小钟也被以同样的方法处死。兄弟两的无头尸沿着九井河水往下漂去……

他来到这个世界总共才有五十八天。他的“过错”是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没能选择一个成份好的家庭。

一天，一群手执锄头、铁棒、马刀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那七十三岁的奶奶、三十七岁的爸爸、二十岁的大哥、三岁的二哥被抓走了。人们在河边看到了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他的母亲紧紧地搂着他，轻轻地抽泣着，不敢大声哭喊。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夜已深了。他在母亲张××的怀里睡着了。他显得那么安详宁静，无忧无虑。然而，他哪里知道，死神已经宣判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活五十八天。

有人闯进来了。进来的是白天大显身手的37岁的同村人蒋××，尚未娶到老婆。此刻，是来向他那刚刚成了寡妇的母亲求婚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母亲才免遭杀身之

祸。

蒋××发现了他，伸出了那双罪恶的手，抢走了正酣睡的他，冲到了潇水河边，把他抛给了暗暗流泪颤抖的潇水河。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哭一声……

这是一个小山洞，它位于洪门坳的大河边。

他名叫贺远又，14岁。这个聪明、英俊、有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的少年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化为冤魂的。

在那腥风刮起的一天，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去的贺××在他的家里抓住了他。他向贺××求饶，并把家里所有的钱都交给了贺××，求贺不要打死他，贺××骗他说：“我不打死你，只送你去洪门坳山洞陪别人站站”。天真的他相信了。

到了山洞后，贺××二话没说，一掌将贺远又推下了石洞。他跌在了一堆厚厚的尸体上。

他恐惧地爬起来，绝望地问贺××：“你拿了我的钱，为什么还要杀我？”

这时，大队“最高法院”的几个负责人来了。贺××也不答话，用稻草淋上煤油，拌上“六六六”农药粉，点燃扔了下去。浓烟消失之后，他发现贺远又还活着。于是他有点惊恐，连忙将随身带的炸药制成的土炸弹扔进洞里……洞里的呻吟声永远消失了，14岁的少年化作点点肉雨……

这个石洞座落在乱石丛中。很深、很宽。据说，抗战时，不少当地乡亲曾挤在这里躲避日军的屠杀。

1967年8月某日，一群手持马刀，锄头的年轻人，正押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嫗向着山洞走来。

她丈夫很早就离她而去。她守着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养大了三个儿子。继而三个儿又分别娶妻，养下了两儿两女。她没有太多的企求，她只想抱着她的孙儿孙女们安度晚年。然而，这一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在刮起的腥风中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

她知道，此时她正走在去黄泉的路上。然而，她走得十分安详、镇静。她觉得，儿孙们都死光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几个连在一起的张着圆圆大口的阴森森的地窖，周围长着许多楠竹，是鸟儿的乐园。人们把它叫作竹山园子。然而，此时此刻，却听不到鸟儿那欢快的叫声。

大队“最高法院”的人正扭着在家里度暑假的小学教师向生雨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这里。向雨生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

“求求你们，不要杀了我妻子和儿子，你们怎么打死我，我都愿意……”

杀红了眼的人们哪里听得进去？几分钟后，一家三口人便被推进了同一个地窖里。“法官”们将准备好的稻草点燃，扔进了地窖里，地窖口被盖住了，一缕黑烟从缝隙间无声地喷出来。地窖深处，传来了绝望的呼喊声、呻吟声……。

悲剧并未就此结束。

向雨生的女儿，此时正伏在床上恸哭。她知道，她的

父母和弟弟此时已经离她而去了。“法官”留下她，是因为她是一个长相漂亮的18岁姑娘。而“法官”中的×××想娶她，×××年近三十，还未娶上媳妇。

杀完了人的“法官”们冲进了屋子来，揪住姑娘的头发问：“你父母、弟弟都死了，要想活命，就嫁×××！”姑娘听说父母、弟弟已死，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

“法官”见她如此不识抬举，便把她拖到了竹山园子里，那个正冒着黑烟的地窖边……

四条人命。在那个年月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从地球上消灭了。就好象杀几头猪一样简单。

宝宝就要出生了。挺着大肚子的唐水兰异常兴奋。她细心地感受着孩子在肚子里的每一次跳动……

就在这时，压城欲摧的杀人黑云笼罩着整个道县。由于娘家的成份不好，唐水兰难以逃脱死神的怪爪了。丈夫这边大队的“最高法院”决定派张××送她回娘家接受惩罚。那天，正好娘家的下柳大队派唐××来“接”她。

于是，三人在热气逼人的中午上路了。

走到一片茶林时，张××猛然抽出带在身上的一根钢钉，狠狠朝浑身汗淋淋的唐水兰腰部刺去。钢条穿透腹部。唐水兰惨叫一声双手捂住还在肚子里搏动的胎儿，慢慢地倒了下去……她的眼睛没闭上，嘴巴也大张着，似在控诉着人类的野蛮。

道县农村、县城的大屠杀终于惊动了长沙的有关人士。

于是，驻守在离道县不足 100 公里的 6950 部队奉命派人去道县制止武斗。

考虑到农村杀人与“红联”，“革联”的派性斗争有直接的关系，6950 部队的领导分别见过两派的主要头头，并通过他们召集了包括公社、区武装部长在内的有关人员的“全县紧急会议”。会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止！”然而会议刚完，就有人公开声称：“我们杀的是地、富、反、坏、右，有什么不能杀？”“管他是 6950 部队，7950 部队，谁干涉我们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对坏人实行专政，我们就同他拼到底！”……

道县究竟杀了多少人？解放军 6950 部队与道县有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制定了一份《道县大屠杀数字统计表》。据该统计表显示：全县被杀人数为×千×百×十多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 1.2%；其中四类分子××××人，四类分子子女××××人，贫下中农×××人，中农×××人，其他×人。被杀的人中，有中小学教师××人，国家干部××人，复员军人××人，工人×人。杀人共耗资 88234 元，吃掉粮食 421095 斤。

充满血腥的夏秋过去了，寒冬悄悄降临这个曾经疯狂一时的小县。时光渐渐冲淡了暗红的血色，却给道县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永远的沉思。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丧失天良，杀人如麻呢？

据了解，这些杀人者中，听信谣言，盲目行动者有之；借机表示自己“革命”最坚决，以求步步高升者有之；报复杀人，以泄私愤者有之；嫉妒杀人者有之；谋财杀人者

有之；杀人夺妻女者有之；奸污妇女后，怕惹麻烦而杀人灭口者有之……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凡是我们的民族在漫长而野蛮的历史中沉淀而成的种种恶习，均在派斗中化成了涂炭生灵的邪恶暴力。

第五章 巴蜀硝烟

“夺权！夺权！再夺权！！”，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大行“打、砸、抢”。他们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下，展开“全面内战”：攻占兵工厂，抢夺枪枝弹药。高射炮平扫朝天门，坦克横冲直撞，大炮狂轰滥炸对方据点，四川由此陷入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

5. 1. “夺权”旋风

1966年，中国上空的政治阴云越来越密，越积越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部分学生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们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全国迅速撤销了政府、军队进驻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

1966年5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通知的决定”，研究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会议于6月10日结

束。接着，省委发了特急文件，布置全省普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求所有大专院校一律停课参加运动。每一个大专院校都要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统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

1966年9月4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10月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此时北京红卫兵造反学生已来到四川，开始四处进行“革命串连”，“煽革命风，点革命火”。于是，会议被迫停止。直到9月17日才正式开会，中途又开开停停，于12月2日才结束。

“全面夺权”之风暴席卷全国，同样席卷四川大地。

在夺权的最初阶段，中央文革出于需要，实际上是支持“造反精神强的”、打倒“走资派”坚决的“激进”造反派进行夺权的，这种支持往往又是通过派往各地中央文革当时的御用亲信组织，如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之类的首都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的支持来表示的。全国如此，四川亦如此。

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主体的首都“三司”的驻成都联络站红卫兵召集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都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兵团”等30多个“激进”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面授机宜，策划夺权，成立“成都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

1966年9月底，上述造反组织头头伙同首都“三司”驻成都联络站的红卫兵头头，率领20多个造反组织的大队人马，突然开进中共中央西南机关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夺

取了一切大权。西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被拉上街头，轮番批判斗争。自此，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1月4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院里，到处张贴着标语，被造反派进驻夺权了。事情惊动了中央。1月6日，成都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对电台实行军管，并决定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停办自办节目。至9月，电台由省革委筹备小组接办，一直延续到1971年6月29日，才恢复自办节目。

1967年1月12日，《四川日报》被夺权，改版《红色电讯》，不久又被迫停刊。自此，《四川日报》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3日，开始由一派组织用“《四川日报》新一号”的名义出版；21日起，另一派群众也用“《四川日报》新一号”的名义出版了另一张报纸。这种各自为战，互唱对台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月25日，军队对报社实行军管才停止。此后，由报社军管会领导出版《四川日报》。

到4月18日，《四川日报》又改名《红色电讯》，不发报社自编自采的稿件。到8月14日，《四川日报》由省革命筹备委员会接办后又停出《红色电讯》，改出《四川日报》电讯版。9月9日开始，才正式出版作为省革筹机关报的《四川日报》。1968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四川

日报》从6月1日起又成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本省地方新闻直至1971年6月29日才恢复。

1967年1月21日，渡口市，攀枝花建设指挥部被“造反派”夺权。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头目们如获至宝。

当日，重庆市37个造反派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夺权，首先要夺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4日，由40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随之，夺权之风刮向全市，重庆市迅速处于瘫痪之中。

1月下旬，重庆广播电台，市经委、重庆钢铁公司等机关、厂矿企业相继被造反派夺权。

与此同时，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的“一月风暴”正席卷四川各地。四川美术学院、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相继强行解散院校党委，夺取了领导权。

1月23日，成昆铁路工地指挥部的领导权也落在造反派的手里。接着，沿线工地两派群众发生磨擦，相互指责，直至发生武斗，许多工地陷于瘫痪之中。下半年后，这里的情况更为严重。第二工程局施工地段的各级指挥机关均被夺权，大量施工人员外流，铁路修建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直至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总理获知此事后，深感事

态严重，指示“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196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的指示之后才复工。但工期因此而延误了两年，损失资金达7.2亿元。

1月26日，西南地区当时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豆坝电厂施工现场由于被“造反派”夺权而大乱，工地指挥机构完全瘫痪。

在全面夺权的狂风中，军队，这个共和国的柱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形势非常危急，终于惊动了毛泽东。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非常严厉的书面指示。大意是：绝不容许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份子。对于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可以放他们回去。

这之后，四川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镇压事件”。《军委八条》下达以后，成都军区由于支持大派“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愈来愈猛烈的攻击。成都军区机关门口发生了部分工人、学生静坐绝食示威。1967年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通告，通告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围攻、架走我军人员。现在强行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领导机关营区的外来人员必须迅速离开。2月17日，军委秘书长叶剑英

批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从2月18日开始，成都军区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四川用飞机散发了这封公开信。公开信宣传了中共中央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宣传了《军委八条》，指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反派把斗争指向人民解放军，提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向军区静坐示威，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围攻军区人员、企图冲击军区是严重违反中共中央的决定的，劝告参加静坐示威的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煽动捣乱，尽快撤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队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然而，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他们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这些话那里听得进去？他们喊着口号，肆意地冲击军区机关，而且愈冲愈勇。军区在退避三舍之后，抓了許多人，数量有万人之多。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但很快就放了许多人。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军区的一些干部、战士和“产业军”并不信服这一决定。于是，两大派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了。

1967年的1、2月份，四川的夺权风潮如火如荼，如疯似狂。如果说，在1966年只有部学生，大部分干部和一部

分工人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可以说，在1967年1月以后，全民包括军队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全面夺权是以党的名义发出的。在夺权面前，人人无可回避地要表明态度。因此，全民都卷入了，而群众组织则因为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一致重新分化和组合，成为两个派别的斗争。于是，1966年的“革”和“保”演变为具有新的内容的“革”和“保”，因为，有“夺权”就必定有“保权”——全面派战势在必发。

5. 2. “产业军”发誓：“血洗川大，头断四川”

随着“夺权”与“反夺权”之间更加深入、激烈的较量，成都红卫兵组织日渐形成两大派别——“产业军”和“革命造反派”。

“产业军”是以“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成都电机红旗”工人和基层干部为主要成份组成的声势较大和人数较多的造反派，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

“激进派”是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四川工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工业学院等红卫兵为主要成份组成的，称为“革命造反派”。

由于操纵这两派的头头有着相对立的利益冲突，所以这两派之间的争斗也就越演越烈了，直至发展为誓不两立的仇敌。

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

断四川，血洒西南”。

而在“激进派”看来，“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一定要揪出来打倒，再踏上一只脚。

1967年4月4日，成都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一群群有组织或是无组织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向四川大学蜂涌而去。这座四川的第一高等学府此时涌动着许多戴红袖章、读语录、喊口号的人们。

校园内，各种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最醒目的是大幅大幅黑森森的墨写标语：“炮轰成都市委”，“打倒‘土皇帝’李井泉”和毛泽东诗词《送瘟神》中的名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还加上副题：“送给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大标语下，大对联前拥挤着情绪激愤的人群。

人，越来越多。先是几十个，接着是上百工人、机关干部团团围住十几个、几十个贴标语的学生。

开始是辩论，接着是喊口号：“打倒小邓拓”、“不准右派翻天”、“绝不许牛鬼蛇神污蔑党和革命领导干部”等等。口号汇成声流，淹没了学生们声嘶力竭的演说。

接着有“产业军”的人冲向标语、对联，动手撕扯。

“激进派”学生们突破重围，在大标语前手挽手，排成行，阻挡前冲的人们。

发生了对骂，发生了推拉撕扯。

学生一次次被冲散，又一次次汇集，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混乱中，有人举起了拳头，砸了下去。接着，就是你

来我往，拳脚相加，高呼“打倒右派……”

口号声夹杂着惨叫声。

流血了，鲜红的血从被打伤者的口中，鼻子里涌出……

这一天，有几十个人被打伤。

在后来的几天里，形势急转直下。

“激进派”红卫兵纷纷来到川大，支援川大；“产业军”的红卫兵也戴着安全帽、木棍来支援他们的“战友”。

一场大规模的冷兵器武斗在此展开。先是互掷石块砖头，然后是挥舞着木棒、锄柄混战，再后是动用匕首、铁条、铁棍……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采取革命的行动。

这场武斗至4月底，双方有数十人死亡，超过万人受伤。

5月6日早晨7时，“造反兵团”集结了近10万人，包围了成都“产业军”的总部——电信工程学院及四川棉织厂。

面对“敌人”的进攻，“产业军”也不甘示弱，及时采取行动：派人四出活动，动员、组织附近的工人、农民数万人，与“造反兵团”展开大厮杀。

围城的是—片黑压压的人群，没有派旗、却戴着鲜红的神章，有的头戴藤编安全帽，手里拿着铁棍、弹弓、锄柄等武器。

藤编安全帽下是一张张严肃、凛然、带着视死如归神情的脸，大部分人面带稚气。

电信工程学院和棉织厂内，在各种各样的物件垒起的障碍物后面和楼上的窗户后面，有戴安全帽的，有没戴的，脸上的神情同样严肃，同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对峙的双方对视着，在对方的对伍里不断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亲戚、朋友甚至父兄和过去的恋人。

对视的眼睛里没有亲情，只有仇火。这仇火将驱动着他们失去理性，甚至失去人性。

直到多年以后，经过一次次地反省和思考，他们才渐渐明白，当时为什么眼里只有仇火，为什么会丧失理智甚至人性。他们都为手上这永远也洗不掉的血腥而悔恨，终身悔恨。而当时却只有仇恨。

总攻击开始了。

“造反兵团”冲不进重兵把守的学院大门。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先锋，抬来大根本头冲撞大门和围墙，终于撞开一个缺口，冲散了“产业军”的手拉手组成的防线，冲进了院内。

又是一场石头对石头，木棒对木棒，铁棍对铁棍，匕首对匕首，硫酸瓶对硫酸瓶的面对面短兵相接的血战。

人们边打边喊着各自的革命口号，相互冲杀追逐，从院内打到院外，又从地上打到楼上……。

装着六六粉的灯泡在空中横飞，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有人中毒倒下了。装着浓硫酸的瓶子飞向各自的目标，炸开后；周围的人立即皮肤焦烂。棍棒在飞舞，匕首上下翻飞。

手持“冷兵器”的格杀，是那樣的野蛮，残忍。

血肉在迸飞。

一个个红卫兵被当场打昏在地。

打红了眼的其他人竟一个个踏着他们的身体冲过去。

一个十五六岁的红卫兵被从二楼的窗口推下来，头被

摔破，鲜血涌出，染红了好大一块地面，惨叫声不绝于耳。

一个十六岁的红卫兵舞着一根钢钎，刺向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这工人闪躲不及，竟被当胸穿过，立即毙命。

又一个红卫兵昏倒在地，头破血流，额骨显露，伤口长达六七公分。

更为残忍的是，在混战最疯狂时，救护车竟被打坏，司机被打伤。车瘫在门外，不能进来救护，血就这样不住地流……

双方伤亡惨重，约有 5000 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所有医院均告爆满，仅四川医学院附属病院，就收容有伤者 850 余人，其中重伤者达 160 余人。

人们已经不由自主地步人流血的政治——战争，自相残杀的内战。

面对同派的鲜血，后来又面对“难友”的尸体，他们歇斯底里地爆发出异口同声的怒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场武斗循环往复，一直继续到 5 月 7 日。两派红卫兵的头目们天天拍“急电”向北京告急，相互指责对方挑起事端，指责对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中共中央以为：四川事态已极为严重，即于七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与中央军委联名，撤销了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庭的军政各职，另派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接替。

但此项决议并未使四川局势有所改善，反而激起了“产业军”与“造反兵团”一次又一次更严重的流血冲突。

1967 年 5 月 6 日凌晨。

“产业军”约 1000 多人，趁着天黑，悄悄地包围了制造弹药的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即 132 兵工厂），突然发起攻击。守厂的“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 100 多人靠着猛烈的火力和有利的地形，暂时顶住了“产业军”的进攻。虽然在人数上“造反兵团”红卫兵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表现得很勇敢，似乎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东边露出一片晨曦，他和 130 多名红卫兵刚刚以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的疯狂攻击。

“战友”们有的在闭眼养神，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在大口喝水，吞咽面包，有几个女红卫兵把被打死的尸体移到墙角，并给他们盖上鲜红的派旗，有的在往机枪里压子弹。

他没有受伤，因为他没有上第一线。他还不满 15 周岁，是 66 级初中生。他的任务是通讯联络和运送弹药。

没有人说话，都在认真听，听一位怀抱着一支半自动步枪的女同学哽咽但很动情地唱：

造反的旗帜，
高高飘扬
战友鲜红的血染成，血染成
为了保卫毛主席
不怕流血敢牺牲
亲爱的战友啊，您放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

……

那段时间，还有在后来半年多的血与火的战斗中，他们经常唱。

开始唱得很豪壮，后来唱得很悲壮，再后来，唱时心头总浮起疑虑和迷惘交织的烦乱，莫名的烦乱；再再后来，唱着唱着，便唱不下去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的不少同学，就是唱着这首歌，过早地走完了人生的路。他们走时，很英勇、很壮烈，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绝没有他们的位置，虽然在他们的墓碑上也有“壮烈牺牲”的字眼。

“敌人”又冲上来了，枪声又响起。

虽然守厂的红卫兵很英勇，但寡不敌众。

虽然头头们在一遍遍地做战地政治思想工作，不停地高喊着：“誓死保卫132厂”，“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在看着我们战斗”，但情况已是万分紧急，死伤人数在增多。

一阵枪响过后，做“战地政治思想工作”的头头没动静了。他们看得很清楚，头头正好被一颗子弹击中脑门，应声倒下了。鲜血从后脑勺炸开的拳头大小的洞里涌出。他们吓呆了，正在愣神的一瞬，一颗子弹射穿了又一人的左肩，他立即昏了过去……

这场争夺兵工厂的战斗结束了，共有100多护厂红卫兵命赴黄泉，双方伤者无数。

“产业军”攻占了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第三天晚上，“产业军”头目们召开会议。头目们认为，只有夺取更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产业军”，才能全面战胜“造反兵团”。

于是，他们的目光又盯住了当地最大的军火库——新

津军火库。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产业军”又杀死了守厂的100多名护厂红卫兵，占领了该厂。“产业军”每人获得一支步枪及五发子弹。

“产业军”成为一股具有强大武器装备的专业武斗队伍。

“革命造反兵团”也不甘示弱。由于他们开始就举着“夺权”的招牌占领着兵工厂；因此“革命造反兵团”也拥有大量的枪支弹药。

四川局势在不断地恶化，就好象导火线已燃完的炸药包，谁也阻止不了爆炸的发生。

1967年5月11日，由于西南局书记曾××公开支持激进派，“产业军”头目们大为恼火，率领几百人将曾××抓走。

从1967年5月4日起，宜宾地区开始武斗。双方动用机枪、坦克、火炮等武器。

5月15日，“产业军”和“造反兵团”各自组织了近两万人，声援宜宾大战。战斗不断升级，死伤人数上千。

1967年7月20日，在成都两派总部的挑动下，泸州的“产业军”和“造反兵团”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双方参斗人数共有2000多人。武斗中，双方均动用了轻重机枪等武器，用高射炮平射，船被打得千疮百孔。击沉船只1艘，打死4人，伤数十人。

继而，9月和翌年7月，泸州地区又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武斗，死亡数百人之多，仅泸州化工厂江边船只就被击毁21只，损失达50万元。

1967年8月18日，成都牛市口，两派群众发生武斗，成都无缝钢管厂建设全面停工，生产停产。

1967年8月，江津地区、中江县、内江等地，两派群众相继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这些地区的武斗一般是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1969年8月左右。与此同时，南充、涪陵、西昌、万县部分地区长期武斗不息，死伤无数。

“这是一场噩梦。”经历这场浩劫的人们今天如是说。

清醒时，追忆噩梦，不寒而栗。

但愿我们的共和国不再有这种噩梦。

5. 3. 重庆常规武器大战

政治的暴风骤雨肆虐地摧残着这个古老的山城，狂风挟着暴雨裹着雷电，常常是突如其来，又倏然而去。这一个个的暴风雨过后，都给山城留下斑斑创伤。那残垣断壁似乎还萦绕着炮弹爆炸的硝烟味，那白色的石灰墙上是密集的弹痕，地上残留着一滩滩紫黑色的人血。

在疯狂的鼓动下，内战不断地升级，大规模的流血惨剧一次比一次惨烈。骇人听闻的事件随时都有可能突发，无法预料，更无法制止。

现在，回忆起那些年月，两派的过来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有几只神秘无形的大手在这座城市上空挥舞，呼风唤雨。在它的阴影笼罩之下，人们着了魔似的狂乱昏花，两派就象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不同窝的蚂蚁一样，一队队身不由己，乱烘烘撞来撞去，杀来杀去。

有人想制止这种撕杀，但谁也制止不了——其实，谁又敢站出来制止呢？在那个年月！

还有什么事情比枪杆子掌握在一群极端狂热，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可怕呢？重庆，这块土地注定要经历一次特殊的血与火的“洗礼”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8月两个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说这句话时，毛泽东的脸上再也找不出风趣和诙谐来了，因为面对这场“天下大乱”，他也只能望而兴叹——他已无法驾驭这场运动沿着他老人家的意志轨道运行了。

湖北，武汉武斗不断，仅6月4日至6月30日就死了108人，伤了2000多人，而且越斗越激烈，朝着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发展。

广西，7月12日，滨海城市北海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木棍、石头对打，激战不断，受伤者达100多人，重伤者30多人。7月13日，造反派突然袭击广西军区警卫连和驻地区党校分部的野战军1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余枝，轻机枪三挺，六〇炮一门和一大批弹药……

可以说，全国遍地武斗，遍地狼烟。而且两派把武斗性质都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对立的派别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重庆，红卫兵的串连、夺权、武斗愈演愈烈。

1966年6月10日，省委发出文件，布置全省普遍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专院校一律停课参加运动。每个大专院校都要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两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于是，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

大专院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学校的党政学术知名人士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轮番批斗。8月2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不堪迫害，于凌晨5点20分自杀身亡。

8月3日，中共重庆市委作出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各学校工作组撤出校园。各学校学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

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群众组织，请重庆大学群众组织声援。当天，重庆大学学生黄××、吴××、周××等率领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市六中学生4000余人去重庆师专声援组织夺权，与该校其他师生发生摩擦。黄××、吴××、周××等4人赴中共重庆市委要求给予支持。重庆市委获知此事后，派书记辛易之前去重师，辛易之书记批评了黄××、吴××、周××等人的行为，他的表态未能满足黄、周等人的要求，引起黄××、周××等人的不满。两方相互指责、辩论，坚持到深夜12时才返校。8月26日，周××等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把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八·一五”。“八·一五”造反派后来发展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第六中学学生对前一天的重庆市委的决定耿耿于怀，经黄××、吴××、周××等人密谋，于8月16日，将批判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的1000余张大字报贴满了市委大院内外，造反学生开始进行“革命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9月1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在市文化宫成立。

9月6日，4000余名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市人民大礼堂集会，听来渝串连的首都红卫兵工作报告。

9月8日，重庆大中专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

9月20日，重庆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合并，统称为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24日，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反对强制合并，到中共重庆市委静坐示威，占领市人民大礼堂要求市委解决。26日，他们决定赴北京请愿。10月6日，1500余名红卫兵到达北京。

10月20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坚定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的通知》。

10月30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等8个群众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13万人参加大会。市委书记辛易之，廖苏华等被强令参加大会。

11月9日，《人民日报》以大标题刊登了大连海运学院15名红卫兵步行2000里到达北京的消息。重庆市红卫兵看到这一消息后，也相继组成长征队，陆续开始步行串连。

11月13日，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小南海火车站堵截列车，强行上车，致使列车停开3个小时之久。

晚上，由重庆开往北京的客车，在九龙坡也被串联的红卫兵堵截。至次日6时，列车才开始继续前进。

由于红卫兵的大串连，全市已运输串联红卫兵104.4

万人，严重扰乱了重庆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致使车站，港口堵塞状况日益严重。至11月27日，九龙坡车站积压物资1.34万吨、待卸车皮140个，港口积压5.5万吨。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先相互辩论，后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员。

12月23日，《重庆日报》刊头由原来的邓小平题词改为正楷印刷体。没过几天，重庆日报社造反派组织和学生造反派组织强行停刊《重庆日报》，改为《新闻报道》。

为“破四旧，立四新”，重庆大批学校、街道、农村人民公社、商店纷纷更改名称、更换的新名称都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从1967年1月上旬到下旬，重庆电台、市委、公司厂矿、学校均被造反派夺权。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奉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驻渝部队从1月下旬起，派出大批干部和连队分赴钢铁、煤碳、基建、国防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实行“三支两军”，至4月10日，共军管企、事业单位48个，进驻33个。

1月29日，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任白戈、鲁大东、廖苏华、余跃泽。会议后又进行大游街。

由于没完没了的游行、串连、批斗，重庆的生产急剧

下降。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个月下降 9.9%；钢材下降了 10.6%；煤碳下降了 14.4%。主要产品产量有的下降了 45.6%。全市码头、港口、车站堵塞积压物资 12 万吨。

1967 年 2 月 1 日，由造反派把持的《新重庆报》出版发行，代替过去的《重庆日报》

2 月 8 日，重庆 46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公告号召造反派继续全面夺权。

由于对“革联会”的不同看法，造反派内部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从此，这两派组织成了冤家对头。

2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发出《联合公告》，共 8 条。公告表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希望造反派联合起来；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随意抓人，体罚和变相体罚等。

2 月 19 日，重庆市“革联会”召集 60 万人在珊瑚集会，批斗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等。

4 月 6 日，市“革联会”发出《关于目前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共 8 条。

4 月 23 日，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革联会的“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发展为相互推桑，动拳头，继而是砸宣传车、广播

器材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共5条。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职务；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委蓝亦农任组长，副军长白斌任副组长。

5月23日，“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在全市蔓延，重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武斗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横遭毒打。

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武斗打得难分难解。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6月12日，重庆市革筹、人民解放军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的8条禁令。

由于武斗升起，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城乡市场极度混乱，商品供应日趋紧张。某些人民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出现危机。全市粮食库存供应量由28天下降为13天，不少地区煤炭、猪肉、蔬菜脱销。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五月份下降22.3%。

7月2日，重庆市革筹、重庆警备区再次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制止武斗，呼吁各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但是，两派群众组织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挑起更大规模的武斗。

7月8日，重庆革筹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对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任白戈大批判的通知》。决定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展开对任白戈的批判。

“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在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战斗结果，有9人被打死，各自约有100人被对方抓走。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文革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

7月23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们的喉舌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改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予坚决的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

江青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像一盆油泼向到处都烧着战火的中国，泼向已经点燃的重庆战火。

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迅速为重庆两派组织接受。哪一派都认为自己这一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立的一派即为“阶级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进行“武卫”。于是，大开杀戒，成为名正言

顺的“革命”行动。

更为惨烈的重庆武斗即将爆发。

7月25日，两派群众（“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枝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名伤亡。

这场武斗之后，两个造反派头目们知道，要打垮对方，就得弄到比对方更多、更先进、威力更巨大的武器弹药。

抢枪，“八·一五”急于抢枪，“反到底”也急于抢枪。他们都急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抢枪还不仅仅是报仇，雪恨，对派头头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掌权。

派头头们是这样说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这场决战的实质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这些，号召夺权的中央文革太清楚了，进行夺权的派组织特别是派头头们太清楚了。

于是，派头头们进而如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不仅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进行文攻，对他们展开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而且一定要依靠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枪杆子，进行武卫……否则，就不能完成这一场夺权斗争……”

终于，在全市各地相继发生了抢劫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的事件，全市枪战升级。

7月28日晚十一点，“反到底”派200余人趁着天黑，摸到了嘉陵机械厂（军用工厂，已被“八·一五”派红卫

兵占领)，偷偷潜入厂房，偷到了3挺机枪，步枪、冲锋匹30多支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的护厂红卫兵发现了，护厂红卫兵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向“敌人”，“反到底”红卫兵也立即开枪还击，但火力比不上高射机枪，另外护厂红卫兵占着有利地形。“反到底”红卫兵立即有数人倒在血泊中，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那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

据不完全统计，双方共抢走的步枪、冲锋枪2000多支，轻机枪80多挺，六〇炮20余门和一大批弹药。后来，双方还拥有重机枪、大炮、装甲车、坦克等现代化武器。

7月31日，重庆市郊县荣昌县，两派在城内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达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共被打死78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此番大战一直进行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

造反派武斗组织连续抢劫长江上航行的客、货轮。据不完全统计，至8月5日，共抢劫百货356万吨、食品504万吨、生猪2398头，以及医药、香烟、罐头等，价值百万元。导致重庆至上海、武汉的内河客、货轮运输中断近40天。

一位目睹当时惨剧的姓张的老人如是说：“打红了眼的造反派们，跟土匪是没有什么两样！”

8月5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

等武器之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威力巨大的武器，双方共有 22 人成了冤鬼，伤者近千人。

8 月 8 日，国营望江机械厂（军用工厂）的造反派组织用改装的炮船 3 艘组成“长江舰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袭击另一派船只。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打死 24 人，打伤 129 人，打沉船只三艘，打坏 12 艘。大批工厂停产，长江交通为之中断。

8 月 12 日，“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在国营嘉陵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达千人，支援人员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伤者达 600 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357 万元。

8 月 13 日，国营望江厂造反派武斗队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另外两名战士，一名工人。

8 月 14 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 11 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市第六中学生学生宿舍一幢，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直接损失 50 余万元，大火把 1300 名干部的档案和大量文件资料也烧成灰烬。

8 月 18 日，重庆两派组织在沙坪坎潘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 128 人，伤者无数。潘家坪招待所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次大规模流血事件一直进行到 8 月 20 日。

8 月 22 日，两派武斗组织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

打死 22 人，伤者数十人。打坏房屋 7 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 17 个和居民 34 户，抢走办公用具、手表、电讯器材等 9183 件，粮食 4300 余斤。

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 3 辆小车在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遭到群众武斗组织伏击，一名处长被打死，打伤副处长以下 5 人。

8 月 28 日，北碚区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人员 3000 人在歇马场 424 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 40 人，经济损失重大。

8 月中下旬，两派武斗组织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达 4000 人，动用了各种枪炮及坦克。双方还组织人员前往支援。经过一周的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变成了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 200 余人。“八·一五”派完全控制了杨家坪地区及国营空气压缩机厂。

这个月，据省革筹派来的调查组到重庆调查武斗损失情况表明，重庆 165 个大中型企业，因武斗停产或半停产的达 157 个，其中完全停产的达 109 个。因停产减少产值 3 亿元；厂房、民房和大量物资遭到严重破坏，直接损失达 1 亿元。主要公路被切断，交通基本瘫痪。

9 月 1 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地区及国营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一万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在内战正酣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传达到重庆。全市武斗逐渐有所降温,武斗两派陆续向解放军上缴武器、弹药。但各地仍有零星战斗。

9月15日,据市工业指挥部统计,全市工交系统被造反派抢劫的船只达18艘,12740匹马力、车辆354辆。

由于“全面内战”,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全市工业总产值仅完成2.4亿元,仅相当于3月份的75%。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学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名学员、群众受到重伤。

12月4日,由于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国营江陵厂发生重大火灾。3个车间8000余平方米厂房和315台主要设备被付之一炬。

时间来到1968年,饱尝战火之苦的重庆人以为中央下达《九·五命令》后,从此可以平息战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了,但是,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在京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和重庆驻军的领导成员,对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强烈的关注和气愤。江青却说:“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说:“可以改进技术”。同时,江青还称:“华莹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鼓吹大揪叛徒,打击老干部。

这席话,使本来趋于平息的武斗又重新注入了兴奋剂。

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两派群众组织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6天7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中断，市场粮食，煤炭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出现抢购，人心惶惶。重庆市四大煤矿（天府煤矿、南桐煤矿、枪藻煤矿、中梁山煤矿）生产也急剧下降，由1月份的平均日产6272吨锐减为4706吨。

4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又在国营长安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大炮、坦克等武器，使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全厂停产。

连月不息的武斗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4月28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等立即找重庆造反派头头黄××、周××等谈话，向他们严肃指出：抢枪是违反“九·五”命令的，直接影响战备和抗美援朝任务，要求立即停止抢武器的错误，抢去的武器要统统交回，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

晚9时10分，两派武斗致使国营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途经重庆钢铁厂时，竟遭到该厂群众武斗队的枪击，毫无防备的消防干警立即有30多人倒在血泊中，其中有9人死于非命、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气愤的周恩来总理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发生的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了四点强硬指示。总理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办事。这是中央的意思，是军委的意思。

次日，长寿县造反派非法打开8个公社所在地的国家粮库，将218万斤粮食賄买农民，致使国家损失20多万元。

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

五”命令、“二·六”命令和周恩来总理4月份两次指示，严令各造反派武斗组织于5月7日18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予以强制取缔。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市体委实行军事管制。

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为全市党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蓝亦农，副主任鲁大东、白斌、岳林、庚兴盛、黄廉、袁金梁、李大森、熊代富。

6月6日，新成立的市革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作出《关于维护革命新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造反组织必须解散武斗组织，召回武斗人员，拆除武斗工事，在6月12日18时之前，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无条件上缴。愈期不交者，以窝藏军火论处，人民解放军有权随时搜查。

虽然造反派已将大部分武器上缴。但是各派之间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武斗只不过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一种手段。

重庆上空的空气依然是紧张的，火药味似乎又变浓了：市内多处出现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抢劫各种车辆，酝酿大规模武斗的迹象。

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深知事态严重。6月30日，市革命委员会、重庆警备区联合发出《紧急通知》，严令禁止武斗。

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在国营江陵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火炮、轻重机枪等武器。4个车间被炸塌，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成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这是市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发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也是伤亡人数最多，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武斗。

7月上旬，两派武斗组织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国营建设厂、国营空气压缩厂，重庆医学院、424部队、五一材校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双方使用水陆两用坦克、三七炮，四〇火箭筒、高射机枪、野炮等重武器。许多楼房被夷为平地，大批武斗人员死亡，头破血流、残肢断臂者无数，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使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多之久。

7月15日，重庆造反派武斗组织在隆昌石燕桥火车站抢劫援越物资。

次日，周恩来总理急电省革委主任张国华，提出两点指示：一、不管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二、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坚持按照中央“七·三”布告办事。造反派被迫退回抢劫物资，并公开检讨。

7月24日，市革命委员会，重庆警备区发出《关于维护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知》。规定：对各级农村领导班子，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进行夺权和打、砸、抢、抄、抓；坚决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准到农村串连，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等等。

8月23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重庆警备区作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月底，重庆警备区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队、船队，打通了中断半年之久的重庆至泸州、遂宁、达县等处的被武斗组织长期占领的水陆交通线，逐渐恢复了重庆通往各县的交通线。

10月15日，重庆两大派组织在市人民大会堂集会，宣布从即日起撤销各自总部、解散组织。“八·一五”派宣布撤销的组织有：重庆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八·一”兵团总部、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工分团。“反到底”派宣布撤销的组织有：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部、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财贸井冈山总部。

在北京举行的清理阶级队伍的中央“八·一五”会议后，重庆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国营望江机器厂的邓××、国营空气压缩机厂的方××等被捕。12月3日，省委决定撤销邓长春省革委常委，方文正重庆市委常委职务。

重庆市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战争给重庆人留下的创伤不知何时才能愈合。死者长已矣，只是这些在刀枪下死于非命的冤魂身后的亲人们此时此刻能平静吗？

5. 4. 狂热的代价

狂热渐渐退去，四川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却为此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浩劫中：
有 1544 个年轻的生命成为冤魂；
受伤人数达 30000 人之多；
被打坏的房子有 4000 余间；
被击沉击伤的船只有 40 多艘；
大批的工厂和水陆交通瘫痪；
大量的援越物资被抢，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30 亿元。

1967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红卫兵动乱的加剧，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生产中断，运输阻塞，全四川省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和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

这一年，实现社会总产值 193.92 亿元，国民收入 106.2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 1966 年下降 13%、13.2%。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 134.67 亿元，下降 11%，其中：工业总产值 71.34 亿元，下降 17.8%；农业总产值 63.33 亿元，下降 2%。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量，钢 37.8 万吨，下降 19.9%；生铁 19.6 万吨，下降 35.7%；水泥 74.9 万吨，下降 26.3%；原木 167.92 万立方米，下降 45.6%；金属切削机床 1630 台，下降 30.7%；农用化肥 17.26 万吨，下降 14.9%；纱 4.33 万吨，下降 28.1%；布 2.2 亿米，下降 30.4%；食糖 8.68 万吨，下降 14.2%；原盐 71.87 万吨，下降 10.4%；机制纸板 11.42 万吨，下降 8.7%。主要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153 万吨，下降 2.6%；甘蔗 111.9

万吨，下降 10.3%；生猪年末头数为 2996 头，下降 2.06%。

这一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62.90 亿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上半年增长 7.6%，但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下降 8.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8.7%，比 1966 年减少 42.8%。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548 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比 1966 年下降 2%。主要消费品人均年消费量，粮食 216.5 公斤，比 1966 年下降 5.3%。

1968 年，由于长期武斗的影响，四川工农业生产继续大幅度全面下降。本年实现社会总产值 146.20 亿元，国民收入 83.5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下降 27.1%。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102.56 亿元，下降 21.8%。工业总产值 44.88 亿元，下降 37.1%。其中：轻工业产值 22.38 亿元，下降 29.1%；重工业产值 19.50 亿元，下降 45.1%。农业总产值 57.68 亿元，下降 8.9%。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 17.3 万吨，比 1967 年下降 63%；生铁 81.3 万吨，下降 58.7%；钢材 17.25 万吨，下降 67.4%；原煤 988 万吨，下降 22.5%；发电量 26.81 亿度，下降 31.4%；天然气 10.58 亿立方米，下降 9.3%；水泥 40.2 万吨，下降 46.3%；原木 11.87 万立方米，下降 26.7%；金属切削机床 1265 台，下降 26.3%；布 1.99 亿米，下降 9.3%；食糖 7.56 万吨，下降 12.9%；原盐 55.85 万吨，下降 22.3%；机制纸及纸板 9.03 万吨，下降 20.9%；粮食 2009 万吨，下降 19.7%；麻类 1.89 万吨，下降 24.4%；生猪年末头数 2763 万头，下

降 7.8%；猪肉产量 72.05 万吨，下降 14%。

这一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2.39 亿元，下降 16.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8.59 亿元，比 1967 年减少 54.1%。财政总收入 8.31 亿元，减少 44.3%；总支出 8.40 亿元，增加 23.6%，收不抵支，这是四川解放以来出现的严重财政赤字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524 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 1967 年下降 1.6%。

这一年，由于动乱影响，从 1964 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已基本上陷于停顿。城乡市场供应紧张。肉、食糖、食用油等食品严重匮乏，连食盐这种日常生活的必须食品也一度脱销。

1969 年，全年虽仍然处于大动乱之中，但是，到 1969 年的下半年，武斗有所减少，政治局势趋于暂时的相对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但与 1966 年相比，仍然相当低。

这一年实现的社会总产值 189.02 亿元，国民收入 99.95 亿元，按可比价值计算，只分别为 1966 年的 85.6%、82.7%。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工业总产值为 129.57 亿元，只为 1966 年的 85%。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1966 年的 81.4%；农业总产值 58.97 亿元，为 1966 年的 91.3%。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 16 万吨，为 1966 年的 60.3%；生铁 10.4 万吨，为 1966 年的 34.1%；钢材 37.2 万吨，为 1966 年的 53.8%；原煤 1347 万吨，为 1966 年 87.2%；水泥 77.3 万吨，为 1966 年的 72.1%；原木 139.92 万立方米，为 1966 年的 47%；纱 4.94 万吨，为 1966 年的 82.1%；农用化肥 9.03 万吨，为 1966 年的 44.8%；布 2.68 亿米，

为 1966 年的 84.9%；食糖 7.53 万吨，为 1966 年的 74.4%；原盐 41.54 万吨，为 1966 年 51.8%；机制纸及纸板 8.05 万吨，为 1966 年的 64.3%。

主要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020.5 万吨，为 1966 年的 91.4%；棉花 12.15 万吨，为 1966 年的 74.2%；油料 30.91 万吨，为 1966 年的 85.1%；甘蔗 99 万吨，为 1966 年的 79.4%；麻类 1.55 万吨。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27.88 亿元，为 1966 年的 85.3%。全年财政总收入 11.80 亿元，为 1966 年的 63.3%。

人民群众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经济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体现出来的，然而，这场浩劫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恐怕是难以用言语和数据来表达的。

第六章 血染上海滩

上海是文革的重灾区。

这里所披露的是“文革”初期“造反司令”王洪文及其“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上海滩上策划的一幕幕血淋淋的武斗场面。

据说，当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上柴武斗纪录”的录相后，连连摇头说：“过火了！”

事情的真相如何？

让我们翻开这一页沉重的历史档案……

6. 1. “踏平康平路”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冲击之下，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摇摇欲坠。

上海滩，处于大乱之中。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过，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行，要摧毁中共上海市委，必须在后院放火，内应外合才能成功。

1966年11月4日、25日、28日、29日、12月12日，姚文元在北京一次又一次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挂长途电话“策反”。正在为陈丕显、曹荻秋草拟“检查稿”的徐景贤“反戈一击”了。

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文化广场。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奉命造反”，根据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在这里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红革会”动员了8000名红卫兵压阵助威，并帮助他们揪斗了陈丕显。“工总司”也派了1500名工人声援。当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宣告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张春桥制造的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紧密配合“工总司”，在市委机关内部，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难怪，1967年在一次上海“工总司”的头头会议上，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象个改朝换代的样子！”

据说，张春桥签约承认“工总司”，引起了上海市工人群众的极大不满。

1966年11月26日上午，上海市西北武宁路沪西工人俱乐部。以老工人，中共党员、共青团、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为基础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筹委会正在召开筹备会议。“赤卫队”总头头，名叫王玉玺，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侯补书记王××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公开反对张春桥签字的五条，并给陈伯达、江青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

求张春桥立即回上海检查交待。

这一主张，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于是，“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1000匹。“赤卫队”号称拥有80万之众，成为王洪文“工总司”一个强劲的对手。“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2月2日，当《解放日报》大楼被“工总司”和“红革会”围攻时，“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滩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马上作出反应，发表了它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唱起了对台戏：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两支大军，针锋相对。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赤卫队”召集群众，举行大的抗议游行。

12月7日，“赤卫队”、“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发表联合声明，不承认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签字”。

形势越来越严峻。“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弩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上海闹市区汉口路闹个不停，持续了几天几夜。这次事件是“工总司”同“赤卫队”的第一次大较量，给“造反司令”王洪文狠狠地敲了一记闷棍。

12月11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飞舞，人声鼎沸。不用问，这里准是召开什么隆重大会。

只见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原来，这是号称60万人参加的庆祝“《解放日报》事件”胜利的祝“捷”会。在这次大会上，曹获秋等人未能幸免，又被拉来批斗，又一次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从此，“造反司令”手中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

12月14日，“工总司”等18个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议：“上海市委及其各级领导必须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获秋和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

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1967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斗争纪要》宣称：“联席会议……具有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初步形式的性质。”

由于曹荻秋在12月18日“工总司”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被迫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这样使得“赤卫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赤卫队”当时被“工总司”诬为“保皇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须知，在当时，“保皇”这个“污点”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更何况是处于“两军对垒”即将白炽化之时。

“赤卫队”于12月2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并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24日，曹荻秋被迫签了字。

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由陈丕显主持，批评了曹荻秋。会议认为不该签字，要曹荻秋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但工作尚未来得及进行。25日下午，王洪文在张春桥的“指点”之下，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他当众宣布同“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是非法的，“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曹荻秋有苦难言，焦头烂额，左右为难。这样一来，就使双方的矛盾激化了。

12月27日，“赤卫队”召开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特急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解决上海问题，另一方面，派人到上海市委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从这一天起，上海滩再也不平静了。眼下，上海滩上空乌云翻滚，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在上海4000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可是，这里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柯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包围了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号称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到了28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颗颗光秃秃的梧桐树下。子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

康平路的异常变化，“造反司令”王洪文看在眼里。王洪文迅即报告远在北京的张春桥。张春桥得知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策划了一个大阴谋。

12月28日深夜，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电话，要王洪文等人向“赤卫队”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要正在北京的“上海工人北上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火速赶回上海，而王洪文和徐景贤已经开始联合行动；留在上海帮助造反的孙××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宣传车连夜被调动到康平路附近的马路上大造舆论。

29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日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山人海。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29日上午，曹荻秋来到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3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像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原来，在“赤卫队”蜂涌康平路的时候，张春桥那“热线”电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传张春桥秘书何××，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了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李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如指掌。

29日这一天，张春桥的“热线”又接到了上海的家里。于是李文静秘密派人找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传达张春桥的“紧急电话指示。”全文如下：

“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

徐景贤得到了“军师”这个“指示”之后，立刻向王洪文等传达。“工总司”马上行动起来。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 20 多个造反组织根据张“军师”的“密令”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司令”当然是王洪文。这个“联合指挥部”又在荣昌路 60 号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官”是“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自然，张春桥密令耿金章返沪，是为了对付“赤卫队”；王洪文推耿金章为“指挥官”，把“二兵团”推向“火线”，借助“二兵团”力量，去干掉“赤卫队”。此俩人各怀心计。

到了 29 日晚饭后，被调集到康平路一带的“工总司”兵马已达 10 万人。此刻，耿“司令”正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之际，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赤卫队”抄了“中央大员”张春桥的家。

这是张“军师”同他老婆一起策划的。其用意是以“赤卫队”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强加于“赤卫队”之上，以致于“师出有名”。

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身临其境，并作过调查研究的“红革会”常委马××、戴××等人曾在一份材料中作出如下描写：

1966 年 12 月 28 日，爆发了康平路事件……在 29 日夜里，突然到处谣传：“赤卫人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凌晨 4 时，劳××，戴××（均为“红革会”常委）等人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就在春桥家门口，

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可是到了五点多钟，张春桥打电话回家问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张维维在电话中回答：“‘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叫张维维让李文静听电话。一阵计议之后，李文静立即满脸杀气。天亮后，她马上改口，大叫大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这样，“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的政治谣言，就满城风雨地传开了。

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过的：“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军师”张春桥正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兴师问罪”总算有了个罪名，就等待时机了。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啃着饼干充饥。谁也料想不到“工总司”要动武了。

1966年12月30日凌晨2时，从王洪文，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发出了命令：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两颗信号弹带着刺眼惊心的嫣红划破沉沉夜空。

顿时，康平路附近各街道口、出现了带红袖章标有“造反派”的“工总司”队员，杀气腾腾地朝梧桐树方向冲过来。

“赤卫队是保皇队！”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惊天动地，震

荡着康平路，摇撼着整个上海滩。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两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血战康平路，标志着上海滩的文化大革命“文斗”暂告一段落，它将不由自主地步入流血的政治——武斗，自相残杀的内战。

制止，已来不及，已没有谁能制止这场即将发生的震动上海滩、震惊全国的悲剧，虽然有人忧心如焚，想方设法来制止，但却力不从心。

因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基本篡夺了导演权的那帮人，需要演出一幕幕悲剧，需要千百万牺牲品，需要白骨和鲜血来铺就他们通往目的地的道路——篡党夺权的道路。

遗憾甚至遗恨终生的是将成为悲剧中的人物，将成为牺牲品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头脑中只有迷信和崇拜，没了理智，然后又塞进了派仇、派恨。

还是潘××“副司令”打先锋，包括陈阿大的“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等数千入，首先出现在康平路大街上。

先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人造反队员，围住一个或几个“赤卫队”队员，舌战。

接着，有人动手撕扯，有人推拉，双方发生对骂。

乱中，陈阿大击出一拳，又有入击出一拳，接着陈“司令”就是拳脚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队！”……

流血了，鲜红的血从“赤卫队”员的鼻中和口中流了出来……

所有的路口都被封锁了，“赤卫人”孤立无援。

“赤卫队”开始了突围，在大街上手挽手，排成行，阻

挡前冲的人潮。

“赤卫队”一次又一次被冲散，一次又一次汇集，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敌意”与“敌意”随时都在碰撞，随时都会产生火星。

攒动的队伍中，忽然有人飞起一脚，一名“赤卫队”队员捂着肚子滚倒在地。

打红了眼的陈阿大他们竟指挥队员一个个踩踏着他的身体冲过去。踏得这位老工人遍体鳞伤，胃大出血，送进医院输了很多血，20多个小时才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

又一个“赤卫队”员昏倒在地，头破血流，额骨暴露，伤口长达6公分，深一公分。

此时，马路对面道口数千人朝梧桐树冲了过来，为首的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黄金海，他们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弹弓。

“赤卫队”队员见势不妙，退守市委书记处院内。

黄金海指挥众队员从院外架起大弹弓，拉开小弹弓，大小石头如雨点般射来，院内玻璃窗顿时成了碎片，那里的人们东藏西躲，仍然逃不过墙外飞来的“子弹”。有人“哎哟”一声大叫，双手紧紧捂住脸一屁股坐下地，他的指缝里渗出一线线鲜血，一线线又汇成一条条，直往下滴。

有个“赤卫队”员看见此情景，探出头，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一名“战友”到底伤势如何，“嘭”的一声，一块混凝土重重地打在他头脑稍高处，吓得他冷汗涔涔，赶紧伏下身。

虽然“赤卫队”头头们在一遍一遍地鼓动。但，情况

已是万分危急，不但寡不敌众，而且寡中还有弱。“赤卫队”中大多是老工人，老模范，年事已高，虽然他们表现得很坚强，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怎能与“阿飞司令”黄金海相匹敌呢，更何况是赤手空拳。

“阿飞司令”冲不进“赤卫队”死守的书记处大院，令部将抬来一根木头冲撞院大门。

大门被攻破。“阿飞司令”高呼着口号，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第一个冲进大院里，“工总司”造反队员大批涌入。

“赤卫队”队员手挽手组成的防守线，顷刻被“工总司”冲散。

一场木棒对空拳、石头肉体的血战开始了。“阿飞司令”边打边喊着“工总司”的“革命口号”，“赤卫队”人群中也响起了他们的“革命口号”。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打着，打得你的血流出，打得他的皮绽开……

冲杀追逐，从这一间办公室打到那一间办公室，从这个角落追到那边角落。一名“工总司”队员舞着一根外面包着一层纸的铁棍向“赤卫队”队员打去。被打的“赤卫队”队员惨叫倒地。

五个“工总司”队员把一位“赤卫队”员逼到了楼边上，三条铁棍，两把弹弓直逼“赤卫队”员的胸膛，但“工总司”队员并没打下来，只是叫，一次次叫“缴枪不杀……”

一名“赤卫队”队员试图冲出大门。无数石块朝他砸来，砸在他的头上、身上、手上，刚近门口，惨叫一声，当场休克。又一名“赤卫队”员被棍棒击中头部，双手抱头，在地上打滚。很多人流血了，血与汗混合，把衣服染得斑

斑驳驳。

混战最疯狂时，各街道被堵，救护车无法进来救护，伤员的血就这样不止的流。

继续“抵抗”已毫无意义。“赤卫队”停止了高呼口号。“阿飞司令”大叫“举手投降！”没有人举手。站在队伍前面的几名“赤卫队”队员被棍棒乱纷纷地砸下来，脸上、手上有血，滴滴落下地。

混战结束时，已是清晨6点15分。院内的“赤卫队”成了“阿飞司令”的俘虏。

此时，大街上围攻正酣。

接着，由围攻变成追打，陈阿大的兵团最卖劲。

“赤卫队”被分割成许多个小“分队”，这正中王洪文，耿金章下怀。王、耿二“司令”都是行伍出身，懂得用兵的一般道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

7点钟，除了“赤卫队”总部众头头各率少数队员“突围”外，其余都被“工总司”所“歼”灭。近2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6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工总司”头头迫使“赤卫队”队员边走边高呼：“赤卫队必败！”“赤卫队是保皇队！”……

这一天共有91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据目睹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被打得血淋淋的，有的受了重伤，倒在地上挣扎，惨不忍睹……

康平路一役，“赤卫队”主力被歼，袖章被缴下来6大堆，“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30日下午5点45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率领

“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遭王洪文，耿金章埋伏。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上午康平路“战斗”一结束，王洪文即派出手下到处寻找“赤卫队”总部众头目的去向。王洪文，耿金章很快地打听到了“赤卫队”的行动计划。于是速调兵遣将，由陈阿大率“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炮司联合兵团”等5个造反组织的队伍赶到昆山“安营扎寨”；王“司令”及耿“指挥”坐后督阵；潘“司令”坐镇大本营，负责审查清理工作。

王洪文，耿金章“用兵”的确有点“神”。“赤卫队”果真中了他们的圈套。“工总司”与“赤卫队”员在这里又展开了混战。

战至傍晚，“赤卫队”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又有近5万多人成了“工总司”的俘虏。这一天共有17个人受伤。其他的返回了上海。

“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王××是代理的铁路局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80多人中，有70多人是“赤卫队”员。这批“赤卫队”员跟他去了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运输无人指挥，上海铁路交通中断，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个小时中，停开客车26列，5万多旅客不能乘车，5万多旅客被阻于途中，停开货车38列，中途停车22列，货物积压数万吨。这样一来，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通令”，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王洪文

在整个上海滩进行大搜捕，“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20多人被捕，曾与王洪文在保卫科共过事的上海国棉17厂“赤卫队”负责人马×及其骨干24人也被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作为这次武斗的“军师”，对“胜利”是颇为得意的。1967年3月8日，他对山西省太原市在京的代表说过，“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它揭开了在全国利用武斗夺权的恶劣先例。从此之后，整个上海滩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6. 2. 扫荡“红革会”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的。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从在安亭与张春桥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上海滩，就目前的条件，摘“桃子”非要王“司令”帮忙不可。

1967年的钟声刚刚响过，广播里传来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新的一年是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这一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树欲静而风不止”。气息奄奄的上海滩面临着暴风骤雨的洗劫。

元月1日凌晨，王洪文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在，告知北京方面的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结算……

元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王洪文、陈阿大等人，说：“叫陈丕显出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陈丕显一直不出来，应该拖出来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但，上海的桃子，绝对不能让陈丕显摘去！”指出，“1967年的1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并指示王洪文，整个上海夺权首先从《文汇报》开始。

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谋，在北京在悄然酝酿着……

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读者书》中宣告：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元月5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报纸落入“革命造反

派”手中，使他们占了舆论优势。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看出“摘桃子”时节已到，双双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俩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出现在上海滩，万夫莫敌，不可一世。

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大员一到上海，就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王××，关××等“造反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当然，这次会见少不了“造反司令”王洪文、潘国平等造反头领。

这一次谈话，“两位中央大员”向众造反头头透露了毛泽东主席1月2日的指示，即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元月5日，“王总司”头头开会，讨论2日“最高指示”精神。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大厅里。张春桥哈哈笑着仰靠在椅座上，把两手分别搭在一左一右的王洪文和陈阿大肩上，亲热地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对上海目前的斗争非常关心，特意派我和文元同志来和你们一起参加战斗。”

王洪文兴奋地说：“太好了，从今天起，我们‘工总司’的一切行动坚决听您和文元同志指挥！”

陈阿大梗直脖子，粗声硬气地：“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滚地雷，我陈阿大也绝不退一步！”

张春桥赞赏地：“你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闯将，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所以，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王洪文急切地问：“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

张春桥不慌不忙地说：“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拚杀阶段，斗争的根本问题就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你们对上海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必须连根拔掉！”

王洪文愕然地：“反市委一锅端，这样干行吗？”

张春桥微微一笑，反问道：“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陈阿大理直气壮地说：“破四旧，立四新！”

王洪文想了想：“反修防修。”

张春桥摇摇头：“不对。你们说的这些只是对外宣传上的一般讲法，再多讲几条也可以。但这不是最根本的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打上海市委，这只是头一炮，是发起全面总攻的一颗信号弹。你们要把炮口瞄准中央那些老家伙，狠狠地轰！”

王洪文试探地问：“象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这些老帅们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笑眯眯地望着他：“刚才我不是讲了么，通通搞掉，一个不留。他们没一个好东西，都一贯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不能留！留下就是祸根！”

陈阿大挥拳喝道：“痛快！这才叫大革命！大造反！”

王洪文决心已定：“不破不立，我们就惊天动地干他一场！”

张春桥哈哈笑着赞叹道：“好！砸烂旧世界，开创新纪元。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气魄！”

经过一番策划，决定召开打倒旧市委大会。

1月6日，上海飘起了雪花，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了银白世界。“工总司”、“机联站”等三十二个造组织在这里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 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获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 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获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

(三) 曹获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督促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中说到：“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获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将徐景贤在会后把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月6日，姚文元写了《情况简报》，节录如下：

上海开了10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有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获秋。陈、曹、魏、韩、马（即马天水）、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获秋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

后来，张春桥公开说过：“1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权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1月6日之后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在反复争斗中，全面夺取了上海市领导权。

对上海市的全面夺权，胡月伟、杨鑫其在《疯狂的节日》里，作了生动描绘，它虽系小说，却是历史的艺术再现：

“全面夺取开始了。疯狂的人们在疯狂的旋律中跳着疯狂的舞蹈……闹市区每天都有浩浩荡荡的卡车队招摇过市……堂堂党报成了造反团体的宣传喉舌，整版整版地刊登怵目惊心的传单、号外、新闻口号……《紧急通告》糊满了上海的每一根电线杆……曾经签字支持它的当权派曹获秋则被当成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车云梯上游行示众。潮水般的人们仰着兴奋而扭曲的面孔、随着缓缓行驶的消防车奔跑，指点头上反剪双臂、颈悬木牌的旧市长。‘当权派！嗨，大官儿。打倒在地喽！’……24层的赭色的国际饭店楼顶上，天天撒下雪片似的似单……数不清

的象杂技会演的队伍在街头出现，三尺之高的纸糊帽子画满了形形色色狰狞的牛头马面。游街者被勒令表现自己的‘反动本质’——越剧演员穿上龙袍、朝靴、乌纱帽、著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电影演员涂脂抹粉，穿上了无袖旗袍，高跟皮鞋。‘哟！看名旦去，看名旦去，不要门票！’”

“各路英雄好汉们，拼命地瓜分十区十县的每一家工厂、企业、每一家商店、旅馆。他们按照各自山头的大小、实力的强弱，兴趣的差异来瓜分势力范围，瓜分动产和不动产，甚至瓜分当权派：连西宝兴路的火葬场都贴上了三个造反组织的封条。”

“郭子坤在半个月里发的洋财，就使他足以和上海屈指可数大资本家匹敌。”

“‘听说郭子坤发了一笔洋财’？是的。他派人把全上海珠宝首饰店全封了，简直比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还厉害。”

……

1月9日，“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筹划的《紧急通告》和综合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发起总攻击》在《文汇报》和《解放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全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出。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全国震动了！

1月12日，对于“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央的贺

电。“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得金光灿灿！今非昔比，已是响当当的“左派”了！

就在这一天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誓师大会”上导演“一月风暴”的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1月16日，上面批准了上海市夺权并作了“最高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夺权的步伐越来越大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越来越近。张、姚、王正在做美梦。

就在“桃子”唾手可有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斗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1月24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分别向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奔袭过来，象一阵狂风，这支奇兵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

原来这支奇兵，就是曾经冲击《解放日报》社的“红革会”红卫兵小将们。自从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这些红卫兵开始有点想不通：“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且从大街小巷里传出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他老婆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无疑，“红革会”的这一行动，是对张春桥当头敲了一棒！

接着，“红革会”在1月7日深夜出其不意地行动，把“机联站”头头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一秘密处所。

“红革会”这一棒，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张春桥十分紧张，亲自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调部队进行镇压。

28日凌晨，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像铁桶一样，将复旦大学和原市委党校团团围住，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部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领头的是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张春桥的心腹。

这种镇压行动引起“红革会”红卫兵的极大愤怒。

1月28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破例主动到会场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同张、姚面对面斗争长达六个小时。当红卫兵问张春桥：“你30年代干了什么？”“狄克是谁？”的时候，张春桥面色如灰，臭汗直流。

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红革会”联合其它8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此时，张春桥正在衡山宾馆里与“造反司令”策划着明天的行动……

1月30日凌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城市，那些已经贴好的“打倒张春桥”的大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一大早，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上街头，几万“工总司”队员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张春桥伙同陈伯达、江青炮制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所覆盖。

原定上午8时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迫于强

大的压力，取消了。“红革会”释放了徐景贤。

张春桥岂肯就此罢休，决心扫荡“红革会”。

于是，“工总司”大队人马出动了，将“红革会”实力最强的组织——复旦大学团团围住。

这里好似台风中心，忐忑不安的太阳偶尔从厚厚的铅云后面露一下脸面，窥探一下静谧的校园，然后又掩盖着脸面隐入云层之中。昔日播放着造反音乐的喇叭哑巴了；没有一处听得到歌声，没有一角看得见欢笑。坚固的大铁栅门紧紧地锁闭着，铁门顶端排列着锐利的长矛刺向苍穹，仿佛是无畏的卫士守护着门户。

此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耿金章四巨头集中在康平路大院里。这里成了镇压“红革会”的指挥中枢。除耿金章布置的一个造反纵队外，张春桥又从警备区调来一个营担任内线警卫。

2月1日凌晨1点40分，三发红色的信号弹从复旦大学的校园上空升起。校园里腾起惊天动地的吼叫。

从墙角，从树丛、从大字报栅栏后面，从教学大楼里，冲出了上千名造反队员。他们个个头戴藤盔，呐喊着将红卫兵们团团包围。一股人马袭来，又一阵黑潮涌上。

这支在“工总司”内被诮为“耿子军”的造反纵队全是由二十岁出头、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工人组成，纵队头头都是在“安亭事件”中和耿金章肩挨肩趴过列车轨道的铁哥儿们。他们几番冲击，试图将“红革会”队伍分割成好几段，分而歼之。

红卫兵们只好围成一块块。男生在外，女生在内，竭力保持队伍不被冲垮。进攻的造反队员发起一阵又一阵的

冲击，每抓住一个学生就往外拖，到处是杂沓的扭打殴斗之声。

“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们拚命喊。

“堵住嘴！”打的人红了眼。

有人举起半导体喇叭，高喊：“冲出大门！”刚刚喊罢，头上的帽子就被打飞了。他一扭身，把扑在背上的一个大“背包”摔倒地上，又一脚踹翻了迎面压过来的黑影。耳畔嗖嗖响，他忙用半导体喇叭去拦，棍棒和喇叭发出了吓人的声响。

忽然，他看见一个女同学倒在石子路上，被揪往围内拖着走，便冲上去，一肩膀把两个家伙撞出好远，救起了那女同学。这一来，他吸引了许多人。

人影一条又一条地向他扑来。他一看不妙，顺手把半导体喇叭向上一抛，砸碎了头顶上的一盏小太阳灯，顿时，周围一团漆黑，进攻者和防御者混在一块儿、无法分辨。

“揪住长头发的！”黑暗中传出一个头头的吼声。因为造反队员全是男的，而红卫兵中有一半是女的，所以造反队就可凭头发长短来区别是自己人还是“敌人”。

一霎时，造反派队员在黑暗中伸手乱摸，抱住一个往头上摸，是长头发的就抓起来，有的造反队员乘着黑暗，抱住女学生乱啃乱摸，黑暗中不时传来女声的尖叫：

“流氓！”

“下流坯！”

“救命啊！”

……

一只大手揪住了一个女学的头发。女生一扭头狠狠咬

了对方一口，乘机脱身。

突围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其它办法。“红革会”总部头头观察一下四周地形，发现大道南西有一幢四层教学楼，里面没有人，当即命令“红革会”队员往教学楼里撤！

造反队员们尾随着跟进大楼，刚想上楼，又听得楼梯上发出打雷似的轰响，一只只书桌和长椅滚下来，几百只桌椅横七竖八地将一楼楼梯口堵得密密匝匝。

这一来造反队员一时攻不上去，可“红革会”也被困在楼上了。

康平路里的耿司令气恼了，他把对讲机频道一拨，呼叫起来：“一号、一号，我是虎、虎、虎！现在我命令你们天亮前攻下大楼，给每个大学生吃顿生活再撤走……”

凌厉的攻势展开了。复旦大学的广播站被造反队征用，不断播放着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和热烈高亢的“语录歌”。

造反队员们排成三行，从楼梯口排到楼外。他们将障碍物一个一个运出来，扔到操场上。半小时后，操场上就堆起小山似的桌椅。楼梯口空了，造反队员们一声呐喊，争先恐后地往上冲。

“轰隆隆”一阵巨响，楼梯上又滚下数不胜数的桌椅，立刻，楼道又被堵死。几个冲在前头的队员躲闪不及，被砸伤。当担架抬着三个昏迷不醒的青年工人送上卡车时，一个纵队头头乘机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为死难烈士报仇！”

富有煽动性的口号使疯狂的人们更加疯狂。围楼的人们拾起石块、瓦片向楼上玻璃砸去，攻楼的人们奋不顾身，象三条飞速运转的传送带托着一只桌椅抛出来。

一楼被攻克了。一百多名红卫兵学生寡不敌众，活活被俘。二楼的学生刚想往一楼再投桌椅，吃过一次亏的造反队员也聪明了，他们推着好几个女学生往二楼上冲，向上喊道：“砸吧，先砸死你们的女同学！”

二楼的学生们手软了，怔住了，他们还没想出对策，造反队员们已乘机一拥而上，占住了楼梯口。

一场恶战开始了。

学生们用桌椅的木腿抗击着造反队员的棍棒，黑咕隆咚的楼梯口只听见木头与木头的撞击声，木头砸在肉体上的声音，人的惨叫声……

校园老门卫演出了他的拿手好戏，拉出了走廊里的两条消防水龙带，一开笼头，两股锐不可挡的水流向密密匝匝的进攻者射去。

在这二月的寒夜，这么冰冻扎骨的水龙谁吃得消、抗得住啊！进攻者一个个被浇得落汤鸡一样，狼狈地退下楼去。

二楼又被交错的桌椅封死了。

恼羞成怒的进攻者从外面切断了水源，换了一批人又发起进攻。楼上，人造传送带又飞速运转起来……

毕竟是一群学生，很难斗下这群疯狂的人们。死守不行，突围更不可能。拼死抵抗，只能招来无谓的“牺牲”。

于是“红革会”停止了攻击。楼下的造反队员猛扑了上来。人群在撕打，扭斗。学生们手挽着手围在一起。有的人被推倒在地，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被成群的造反队员淹没。受伤的女同学被往外挤，她们被后面的人用力撞，拼命挣扎……

“红革会”最坚强的堡垒被攻克了。

同一天，惨遭袭击的还有“红革会”所属的10多所高校。办公室被砸，油印机被抢，广播线被剪，负责人被抓。“红革会”设在市区的广播站、宣传点，也无一幸免地被强行接管。谁敢反抗，就被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就是载着“红革会”袖章在马路上走也是危险的，常常遭到造反队员的围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逼着摘下袖章，哈腰请罪。

一天之内，“红革会”成了非法的组织。“工总司”队员满怀着保卫中央文革的激情砸“红革会”。又冲又砸无疑是天下最快活的事；过去有仇的乘机雪恨，昔日无冤的捞点儿外快，更有不少市民双手笼在袖管里，嘻嘻哈哈看热闹。

没有人表示同情，没有人敢表示同情。各种荒诞无稽的政治谣言，经过无数条绕舌的加工，变得有鼻子有眼，在西北风的裹挟下，在上海滩上空飘来荡去……

一场暴风雨，在短短数小时内，便将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刮得七零八落，最后被扣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据初步统计，整个上海市因参加“一二八炮打”而受到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40人。审查中，严刑拷打，肆意摧残，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和造成终生疾病。

此刻，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笑声，姚文元也笑了。他们，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他们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

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梦寐以求的这一天到来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一号通令”，声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2月23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被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成了上海的主宰。

上海滩风云变幻，波浪诡谲。一切都在告诉人们：风暴并没有过去。

6. 3. 决战前夕

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中摘到“桃子”之后，实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方针，各级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被抓、被斗，甚至被打、被抄家。

被抓、被斗、被抄家的还有大批参加所谓“保皇组织”的干部和群众，还有一些原先是“工总司”盟友而后成为对立派的造反派组织，如“红革会”、“上三司”、“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炮司”等。

所谓“保皇派”、“对立派”被“造反派”严酷高压，但压而不服，两派观点不同，又积怨日深，积恨日深。

其实，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自从揭竿“造反”起，

他就面临一次又一次“考验”，先是“安亭”事件及从安亭返回上海后“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陷入危机之中；后是在“夺权”过程中，“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红革会”、“上三司”、“二兵团”等掀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滩新一代“主人”之后，他力图“保权”，深恐到手了的“桃子”被人家抢走。他要好好地品味“桃子”的滋味，毕竟垂涎已久。

但是，上海滩的局势犹如一个炸药包，一个已插上导火索和雷管的炸药包，因为上海的“桃子”，想得到的人太多了。这个时候，炸药包炸与不炸，就差一颗火星了。

这颗火星，是从上海柴油机厂里迸射出来的。

最初，冲突各派都是这家工厂的造反派，仅限于在本厂内闹矛盾，打派仗。其中的一派，以尹××，王××，邢××等为主，在1966年9月15日宣告成立“东方红红色革命指挥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另一派是以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任上柴厂技术员的杨××为首，于1966年9月22日宣告成立的“串连站”。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其为“阿串”。

1966年11月22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它的旗号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串连站”曾有加入“工总司”的要求，但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便改变了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这样一来，

“阿串”总觉得比“阿东”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是“大方向错了”。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组织，进行的是革命行动。

一场场舌战，在上柴厂常常展开。标语战也循环不已。

毕竟，“东方红”是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造反司令”王洪文手下的一支劲旅。王洪文高举“工总司”大旗到哪，“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大旗就飘到哪。在“一月风暴”中，经得住考验，因此得到“造反司令”的赞赏和支持。

而“联司”却渐渐地脱离了“工总司”，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红革会”“一二·八”炮打张春桥，“联司”成为它的支持者，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大政治扒手”，是指张春桥。在“一月风暴”中，“联司”曾干了一件震惊上海滩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挟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东方红”的状！于是，“联司”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但是“能量”却不小。它不仅能冲进“张大员”的院里，而且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向“王司令”挑战，把整个上海滩当成自己活动舞台。“联司”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1967年2月下旬，“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钩。“全向东”是交大一四〇教研室的助教，真名叫

汤××。此人能言善辩，组织能力很强。他把整个上海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统一的指挥部：“支联总站”。“支联总站”大旗刚刚树立，原来的“工总司”老对手“红革会”、“二兵团”、“三兵团”、“一兵团”、“工三司”、“炮司”等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这支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组织一开始就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在上海滩终于点燃了炸药包，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桃子”树。

新对手的出现，使王洪文大吃一惊。他意识到了这一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的权力与势力很大。于是，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1967年1月24日晚，王司令策动“工总司”、“公革会”、“文革会”等组织10000多名造反队员，去上海柴油机厂问罪（即炮打中央文革，抄张春桥家之罪），企图把“联司”砸掉。“联司”早有准备。王司令这一着并没有得逞，但他还是抓走了“联司”群众200多人，关押在公安局。“上柴联司”群众当即列队到市公安局请愿，要求全部释放无辜被抓的群众，同时向全市人民呼吁支持。王洪文砸“联司”的第一炮并没打响。

武的不行，就换文的。

1967年3月23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上柴厂。

一个月之后，上柴厂的形势陡然吃紧。

4月20日，“宣传队”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表示“支持他们一切革命行为”，而宣布“联司”的方向是错误的。

这一裁决，引起“联司”的群众极大愤慨，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王洪文命令“宣传队”逮捕了“联司”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矛盾急剧激化。

“联司”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4月26日奔赴北京。

5月20日，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联司”群众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前，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

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

人民广场，“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就连“工总司”内部都有所不满。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造反司令”王洪文进攻。

《红卫战报》发表《“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等文进行反击。

此刻的王洪文，正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

一举一动。他的手早就痒了，但张“军师”从北京来电：“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过早！”，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1967年，上海滩的夏季，是暴风雨肆虐的夏季，狂风挟着暴雨，裹着雷电，常常是突如其来，又倏然而去。来前，黑云压城，奇热奇闷，去后晴空短暂；又是黑云压城，奇热奇闷，总象在孕育着暴风雨，不知何时会来场暴风雨。

暴风雨打落了木棉花，打落了凤凰花，打落了芭蕉花，满城残红狼藉。

残红不仅仅是花，还有血，人血。

内战的升级就像这场暴风雨，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流血惨剧随时可能突发，无法预料，无法制止。

两派的过来人清醒时追忆噩梦，不寒而栗。眼前仿佛是有几只无形的大手在这座大城市上空舞来舞去，呼风唤雨。在它的的阴影笼罩下，人们着魔似的狂乱昏迷，两派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不同窝的蚂蚁，一队队，一团团身不由己，乱哄哄地冲来撞击，杀来杀去。

此时，周恩来正忙于制止动乱。

1967年6月6日，在周恩来的力主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告》，共七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然而，周恩来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全国局势继续处于内乱之中……

上海也不例外。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此时的王洪文倒是沉得住气，稳坐军中帐。他派出了一个“小兄弟”秘密打入了敢于同他

抗争的“支联总部”，不断得到“支联总站”的情报。

6月中旬起，“造反司令”特定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调查、掌握“联司”和“支联站”的活动情况。

为此，他着手制订了秘密的行动计划，以供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联司”针锋相对。6月23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将王洪文制定秘密行动计划曝光了：

“现在还隐蔽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他们要血洗上柴。”

过了3天，——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血洗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传单中很具体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于7月5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马上做出反应。

6月28日，“联司”群众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总部头头杨××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呼吁：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6月29日，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滩。

当时的派报《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虽然带有渲染夸张和极重的感情色彩，但应该说也基本上陈述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

“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挥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倍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之名，控制了电话在总机……

中午十二时左右，……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社”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激烈的、残酷的血战开始。

手持“冷兵器”，面对面血战，野蛮、残忍。

一个“联司”当场被打倒在地。

一个“东方红”队员头部被石头击中，鲜血涌出。

一个“东方红”队员舞着“警棍”打到“联司”群众的后背、被打的“联司”群众惨叫扑倒。

又一个“联司”群众昏倒在地。

……

双方损伤惨重：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暂时脱离接触。

当天深夜 12 时 30 分，“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营。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找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

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

消息传到王洪文那里，他狞笑着。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这是张“军师”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

于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6月29日发布了《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被告席。

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这样一来，“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反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造反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文章充满着恫吓语气：

“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脚跟，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定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彩叫好？》一文，声称：

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

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

很显然，“工总司”已将“联司”作为反动派敌视。

王洪文急于压跨“联司”，对“工总司”内部进行了整顿，尤其是对它的基层加强了控制，禁止各联络站和基层造反派搞“支联”组织和活动，并由各头头分别到区、县、局的联络站。防止出现更多的“支联”倾向和内部分裂。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10万人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

一时间，上海滩上乌云滚滚……

在《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中记载，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其实，“天下”早就大乱了，已经乱了好几个月了，而且乱得出乎预料之外。

7月的中国，乱了。没有一处是“世外桃源”。天底下一片昏暗，一片嘶杀声。连一个小家庭，都由于观点和思想的出入而产生各自的对立派别。有时，在饭桌上作为左派的儿女常常把作为“保皇派”的父母当作革命的靶子而发泄，这种革命的“引进”常常使得家庭——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也趋于解体。

当十年浩劫过去，人们反思当年的行为时，最为痛心的便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变更，相互的妒嫉，相

互的猜疑，以至于相互厮打，落井下石。

可以说，全国遍地都在武斗，到处都是狼烟，而且两派都把武斗的性质看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对立的一方，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全国“内战”正酣。

7月18日，一场武斗又在上海滩进行。

有关当时武斗情况，派报作的描述如下：

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是怎样策划武斗制造流血事件的？

七·一八现场目击记

故意挑衅，一手制造大规模武斗

“七月十八日，在上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这场武斗，是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

这一天，“联司”一小撮头头，一方面组织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干扰在人民广场召开的“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大会”会场，另一方面，在厂里挑起大规模的武斗，血洗革命群众组织“东方红”总部。

7月18日上午八点钟过后，柴油机厂“东方红”战士在工具车间“联司”的旧大字报上张贴“关于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反扑”的大标语。“联司”的人故意寻衅，借口时间未到，拔出拳头就打。另一批人乘机将出来进行劝阻的“东方红”战士解福喜强行拖往“联司”总部进行殴打残害。接着，“联

司”还绑架了“东方红”的工具分部车间工段长郭家泽，把郭推上吉普车驶出厂部。“东方红”闻讯后，出于自卫，便有40余名战士赶到现场抢救被“联司”殴打和绑架的战友。“联司”立即纠集了它的主力军——直属兵团，用大铁棍把“东方红”战士逐出车间，追到人民武装部大楼附近进行殴打。在混战中，“联司”抓了“东方红”六人，“东方红”抓了“联司”三人，经市革命委员会上柴调查组和解放军同志劝解，九时半左右双方退出了现场。

随后，市革委会上柴调查组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找双方负责人谈话，要求双方同时放出被抓人员。但“联司”头头坚持要“东方红”先放人。十一时半，“联司”头头打电话给市革委会调查组，以威胁口气，限令“东方红”放人，否则便要采取“革命行动”。这时，“联司”一小撮头头早已作好阴谋挑起武斗的计划，并作了人力、物力的准备，他们准备好大批铁块、石块、铁棍等，以便进行大规模武斗。当市革委会上柴调查组的同志正与“东方红”商谈时，“联司”一小撮头头就调动部分兵力佯攻“东方红”总部右侧宿舍，吸引了“东方红”的兵力，随后，便以铁块、石块等猛攻“东方红”总部大楼。“东方红”战士因准备不足，只得爬上层顶，以瓦片自卫反击。十二时以后，武斗越来越剧烈。“联司”以他的主力直属兵团强占了冷锻车间和大食堂的制高点，迫使“东方红”阵地越来越小，人员密集，受伤越来越多。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就这样被“联司”挑起来了。

“东方红”战士二百多名被打伤。

下午，上海警备区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六·六通令》。“联司”却开来了广播车，使用了高音喇叭，在解放军同志的周围开来开去，进行扰乱。同时，“联司”头头在督战，他们还叫嚣：“打！打！冲啊！”强占了冷锻车间的屋顶，又得寸进尺，紧接着厨房、大饭厅屋顶也被占领，把“东方红”总部的人逼在一起。

这时，在武斗的前沿，“联司”的人在头头的指挥下，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向“东方红”总部的战士狠命地掷瓦片、石子、用弹弓射铁球和螺丝帽。靠楼架梯子，不少人轮番爬上房顶作战，在楼下的，就用木板遮挡，一阵雨落似的石子扔过去，然后再向前逼近。在这场武斗中，充分暴露了“联司”一小撮头头是经过阴谋策划的。武斗进行中，一批石子打完后，有人用平板车不断运来，送上房顶，打弹弓用的铁球和螺丝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顶；渴了，有人就用车子运来盐开水和汽水。

在“东方红”总部这边，在暴力面前采取了自卫抵抗，但没有什么反击措施，由于缺少准备，负伤的极多、血流满面的“东方红”总部战士一个一个被拉下“火线”，送往医院，不少人被“联司”射来的铁弹弓打伤了眼睛，有的被打成残废。据当天下午六点钟的统计，“东方红”总部负伤的达二百四十多名，其中重伤的十六名，另外还有一些人被“联司”抓走，下落不明，有一人（注，即解福喜。）已遭毒打致死，甚

至连一个十六岁的工人子弟中学学生沈××也被无故毒打……

……

解福喜的死，终于给王洪文抓住了一个“活口”，他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7月21日发出了《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解福喜，以致惨死”；并且特令“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待打人致死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

当晚，在人民广场上召开了有几十万群众参加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会上，王洪文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了舆论动员。

更为惨烈的武斗即将在上海爆发。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了“工总司”头头会，作出了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

(一) 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 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张××、王××等人。

(四) 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工。

(五) 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有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由王秀珍、陈阿大，叶××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等负责。关于攻击时间，定在8月5日以前。

王洪文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包括埋伏、袭击和围攻捉人。

这次“888”秘密会议，“最后确定了”先打“支联站”，后取“联司”的进攻步骤。

7月31日夜间，王洪文用突然袭击方式，出动100多人，以左臂扎白布条为号，包围和砸掉了“支联总站”，正在开会的核心人员三十多人，关进了杨浦公安分局。这是围攻“上柴联司”的一场预演。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王洪文、徐景贤开始实施“先礼后兵”计划了。

8月3日下午5时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和驻沪三军代表等分乘三辆宣传车，开进上海柴油机厂，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8月2日给“上柴联司”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三辆宣传车，将高音喇叭砸坏，烧毁《公开信》，夺走了摄影人员的摄影工具，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8月4日凌晨，王洪文下了进攻命令。

6. 4. 血洗“上柴联司”

1967年8月4日凌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还在沉睡之中。尽管几天来有各种传闻，要求人们提高警

惕，但上海的市民们总是不大相信会有厄运降临。

突然，沪东市郊的旷野上传来马达声、喇叭声和嘈杂的人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出现一支打着“工总司”的旗号的队伍，从水路陆上由远而近，把上海柴油机厂包围得严严实实。顷刻，通往上海柴油机厂的军工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和队伍，据说有近千部车辆和十几万人马，形成了一条长达四、五公里的人流。这一带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宁静和安谧。人们都清楚：“工总司”发动突然袭击了。

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此人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四人帮”——王、张、江、姚中的那个“王”，即中国“文革”中的“火箭式干部”，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小小的保卫科干事坐上“火箭”跃入中国政界最高层，先是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文革”中号称“造反司令”的王洪文。

王洪文指挥下的“工总司”整整折腾了一夜，将上海柴油机厂围得铁桶似的。

这天清早，上海柴油机厂大门口是一片特别显眼的无人地带。包围者和被包围者遥遥地对垒着。

没有枪声，但狂热仍笼罩着整个“上柴”。“上柴”四周，火药味浓烈。

武斗这只怪胎已经在上海柴油机厂的怀抱里骚动。一场血战就要在这里爆发！

“工总司”的火线指挥部就紧挨着上海柴油机厂。“总指挥”王洪文坐镇这里。

上海柴油机厂的平面图被摊开在地面上，王洪文用标有“HB”的铅笔在上面比划着，约摸10分钟，王洪文及众头目出现在上海柴油机厂门口前面，察看地形，商量进攻方法。

此时，上海柴油机厂上空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正在把镜头对准“王司令”，他们记录着“王司令”的“丰功”。

接着，“火线指挥部”命令“部队”到前沿集结待命。

一队队戴安全帽或草绿色解放帽、手持木棒、叉、弹弓的“工总司”造反队员齐刷刷急步跑向指定地点。

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造反队员的卡车疾驶向预定地点。几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

上海柴油机厂钢铁大门后面，堆放着无数乱石、铁板、垒成障碍物。

“大敌”当前，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进行了“战前动员”：立即武装起来，挥舞手中的武器，向着举起血淋淋屠刀杀将上来的老贼及其狗党，坚决反击！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联司”群众重点防守在厂内，准备以皮弹弓等“冷武器”迎击。

同时，通过高者喇叭喊话，呼吁：“厂外工人和群众停止武斗”。提出：“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8点正。

一颗红色信号弹冲着那轮如血如火的太阳腾起。

顿时，从“工总司”各个集结据点开出了一队队人流，佩戴红袖章，高举“良工革命造反兵团”、“公革会”、“上体司”等旗号，朝上柴大门冲杀过来。

8月的上海，气温高达39摄氏度。此时此刻，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到了一场风狂的肉搏中去……

“工总司”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揭开了血洗“上柴联司”的序幕。担任进攻主门任务。

战斗一开始，“上柴联司”加大了高音喇叭音量，高呼自己的革命口号，声音回荡在上柴四方。

王洪文坐不住了，高叫：“他妈的，先把联司门口造谣的喇叭拆下来！”

话音未落，黄金海等人便向上柴厂门冲出，都被“联司”群众的弹弓打退。

喇叭继续在广播。“敢死队员”眼睁睁看着。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吼道：“把上柴厂的总电源给我切断！”

10点以后，上柴厂的广播站便成了哑巴。

“工总司”先头部队冲不进重兵把守的厂大门。造反队员灵机一动，调来吊车，铲开了大门。

“打啊！”“冲啊！”……

“工总司”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

这是一场石头对石头，木棒对木棒、铁棍对铁棍、面对面短兵相接的血战。

双方边打边喊着他们各自的革命口号，冲杀追逐。“联司”群众退守铸工车间，从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狠狠地抛

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了“工总司”向前推进。

“工总司”各路人员在王洪文指挥下，立即兵分四路，把铸工车间围得水泄不通。

对峙的双方对视着，眼里喷出一团团“仇火”。“工总司”队员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群众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工总司”队员刺了过来。

就在这时，“工总司”队员立即抓来灭火器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联司”群众惊慌失措，被迫往后撤。

“工总司”立即进行反扑，吼声震天。一名“联司”群众当场被打昏在地，另一名“联司”群众被从窗口推下楼，头被摔破，鲜血涌出，染红好大一块地。

一名“工总司”造反队员舞着一根铁棍正向一名联司群众头顶砸下时，被“联司”群众一记弹弓射中手背，哎哟一声，血渗了出来，直往下滴。

一小时的血战，铸工车间终被“工总司”攻克。

王洪文指挥着各路大军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造反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了一堵围墙，攻入了厂区。这样，形成了两面包抄。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

“联司”群众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被分割据守在几座房顶进行抵抗。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相继被占领。

“联司”群众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

四号楼是“联司”总部，这里部署有“联司主力兵团”——“敢死队”。

王洪文集中兵力攻打四号楼。当他看到楼顶上猎猎飘飞的“联司”大旗时，他的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他将以鲜血甚至生命作代价，去占领大楼，拔下对方的派旗，换上自己的派旗。

“工总司”曾经冲击了几次，都被“敢死队”以密集的“火力”顶住。砖头、石块、石灰、铁器等象冰雹一样从天而降。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从楼上扔下的还有硝酸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及弹弓射下的螺丝帽。

屋顶下，很多“工总司”队员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在“火线指挥部”里，王洪文只穿一条裤头，仰着脸躺在办公桌上。正当他翻一个身的时候，“轰”的一声，王洪文几乎从桌面上弹起来。他说：“炮弹，怎么这样近？”立即看到掉下的东西是从左前方大楼扔过来的，随即命令黄金海：“天黑之前给我拿下四号楼！”

“司令”严令一下，造反队员们满怀豪情地攻打。

砖块和石头作为主要武器，砸在楼墙上，砸在早已破碎的玻璃窗内，腾起烟尘，发出沉闷的震响。

楼上飞出的石头、砖块、铁块仍很密集。砸在树上打得枝断叶落，砸在总部大字报棚上使得纸片来回飞，还砸在冲击者的身上，一个倒下，又一个倒下，惨叫声响起，便有人流血。

王洪文本来就红得见血了的眼睛更像是要喷火！

于是王洪文也运来了燃烧瓶和硫酸瓶。

浓烈的硫酸味随着四起的火舌在大楼内弥漫，令人窒息，更可怜的是被硫酸液溅上的人皮焦肉烂。

然而，“联司”一方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怯阵。有的是奋不顾身地冲过火焰，冲过硫酸浓雾，冲到阳台前，更加凶狠地把只要能杀伤人的东西掷向进攻者。

新一轮进攻被打退了。满地狼藉的大楼里积着滩滩血浆。

眼看“联司”拼死抵抗，“工总司”队员倒在血泊中，“消革会”（即上海市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义革会（即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负责人急了，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

王洪文仔细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总部，减少伤亡，决定由“消革会”、“义革会”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酸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十七辆消防车被调到了战地前沿。采用4辆车“打接力”的办法，从一公里以外的河滨打水，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撑着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的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号楼。

下午3时，“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队员乘车到达上柴战地增援。

“给我拿下制高点！”王洪文吼道。

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开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人员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顿时火光冲天。

“消革会”队员徐××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二楼楼顶时，被“联司”“敢死队员”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

来。第二个，第三个造反队员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在大炮水枪的支援下，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
“王司令”又下命令。

刹那间，一批“消革会”、“义革会”队员从云梯冲上去，“工总司”“敢死队员”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层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联司”敢死队被迫退守二楼。

“工总司”造反队员向二楼投来无数的燃烧瓶。石头、砖块、燃烧瓶象雨点般地飞进四号楼，浓烟滚滚。

登上平台的“造反队员”往下打，下面的队员往上攻。“联司”群众被重重包围，上下夹攻。“工总司”造反队员的棍、矛、弹弓在步步逼近。“联司”人员，有的冲向楼边，稍稍停顿，一纵身就跳了下去。

混战的二楼响起了一片短促的惊呼“啊……”

又有一批造反队员涌上楼来了。楼里的“联司”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

一个又一个的“联司”群众被打倒在地，有的在挣扎。继续抵抗已没法挽救既成的败局。“联司”群众都不约而同地把“武器丢下地，靠拢在一起”。

“工总司”造反队员挺着叉、棍将“联司”群众围住。

“举手投降！”王洪文指挥造反派一遍遍地叫。

没有人举手。皮带、棍棒乱纷纷地落在队伍前面的几个人身上、手上、血迹斑斑。

接下来就是，男俘一律剥去上衣，女的撕破上衣。黄

金海上前拉过一女俘，手往上衣里面一伸，竟然当着众人耍起了流氓！女俘不服，两个造反队员冲了上去，揪住“联司”女俘的头发，两手乱摸起来，猛地将白的确良衬衣撕破了。脸上、身上满是利爪抓过的伤痕，鲜红的血渗红了白衬衣。

“联司”俘虏被押了下来，被迫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送出厂门之前，还要被痛打一遍。后来的那些托儿所、幼儿园的保育员和医务人员也无一幸免。

此刻的五号楼和水塔，仍在“联司”手里。

王洪文立即指挥“敢死队员”兵分二路，分别冲向五号楼和刚扯着“联司”旗号的水塔。

兵临城下，喊话四起：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

“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

“工总司”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此时，“联司”水上退路已被王洪文得力助手、上海滩有名的“战斗英雄”、“造反大将”陈阿大切断。陈阿大率领的“良工革命造反兵团”从中华造船厂调来了三艘登陆艇、巡逻舰。将黄浦江封锁住了。

“前无退路，后有追兵。”“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联司司令”未能幸免，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治指挥部”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令”，“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7月29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8月2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人王洪文的网里。“全向东”得知“联司”

被砸，逃往武汉，于8月1日被捕，18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劫后的上柴厂，惨不忍睹，许多“联司”人员，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横七竖八地昏死在路旁，象货物一样，一个个地被扔上了卡车……

一座美丽整洁的工厂，刹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聚集在上柴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们，目睹自己的亲人遭受血腥镇压，泣不成声。有的家属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甚至向那些在现场指挥武斗的大小头头们下跪求情。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拳打脚踢和谩骂！有的武斗人员还冲入工房去搜捕“联司”人员。

王洪文一伙带着狞笑离开了武斗现场。此刻，他确实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自己多少天来梦寐以求的一大心愿全部实现了。

“上柴联司”终于被王洪文踏平了。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强有力”的歌声，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

臭“联司”，
“支联站”，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残杀革命派，
殴打解放军，
配合刘少奇，
紧跟陈丕显，

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进一步控制上柴厂，王洪文又在上海“补课”。所谓“补课”就是“补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进厂的“联司”人员，无论头头还是群众，都要受到非法审讯和毒打。在上海柴油机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五十多处；各种摧残肉体的刑具不下几十种之多！大批的无辜群众，肉体遭到了残酷的折磨，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滩。

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人没有做人的权利，生命没有保障。很多“联司”群众，一踏进厂门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也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在厂里，“联司”群众只许干活，不许讲话，否则随时都有重新遭到批斗的危险。

就在这一年的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第七章 青海危机

1967年，初春。

一股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流在青藏高原的上空盘旋、翻滚，象一只凶残的猛兽，恣意敲打、撕扯着善良的人们。一时间，乌云滚滚，阴霾蔽日，漫天的黄沙刮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这一年的元旦，全然没有了以往的欢乐、喜庆气氛。西宁的大街小巷里，没有欢声，没有笑语，连鞭炮也听不到，整个城市仿佛都笼罩在一片惊慌不定、惴惴不安的气氛中。

清晨，伴随着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广播里传来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听了这篇充满火药味甚至带有一般杀气的社论，大多数人都疑惑不解，不知道苍天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命运。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琢磨着社论的确切含义。同时，不断有从北京和其它省市传来的消息，什么“今年将有大动

作”啦“××省的×××是走资派”啦等小道消息，在城里不径而走，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也有一部分人喜形于色，认为时机来到，准备大干一场。

说实在的，西宁人对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感觉并不那么好。人们看到的是满街的大字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批斗那个，弄得人人自危，谁也无心去搞生产，生活水平不但不见提高，反而不如从前了。还有各地来搞串连的红卫兵，个个头戴绿羊帽，身穿绿军装，腰扎牛皮带，臂佩红袖章，口口声声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要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在青海的“文革”运动中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把原来还算安宁的西宁市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和全国各地的平民百姓一样，青海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将如何进行，也不希望再进行下去。

北京，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在各种政治风浪中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一打喷嚏，全国都得感冒。就在北京弥漫着“打倒一切”的混浊空气的同时，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

元旦社论和上海的“一月风暴”无疑给全国的夺权运动规定了方向。此后，各地的夺权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山西省率先仿效，1月14日宣布“旧政权”被夺；1月24日青岛造反派紧随其后；25日贵州响起“西南春雷”；31日黑龙江出现“东北新曙光”。一时间从南到北，由东向西，夺权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到处乌云滚滚，浊浪滔天。

消息传到西宁，仿佛平地里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其影

响和破坏力是谁也始料不及的，整个城市一下子骚动起来了。有人迷惑不解，有人心事重重，有人喜形于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毫无疑问，这场风暴已经确确实实刮到了青海。不管人们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要想躲过这场风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西宁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年的2月底会发生一件不但震惊全市、全省，而且震惊了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从此，成千上万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7. 1. 青海派别林立

1967年的“一月风暴”刮起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民、学，各部门各单位及工厂、农村社队的各个群众组织，纷纷起来仿效，参加夺权和批斗的大混战。在夺权过程中，各路诸侯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认为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想夺取所在单位的领导权。由于各自观点不同，尤其对原党政主要负责人，有的要“革”，有的要“保”，从而发生严重对立，互相责难。最初还停留在“口诛笔伐”，后来逐步发展到真刀真枪，兵刃相见。为抢一枚印章，为占一间办公室，为夺一把钥匙，由唇枪舌剑到大打出手。人多势众、敢打敢拼的造反派战而胜之。“胜者为王败者寇”，胜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败者压而不服，不服则反，闹得派仗无休无止，社会秩序、人民生命财产根本没有保障。民间当时正流传一句口头禅“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两个革委会”，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

青海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在夺权过程中，各单位纷纷成立造反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青海省八

·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这是一支人数众多、敢打敢冲的队伍，当时在青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它造反派组织也多如牛毛，什么都有。仅在《青海日报》上公开的就近百个：

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
青海省一〇·二七战斗兵团，
红宣兵青海战斗团，
红教兵青海战斗团，
青海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小学司令部，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
青海新闻、广播界革命造反联络站，
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
青海省学校教职工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
青海八·八红卫兵司令部，
青海八·八红卫战斗团，
八·一八东方红战斗团，
青海七·一红卫兵司令部，
七·一红卫战斗团，
青海西宁八·八红卫造反司令部，
青海省医药卫生界红色造反司令部，
贫下中农红卫兵总部，
全国公安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青海省革命造反司令部，
青海鲁迅硬骨头革命造反司令部，
青海省雷锋战斗兵团司令部。

.....

从以上开列的二十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

一是以日期命名的（如八·一八、七·一一、八·八、一〇·二七等）组织相当多，并且有不少名称是对应的，如“八·一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和“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这大概是沿用了北京的某些造反组织的命名法，八·一一八缘于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检阅首都百万文革大军，并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代表。

二是牵涉面广。青海的工、农、医、学，甚至公安、宣传系统都成立了造反派队伍，名目繁多。他们所取的名字也五花八门，“毛泽东主义……”、“鲁迅……”、“雷锋……”等不一而足。

另外，除青海当地的造反组织外，还有从北京和其它省市赶赴青海的红卫兵组织。这中间，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西宁人叫“首都三司”或“红三司”、“三司”）、“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等最引人注目。外省市来串联的有“西北地区驻西安赴西宁联络分站”、“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驻西宁联络站”，甚至还有一个干脆就叫“外地赴青红卫造反团”。

北京的、外省的、本地的各造反派、红卫兵都积极响应号召，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发动进攻，要夺青海省委、省人委的权。他们你革我保、你争我夺，把这个原来宁静、祥和的西宁市搅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

7. 2. 强占报社

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为骨干的造反派，经过数次冲击，始终没有夺到什么大权，这令他们坐立不安。1月12日，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西宁联络站”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等外地红卫兵的支持下，“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联合“一〇·二七战斗兵团”等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向青海省党报发起了攻势猛烈的夺权行动。

这天，他们组织起队伍，强行冲进报社。在报社内他们大搞打、砸、抢、抄、抓，实行白色恐怖。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报社的总编室、资料室、制版间、印刷厂，到处乌烟瘴气，一片狼籍。谁要稍有不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人就群起攻之，大打出手，当场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个别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由于他们还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因此有恃无恐，竟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气焰极为嚣张。

本来，就在前一天，即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按理不应对报社进行冲击，但他们抓住《通知》没有提报纸这一点，将目标首先指向了《青海日报》。由于《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

神”“展开总攻击”，而中央又没有任何关于制止冲击、接管报纸的规定，因此解放军没有冒然行事。除了加以劝阻外，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就这样，《青海日报》被宣布接管。

第二天，“新生”的《青海日报》出了第一期“特刊”。但这张“特刊”却是半黑半白的——有整整一个版而是空白。“特刊”将一些重要消息做了封锁。如《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12日发出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革命群众热烈响应中央贺电的报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以及《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全世界》的专页，等等。这些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1月15日至25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每天都大量播发或整版刊出《世界革命人民热烈欢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毛主席语录〉光芒普照全世界》、《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全世界》、《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专版。但“新生”的《青海日报》却没有刊登，更没有专版，这在当时的省报中之极为少见的。

相反，他们几乎每天都不惜篇幅刊登祝贺《青海日报》“新生”的来信来稿，有时甚至使用整版的篇幅，十天合计用了近五个整版！

1月25日，《青海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少年英雄王利庆的母亲周作英《忠于毛主席退出捍卫队》的信。这篇文章是不真实的。周作英在1966年12月份就退出了捍卫队，但不是象报上所登的那样，而“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她是

“文革成员”。所登内容与周作英的意愿不符。后来，《人民日报》对此做了转载。

1月27日，《青海日报》在一版登出一则消息，题为《电业局捍卫队土崩瓦解》。消息刊出后，立即遭到电业局的抗议。事实上电业局捍卫队依然存在，报社完全是在造谣。后来《青海日报》不得不作出更正。

1月29日凌晨，“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青海省一〇·二七战斗兵团”等四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夺了青海省委、省人委的权。30日，他们在《青海日报》上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布“把省委、省人委这座‘阎王殿’摧毁了，把一小撮混蛋手里的权夺了；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是全省革命造反派革命同志的大喜事”。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一切御用组织里的受蒙蔽的革命同志，赶快觉醒过来，向真理投降，彻底造他们‘领导人’的反，造你们的组织及其幕后人的反，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在这篇《告全省人民书》中，《青海日报》盗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文中说“我们革命造反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正式夺了原省委、省人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一切其它权力！”“……发扬彻底革命造反精神，学习上海和山西革命造反的经验，继续艰苦奋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援助下，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后来刊发的一篇通告中又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时，所

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支持）下”是凭空捏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于2月10日发出正式声明，提出抗议。

在此期间，各造反组织继续夺权，相继又有一些单位的权被夺。2月1日，“青海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青海人民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委员会”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布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新生了”。

现在看来，当时“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一些做法对激化矛盾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到处宣传青海的革命左派只有“八·一八”，甚至狂妄地喊出“‘八·一八’万岁”、“永远跟着‘八·一八’闹革命”，“对‘八·一八’红卫兵的态度是检验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等口号，更把《青海日报》办成了他们自己的战报。他们不服从中央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决定，大搞山头主义、杂派评论，不惜采取造谣、诬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手段和方式，打击和瓦解其它组织，使局势更为混乱。各造反派的对立使西宁的社会秩序大乱，大批车辆和不明真相的工人离厂，农牧民离乡，严重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使西宁的生活供应一度相当紧张。在“文攻武卫”的大旗下，造反派中的极端分子们的“斗争手段”不断升级，他们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采用围斗、殴打、绑架、抄家、抢劫、捣毁等野蛮行径和跟踪、盯梢等手段，身带石灰、硫酸、棍棒、匕首等凶器，打击、残害了不少无辜群众。他们诱骗和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围攻其它左派，对抗解放军，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制造民族分裂。大规模的战斗已一触即发。

尤为恶劣的是：1月19日，造反派不顾解放军的一再警告和劝阻，竟组织大批人员冲击青海省军区司令部。他们冲散警卫，占领军区大楼，甚至抢夺武器弹药库，开枪打死打伤多人。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见此怒不可遏，带领警卫营将其包围，命令他们立即撤出大楼，缴出武器，如继续行凶闹事，就强行缴械。同时，赵永夫急电中央军委，请求下令处置。

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果断命令：“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对围攻的群众尽量做说服工作，要防止事态扩大；但对那些开枪杀人的歹徒，可以给予严厉惩处。一定要保护好机要文件和电台，武器库，绝不容许任何枪支弹药流散到社会上去；一定要找到失踪的干部战士；对被打死的同志一律按烈士安葬；照顾好家属。”

赵永夫接到回电后立即采取行动，调动部队全副武装，向占领军区大楼的造反派展开反击，经过几次较量，终于夺回大楼，但他们并未开枪。

7. 3. 武装游行：解放军的介入

在强占《青海日报》社的第二天，即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第三条为“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面对各地造反派“乱冲乱揪乱斗的混乱局势，解放军大多对“文革”“很不理解”，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根据军委、总政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军

队和军队院校不干涉、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军队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多少都与地方有些纠纷，1966年9月以后，军队便经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进入1967年后，这种冲击愈演愈烈。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4日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这时军队仍然恪守规定，不介入地方的派性争斗。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一声令下，军令如山，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支左运动。

虽然中央发出了支左决定，但各地的局势依然很乱，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也时有发生，眼看国家的柱石都要撼动了。

面对这种局面，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忧心忡忡，激愤不已。然而，由于当时的实权都掌握在中央文革和“林副统帅”手里，因此只有经过他们才能公开对全国的混乱局势进行制止。

当时，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抓走，有

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当时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全国到处都在冲击军队，到处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抓各军区、各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不管错误是什么性质，只要是司令员、是最高领导人，就是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就要统统打倒。中央军委1月份的统计材料表明：八大军区全部遭到造反派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有80%遭冲击，70%的主要领导被揪斗；全军有14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伤，258人被打死。有些地方的造反派竟抢夺武器库，冲击机要室，占领司令部，砸毁电台，剪断战备电话线，迫使军事联络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个总部和军、兵种也遭到冲击。总政瘫痪，总后瘫痪，总参也部分瘫痪。凡是瘫痪了的单位，所有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也全部瘫痪。连吴法宪都说空军的造反派用大喇叭喊着要夺权，他们把大字报糊到飞机上，弄得训练无法进行，飞机上不了天。总后部长邱会作被红卫兵关在小黑屋里7天7夜，打得昏死过去。

1月初，在叶剑英主持下召开了军委常委会，中央军委另三位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他们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担心，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军队绝不能乱。会后，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去找林彪。

毛家湾，一座阴森森的大院被高高的围墙圈了起来。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除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外，屋

里空空如也。由于挂着厚厚的窗帘，屋里一点阳光也射不进来。墙上的温度计指针死死钉在了21℃的位置上。这个当年被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从此落下怕风、怕光毛病的“副统帅”，就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背着手，低着头，来回踱着步。

“我们军队不能再乱下去了！”聂荣臻说：“军队要有限制。”

“不能把军队搞乱了！”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发布命令，定个规矩。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准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

林彪一边听着两位元帅的话，一边低头不语，后来，他点头表示同意。但没过两天，他又变卦了。

聂荣臻回忆说：“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没过两天，他听了老婆叶群的煽动，看了东北寄来的一个什么材料，马上又改变主意了。”

1月10日，关锋、王力与江青合谋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林彪竟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他又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不顾军委几位副主席的一致反对，提出要在军队内全面搞大民主。

几位元帅坚决反对：

“党政机关乱了，军队不能再乱！”

“军队一乱，你国防部长还怎么当？”

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联。

1月24日，徐向前吃完晚饭，立即趋车直奔毛家湾。他

一见林彪就开门见山地讲了当时的混乱情况，要求立即定出几条规定，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林彪一想：要是再乱下去，局势肯定难以控制，也无法向毛泽东交待。于是他表示同意，说军队不能乱，同意以军委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当场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叶剑英、聂荣臻都表示赞成。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后又复加了一条关于严格管教高干子女的规定。1月28日下午5点，林彪、徐向前一同前往中南海；将“八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完全同意，当即批示：“确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规定：“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子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发布后，几位老帅的心才放了下来。日后，凡遇各地再有军用电话请示如何对待冲击军事单位，叶剑英都斩钉截铁地说：按八条办，绝不手软！

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的命令后，青海省驻军为执行这一指示，协调西宁地区的支左工作，成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赵永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兼联合办公室副组长。他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对冲击军事机关的人可以反击的命令发布后，赵永夫觉得确实有必要对一些无法无天之徒采取强硬措施，不能任他们为所欲为。

2月3日，为响应中央军委八条的发布，同时也为严正

警告强占《青海日报》、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不法之徒，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一队一队士兵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街头，展示武装力量的强大气势。他们一面呼喊口号，一面向群众宣传中央的决定。市民们纷纷出来观看，一时街头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解放军的这种行动，惹火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头目们。他们一面动员人力上街阻拦游行，一面亲自出马，进行围攻。他们甚至还喊出“打倒解放军”、“撼解放军易，撼八·一八难”等极端口号，公然与解放军进行对抗，对立情绪到了极点。

对西宁驻军的武装大游行，《青海日报》不但没有给予报道，在全省封锁消息，反而在2月8日刊登题为《春风更使梅花红——慰问革命左派》的一首短诗。作者署名为“解放军一战士”，写作时间是2月3日夜，这是有所指的。诗中把西宁驻军的武装游行说成是“平地忽起三尺冰”，把解放军欲对其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为“人妖颠倒是唐僧”，把解放军支持其它群众组织的举动讽刺成“倒骑毛驴去取经”，并宣称“敢向枪林夺真道”，公开声明要与解放军决一高下。

2月11日，《青海日报》又针对解放军发表题为《坚决打垮新反扑》的社论。把人民解放军支持其它群众组织的各种行动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指责当他驻军成为“一小撮混蛋”的“新靠山”，称解放军的武装游行为“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是“狼子野心”，是“小丑跳梁”等等，对武装力量表示了蔑视。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部队的一贯作风。针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决定，自1967年2月14日起，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解放军发布公告，宣布“取消‘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对《青海日报》的一切权力。在军事管制期间，报社的全部工作，均受军事管制小组监督。”“如果有人胆敢抗拒军事管制，破坏机器设备，冲击《青海日报》社和《青海日报》印刷厂，均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随即，部队派兵前往报社执行军事管制任务。但当解放军到达《青海日报》社门口时，却遭到占领者的阻拦，不许解放军进驻报社。解放军耐心劝说，并晓以利害，欲以和平手段解决，但无效，报社占领者拒不让步，以至出现推搡、打骂解放军现象。解放军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想强行进入，造反派亦以武力相对，用暴力把军管人员驱逐。为避免事态扩大，解放军撤了回去。

7. 4. 血洒大院

赵永夫等人得到指战员受辱挨打和“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以武力相威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他没想到造反派竟有如此胆量，敢向武装力量挑衅。当时虽然《军委八条》发布了，但全国还没有解放军真的向违反八条的造反派开枪的先例。所以他也迫于无奈，只好再作打算。

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一再克制、忍让，“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造反派误认为是军队的软弱，料定他们不敢向群

众开枪，于是肆无忌惮，气焰更盛，“造反”手段亦迅速升级。

他们由以前围攻、殴打一般群众和其它造反派，发展到冲击、围攻专政机关，殴打、绑架和迫害公安人员，甚至抢劫刑车，放走囚犯。不仅如此，他们还围斗、殴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直至抢走武器弹药，绑架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抢劫军车，公开向专政机关挑战。

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味地向造反派忍让、克制只能招来更加疯狂的破坏。对造反派的仁慈就是对群众的残忍。种种迹象表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已经公开藐视国家机器，如不迅速制止，后果更不堪设想。对他们的行动再也不能坐视了。

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和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造反派的办法。决定立即将西宁的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同时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一俟令下，便立即出击。

对于《军委八条》，毛泽东当时为什么同意呢？虽然他对那时全国存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不满意”，但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危害国家战备安全的做法也是反感的。制定《军委八条》既为保证军队“支左”的贯彻执行所必需，也为稳定军队从而最终稳定全国的大局所必需。

中央军委接到青海驻军的来电后，认为情况危急，如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叶剑英指示他们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对胆敢无视《军委八条》者绝不手软，严加惩处。他告诉赵永夫不要怕，有毛泽东给的尚方宝剑在此，要

大胆行动。林彪办公室也指示可以反击。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青海省军区立即决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通令》，坚决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及其所属组织，并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青海日报》。在列数了“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等组织的种种罪状后，通令指出：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思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庄严宣告：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骗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它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袖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

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要求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及公安部门，坚决镇压反革命，团结教育受蒙骗的一般群众。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警惕，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等于宣判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及其所属组织的死刑。在当时，只要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条，便足可宣判其为反革命，自然可以加以消灭。这份通令不但从组织形式上而且从财产、档案以及派往外地的人员等所有方面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进行了全面取缔，等于是连锅端。

除发布通令以外，赵永夫还研究制定了一套夺取报社的详细作战方案。决定凡遇武装抵抗者，坚决开枪还击。

由于当时《青海日报》还掌握在“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手里，这份通令只能以布告的形式在大街上张贴。对

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则通过广播喊话加以通知。只有到了2月25日，即夺回报社的第3天，才得以在《青海日报》上全文刊登，这当然是后话了。

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立即展开了兵力布置，将《青海日报》社团团围住，同时也做好了接管的准备工作。指战员用广播喊话，要造反派立即退出报社大楼，交出武器，电台和其它凶器，揪出“坏头目”，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警告声，整个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要想抗拒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指挥部下令，给“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一段时间考虑，暂不强攻。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广播再次喊话，得到的却是“绝不投降”、“八·一八万岁”等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声。

限定的时间到了。指挥部下令强攻，战士们立即像当年攻打碉堡一样往里冲击。

然而，就在解放军快要冲进大门的刹那间，从里面射出了一阵密集的子弹，构成了一道火网，骇人的枪声在大街上显得那样的清脆、恐怖，顿时好几个战士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中弹倒地，指战员们眼都红了。“他妈的，他们竟敢向我的战士开枪！”赵永夫肺都要气炸了，“给我打！”

话音刚落，早就放在扳机上的食指立即勾了下去，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战发生了！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野战军，指战员们充分施展

他们的战术动作，一步一步地往里插了进去。凡遇到武力抵抗者，一律开枪还击。一时间，弹雨如梭，血肉横飞，这个建省不到40年，建国后还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枪战的城市枪声大作，报社顿时成了一个大战场。

经过一阵激战，枪声渐渐平息了下来。这个被“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占据近一个半月的报纸终于被夺回来，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这次冲突共伤亡377人，其中解放军亡4人，伤26人。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7. 5. “枪决”

夺回《青海日报》后，赵永夫立即将一切情况向林彪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听到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街头，很快有人贴出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

2月25日，西宁驻军在《青海日报》上刊登14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地区部队宣传队的文章，指出“所谓新生《青海日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及其罪恶活动必须彻底清算”，以及由军方和报社组成的“青海日报社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告诫书。继26日在报上发布23日的通令后，又于28日发表署名为“卫东”的文章：“新生”《青海日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几天大都发了列举“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罪行、肃清其影响的文章。

这里顺便指出，在西宁驻军2月14日发布对《青海日报》进行军事管制的命令后《青海日报》仍然出了4期，即出至2月17日。但从17日至25日则停刊，共达7期，正好一星期。

报纸被接管以后，青海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原“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造反组织被正式取缔（后来又恢复了活动），公开活动停止，但仍有人喊冤叫屈，不断向中央写信反映。

中央文革小组最初对青海事件保持沉默，但几天后就利用《简报》刊登红卫兵来信。这些人在信中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们被赵永夫武装“镇压”的经过，要求中央文革为他们做主。其中一封“血书”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向您控诉，控诉那些血腥镇压红卫兵的刽子手，相信您一定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还有的写道：“天上有颗北斗星，红卫兵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阿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了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红卫兵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向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张春桥还对毛泽东说：“在处理青海事件的问题上，他们采用欺上瞒下的手法，搞假情报，欺骗主席。”

毛泽东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春桥：“上面有人指使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现在红卫兵赶到北京上访控

诉，要求平反昭雪，严惩凶手。”

3月份，中央派人到青海做了两次调查。所谓的“调查”完全不是实事求是，只是听取由中央文革小组挑选来的“受害者”的“控诉”。他们指着“血衣”、“刀口”、“枪眼”等所谓罪证，完全颠倒黑白，一只咬定赵永夫先开的枪，要求“伸张正义”。严惩“罪魁祸首”。于是，赵永夫被下令逮捕。

康生在“提审”赵永夫时，不等他开口，就板着脸说：“我一看你就像个特务！抓起来！你谎报军情，欺骗主席，欺骗中央，镇压红卫兵，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分子。”

赵永夫抗辩：“我不是反革命。他们冲占军区大楼，抢劫武器库，还开枪杀死解放军，我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的。”

康生大怒：“你还敢狡辩，还敢反扑。”

赵永夫叫道：“我无罪！我也有材料，你们为什么不看！那么多战士和群众被他们打死打伤，你们为什么不管？”

康生恼羞成怒，用力一拍桌子：“你这个人顽固得很，疯狂至极，杀头都不冤枉！”

江青也怒声叫喊：“你有后台，所以才有恃无恐！”

康生同林彪耳语几句，林迟疑了一会，然后点头同意。康生又走到公安部长谢富治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谢富治有些惊愕地望着康生，然后撕下一页纸，递给康生。康生迅即写下几个字，然后交给谢。

谢富治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红卫兵，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依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一、第二、第三、第六条，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死刑。”说毕，令几个武装战士立即将赵押下，执行枪决。

赵永夫一边被拖押着往外走去，一边暴怒大喊：“我是无罪的！你们冤枉好人！是他们先向我开枪，我是执行军委的命令！冤枉啊！冤枉啊！”

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立即悄悄退出会场，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但电话没有联系上。他又立即向徐向前报告，徐向前骂道：“妈的，他们竟敢开刀杀人！林彪竟然同意？……我马上去见总理！”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也没想到他们会下如此毒手，于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后，愤慨地说道：“他们真是胆大包天，竟然动刀杀人，杀我的军区司令员！不得了啊，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不然我毛泽东就要犯大错误。我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他们是不知道呢？还是置若罔闻？我们要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不能随便砍脑袋，脑袋不像韭菜，砍了不会再长。叫他们刀下留人！”

就这样，在死刑就要执行的时候，赵永夫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

这里顺便说明，康生随便判人死刑并不是从文革开始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大搞“抢救运动”，搞肃反扩大化，

诬陷、迫害了許多人。

当时，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开始当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长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分管反特工作。在肃反运动中康生滥用职权，大搞逼供信，任意罗织罪名，诬陷好人。光他定的罪名就有特务、反革命、反动分子、叛党叛国、国际间谍等。此外，他还凭相貌给人定罪，如“面目可憎，内藏奸诈”、“阴沉”、“奸诈顽固”、“伪装的阶级异己分子”、“见不得阳光的幽灵”等词语，都是康生发明的。1939年，康生曾亲手制造了三件轰动延安的大冤案。

这次下令枪决赵永夫，是康生故技重演。后来，在1968年审问云南省书记赵健民时，康生又说：“我四十年革命，我有敏感，我看你像个叛徒”，下令谢富治当场将赵健民逮捕，制造了一个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行动计划的重大冤案，在云南迫害致死干部群众14000多人，打伤打残干部38000多人。

毛泽东救了赵永夫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多次整理材料，最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3月24日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赵永夫搞军事政变，镇压群众，隔离审查。张晓川（解放军205部队副主任）、王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支持赵永夫武装政变，隔离审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被正式逮捕。

至此，“青海事件”告一段落。

7. 6. 林彪发难

按说，青海事件处理后，青海省委以及省军区的一批领导人被打倒，中央文革也算达到了目的，事情应该平息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人想借青海事件挑起更大的事端，矛头直指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声名显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

可以说，林、叶两人的交往并不十分密切，为何林彪在“文革”中要打倒叶剑英呢？

首先，叶剑英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这个职务是相当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所有军队大事一般都要经过军委秘书长，由秘书长全面主持全军的各项工作安排。林彪虽然在海军、空军等一些重要部门安插了亲信，但军委秘书长的职务却无法捞到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大心病。不扫除这一障碍，妄图架空毛泽东、全面夺取军权就是一句空话。对此，林彪早有图谋。

其次，叶剑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进行了一系列抵制和揭露，并站在斗争的前列。

叶剑英对林彪片面追求“政治挂帅”、以政治代替军事训练表示反感，认为这样做不能根本解决战斗力问题，将来真的打起仗来要吃大亏。

对林彪鼓动军队参加“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允许各地造反派冲击各级军事机关的做法，叶剑英更是极为不满，并进行了坚决抵制。

1967年2月，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主持人，他对全国出现的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的现象极为不满，愤怒地说道：

“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无疑，叶剑英的这段话表明了对林彪的极大不满。

林彪当然恨不能马上拔这个眼中钉。

但叶剑英也不是好惹的！

叶剑英跟随毛泽东几十年，无论在长征途中，在延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坚持站在毛泽东一边，深得毛泽东的器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干了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兵分两路北上抗日。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企图分裂红军。他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停止北上，甚至对毛泽东“武力解决”。

当时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读到这份密电后，立即策马向毛泽东报警。看完电报后，毛感慨地对叶剑英说：“你办了一件好事！”

30多年后，当毛泽东在南下巡视途中谈到这件事时，

又感慨地说道：

“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说完，幽默地摸了摸脑壳。他高度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林彪没有死心，他寻找着，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了！

青海事件的发生、毛泽东的不快令林彪精神大振，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向叶剑英发难。

林彪否认曾同意赵永夫开枪，却借口叶剑英说：“打得对，打得好”，把它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叫嚣要查赵永夫的后台，要揪出来示众。叶群矢口否认赵永夫所说事先曾请示林彪办公室，并得到支持。她说问了林彪的五个秘书，都说没有打过电话对西宁的“二·二三”行动表示过支持。

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各大中学校师生训练等问题。会上，以叶帅等为主的一批老将军对文革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惹恼了林彪、江青一伙，诬告他们“大闹怀仁堂”，是一股“反党逆流”。林彪、江青血口喷人，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专门收集、整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材料。康生在这次议上拿着叶剑英批准的成都军区电话稿，以恶毒语言逐字逐句进行批判，说什么这是“国民党语言”，那是“镇压群众”等等。

3月20日，林彪突然打电话说要到会上讲话，并且把赵永夫带到会上。他身披斗篷，脚蹬高腰大皮靴，杀气腾

腾地赶到会场，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竭力叫嚷“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把矛头直接对准叶剑英，并进行了恫吓。

在“大闹怀仁堂”后不久，林彪、江青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的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1967年4月2日，他们煽动一些人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的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还成立了“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五个子女其亲属拘捕，分别关押1—5年。

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家里开团结会。“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毛泽东说，“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师发牢骚嘛。”“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这实际上是为“二月逆流”的初步正名。当夜，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叶剑英等人上天安门，参加欢度“五一”活动。

林彪并不善罢甘休。1968年10月13至31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上，林彪等人又对叶剑英等发起了进攻，林彪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诬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1969年10月，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

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第一个号令”），将叶剑英强行“疏散”到湖南。

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恶毒攻击，叶剑英无所畏惧，胸怀坦荡。他曾填写《虞美人·赠陈毅同志》词一首：

串连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叶剑英借填词明志，表达了他绝不屈服的志向。

毛泽东虽然对几位元帅抵制文革反感，整过他们，但并不想全部加以打倒。他还让徐向前当军委文革组长，让叶剑英继续主持军委工作，并接受叶剑英的意见，指出“揪带枪的走资派”是要乱军，要“毁我长城”。

1967年4月底，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陈毅问毛泽东：“叶剑英有什么问题？”毛泽东答：“他有什么问题，老实人一个。”由于毛泽东的保护，叶剑英才免遭刘少奇、贺龙等人受到的打击迫害，林彪也无可奈何。

第八章 冰城喋血

冰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松花江面流水潺潺，太阳岛上阳光明媚，令游人流连忘返。然而，在“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成了枪炮齐鸣、血肉横飞的“武斗”角逐场。以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部副主任韩潮为首的一批“造反派”，拨弄是非，制造矛盾，挑起群众斗群众，大搞打、砸、抢，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武斗悲剧……

8. 1. “一·二三”事件

1967年初，哈尔滨虽然是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可人们的活动更加频繁。在凛冽的空气里存在着冷峻严酷的政治斗争气息。1月20日，哈尔滨市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省市广播电台和省市公安机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等七个单位联合组成了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夺取了原省市机关的政权。在此期间，在一些已经夺了权的单位中发生了反夺权斗争，在当时称为“一·二三”反革命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事件是这样引发的。1967年1月22日实行了大联合的哈尔滨红色造反者，接管了当时被称为“反动组织”的“战备军”的根据地友谊宫，把权力夺回到当时目标的革命

左派组织——“星火”红色造反团手中。

“荣复军”和“战备军”同属于一个派别，在当时都被当作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因此“荣复军”当然关心“战备军”的情况。1月23日下午，“荣复军”的头头将其组织成员叫到青年宫集中起来，先招待看文艺节目。为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他们也将周围的群众叫去，边看节目边进行宣传活动。看完节目后，约晚上10点钟，他们将在场的300多人集中起来，手持铁棒、木棍、钢丝鞭、匕首等武器，闯到友谊宫，袭击“星火”红色造反团。

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那天晚上军区领导正在开会分析这一时期来的形势及研究对策，忽然得到消息说“荣复军”去围攻“星火”红色造反团。“来得正好”，军区的领导立即研究，意见一致。司令员立即发出命令“出兵”。这时正好是晚上10点21分。部队行动真是迅速，在接到出兵命令的两分钟后即10点23分时就已做好一切行动准备了。很快驻地解放军就赶到了友谊宫，并冲了进去，将“荣复军”团团围住，切断他们的退路，步步缩小包围圈。“荣复军”的头头当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因此有的抡起棍棒皮带，有的吹口哨，有的冲着战士大喊大叫，试图在混乱中，煽动被蒙蔽的群众夺路而出。面对部队指战员的荷枪实弹，“荣复军”里有不少人¹对军队的行动十分惊讶，莫明其妙。他们说：“政委（即“荣复军”的一个头头）不是告诉咱们，今晚的行动已经得到军队和公安机关的同意吗？咱们不是来打一个反动组织吗？解放军怎么又包围咱们来啦？”实际上，很多群众是被蒙骗了。部队指战员立即进行宣传瓦解分化“荣复军”的

工作。这时候，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东北林学院和黑龙江大学等单位的红色造反者也闻讯赶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友谊宫围得水泄不通。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将“荣复军”全部赶到了友谊宫会场。部队指战员反复强调：“你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荣复军’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必须解散。我们相信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好的，是受了蒙蔽和欺骗的。我们一定会按党的政策办事，好人不要害怕，坏人一定要被揪出来”。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荣复军”开始分化了，有的人偷偷地扔掉了暗藏的匕首，有的人扔掉了带在衣兜里的“荣复军”的“公章”。人群中有人喊：“我们受骗了！”“我们一定要把坏蛋揪出来！”他们一面喊，一面把“荣复军”的袖标撕下，摔在地上，并把组织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政委、参谋长等头头们揪了出来，押解到台上。这样“荣复军”的这次行动就这样瓦解了。

在向原省委夺权的斗争中非常卖力、处处冲锋在前的省林业厅管理员韩潮“红极一时”。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月31日发出的《第一号通知》中郑重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韩潮担任省革委会常委，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副主任，省政治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各省大都报道祝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夺权胜利。

顺便交待一下，在1月31日省革委会成立的当天，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发生了当时被称为“一·三一”反革命事

件。情况是这样的。1967年1月31日和2月1日，哈工大的干部和群众，在校礼堂举行两次辩论会。会上绝大多数人提出“那个人”没亮相，不能进入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等意见。刘××看到这正是自己往上爬的一个机会，因此贴出了“评‘一·三一’‘二·一’两次反革命黑会”的大字报，深得“那个人”赏识，他表示支持刘××在哈工大的工作，刘××得到支持，就公开说，中央领导说过“一·三一”是反革命事件，在哈工大多次组织批斗和审查会。遭批判和审查的上千人，被揪斗遭毒打的上百人，被公安机关拘留关押的达19人之多，其中两人致残。校党委副书记彭云被加上莫须有罪名，诬为“黑后台”投进监狱。这样刘××掌握了哈工大党政财务一切大权。建立校革委会后，刘××还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又特批入党，任哈工大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1967年的夏天。由于一种错误的阶级分析，各地都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争斗，事态严重。毛泽东虽一再声明：“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公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文攻武卫”，江青还指责坚持“文斗”的群众“是不对的”。她说：“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又怎么行呢？”“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反击”。由于有江青的这个讲话，黑龙江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在不断地升级。无论工厂、机关、学校都一样。忽而这派斗那派，忽而又是那派斗这派。你说我这派是“反革命暴乱”，我说你那派是“保守派”。整个社会都卷入武斗争之中。

知识分子要革命，革起命来还挺文明。1967年6月5

日就发生哈尔滨军工学院的“炮派”到107门前静坐事件。这天哈尔滨军工学院的“炮派”数百人到107门前静坐，哈尔滨第一机械厂的“炮派”也前来支持。他们对现有革委会的工作不满意，希望有省委负责人出来与他们对话。“那个人”立即派韩潮组织“捍联总”去驱赶。“捍联总”成员们立即冲上前去拉着他们往外推，推不走就抡起棍棒来打。开始哈军工的“炮派”还不还手，最后不得已即还了手，哈一机的“炮派”们身强力壮，对“捍联总”的动武进行了还击。双方互斗了1小时，很多人都负伤流血了。107门前的水泥地上到处血迹斑斑。哈军工“炮派”的几个成员被抓。

在武斗中，被俘的哈军工“炮派”几个成员中，有一个女的，据说是“炮派”的重要人物。“捍联总”对她的镇压特别狠，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对她进行逼供，可她一直不供。“捍联总”成员用香烟头烧她，用老虎钳夹她，甚至扒下她的衬衣，用皮鞭、钢鞭进行毒打。最后她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三根肋骨严重损伤，鼻骨也被打断。她身上被烧了无数个洞，还是不供。没办法，只好将她活埋。她留下遗书：“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不孝，女儿先去，你们要教育好弟弟妹妹，让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亲爱的党：这是我身上仅有的150元钱，作为我今后的党费，我是热爱您的……”

6月9日，“捍联总”又派人去哈军工学院，他们头戴头盔，扎好腰带，带上袖章，手持武器，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军工学院进发。哈军工学院的“炮派”也立即组织队伍进行抵抗。“捍联总”的成员对哈军工“炮派”边打边

喊：“看你们以后还敢跟政府对抗不？”一阵毒打一顿教训后，他们回来了，对哈军工炮派的教训暂时告终。

6月21日，韩潮亲自出马，先召开“捍”派领导会议，讲明形势的逼人及对哈建工学院进攻的重要性。会上成立捍派战斗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准备工作。

那天早上，几千人手持武器，带着袖章、头盔，整整齐齐地排队在政府广场等待命令。韩潮拿起话筒高呼：“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镇压反动派！”“谁同情反动派决不会有好下场！”千万个声音汇成了“革命”洪流，响彻广场上空。随后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建工学院进发。在这有备而来的队伍面前，哈建工的“炮派”也马上组织起来，面对敌对组织的来犯，他们也给予了狠狠地还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手持大刀挥舞者，有手拿扎枪瞄准者，一时间那枪击打斗的场面可与武打电影比美。有的腿部挨了扎枪，有的手臂被砍几刀，有的额角流血，有的腹部受伤，大肠流出拖在地上。双方都互有伤亡。“捍联总”毕竟是人多势众有组织的队伍，哈建工的“炮派”伤亡的就特别多。捍派有人专门打到哈建工“炮派”头头的家里去，将他们的家属也杀绝。最无辜的是那刚出生38天的婴儿，他还没来得及睁眼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还不明白人世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被杀了。

武斗过后，韩潮率领一些人冲上教学大楼、实验室、图书馆。一时间，教学大楼的木桌椅被砸坏、实验室里的实验仪器设备被砸坏、图书馆的藏书也被撕毁不少图书和设备被一把火烧成灰烬。据统计，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亡20多

人，伤 400 多人，被砸坏的教学仪器设备 25 种、共 533 件，撕毁焚烧的图书馆藏书有 10000 多册，损失 50000 多元人民币。

战斗中，“捍派”还俘虏了哈建工学院“炮派”的几个人。第二天召开数万人大会，对这些“反革命罪犯”进行狠狠地批斗。会场上，数万人黑压压地一片，“捍派”给他们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要他们表演在地上学狗爬、学狗打滚、翻跟头。有一个头头在翻跟头时，腰骨垫在石头上，当即被硌断，躺在地上起不来。“喂，起来，别耍赖！”一捍派成员拿起棍子“咣咣”再敲两下他的脑袋，最后使他终身残废。他们还给另外一个人上“飞机扔炸弹”的“必修课”。他们将他的手脚捆绑起来，用绳子绕着横木，将他往上高高拉起，拉到一定高度时，拉绳者的手突然松开，任其自然落下。多次重复、多次摔下。接着他昏了过去，殷红的鲜血从嘴巴里耳朵里往外流。群众里胆小的人不敢看，有些还因害怕而发出惊呼，在场的小孩被吓得“哇哇”直哭。此时，韩潮拿起话筒对台下喊道：“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你不打他，他就不倒，谁不敢看谁就是同情反革命，这是立场问题！”“小孩不许哭，哭的小孩是胆小的小孩，革命群众的孩子就应该从小培养革命的胆量，革命的意志”。一席话把群众吓得不敢不看，不得不注意每一个细节，对哭的孩子，大人不得不用手捂着他们的嘴巴。

晚上，又对他们拷打了几个小时。他们哪里吃得消？一个年轻力壮的中年人就这样被他们用法西斯的手段活活折磨死了。他们将他的尸体秘密地投进了呼兰河。呼兰河水也充满着血腥味，呼兰河硬咽着……

8. 2. 哈一机血战

黑龙江是全国重工业基地。哈尔滨第一机械厂（以下简称哈一机）是全国重点企业，有数十万名职工。文革初期，哈一机的红色“造反造反者”遵照“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进行造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中，从原厂党委手中夺取了党政财等大权。但是，斗争是反复的。原厂党委成员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没有错，他们的工作深得群众的赞许。他们明里就有一批群众支持，暗里支持他们的群众就更多了。因此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仍力图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因此当时存在着夺权与反夺权的复杂斗争。

哈一机原党委成员在当时被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被称为反革命行动，“妄图夺权，篡改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则认为，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同样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黑龙江变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革委会应该下台。

哈一机的原厂党委们不但在厂里搞反夺权斗争，同时他们也把支左的解放军视为仇敌，多次围攻军代表，并把军人赶出大楼。最为厉害的是，哈一机原厂党委运回大量的砖瓦砂石，开动机器，把哈一机“总部”大楼变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桥头堡”、“根据地”。8月18日凌晨，他们组织人马抢劫国家粮店，劫走粮食3万多斤。8月20日中午又将停在哈一机大门前的一辆卡车上的8000多

斤高粱抢劫一空。接着又在8月23日晚上出动500多人在三棵树车站拦劫刚开出站的货车，抢走白面6万多斤，并使列车中断行车达4个小时之久。

在哈一机，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着。“炮派”属于原厂党委管，捍派为丁××等人管。“炮派”对“捍派”革命起来不留情，“炮派”大楼成为他们审讯、拷打、拘禁“捍派”成员的地方，而“捍派”大楼同样成为审讯“炮派”的“白公馆”。“炮派”制造一起又一起袭击“捍派”的流血事件，打伤“红色造反者”数百人，抓走100多人。“捍派”也制造了“8·28”攻大楼血案，10月12日围攻“炮派”在哈一机的据点。

丁××被提拔为“造反”头头后，同样在厂里私设公堂，美其名曰“审讯反革命”。他把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副书记、工程师、总工程师和绝大多数干部、部分科技人员都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集中起来，关押到“落水狗管理站”。一连20多天，在夜间1—3点，叫他们起来搞所谓“军训”。在这座当代的“白公馆”里，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到法西斯式的毒打。他对原厂党委书记施行残忍的毒刑，百般肉体折磨还不算，还把他推到三楼凉台上，逼他跳楼自杀。书记自1939年就参加革命，曾在白色恐怖中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今天在自己用血汗挣来的自由和和平的年代里，他哪里害怕这些跳梁小丑？他对这种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丁××逼他死不成，他又另下别的毒手，给书记挂上大牌子，用细钢丝挂在脖子上，每天挂十多小时，把脖子挂得皮开肉翻、鲜血直流。对书记本人狠毒还不够，连他的妻子也不放过。丁

××给她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撤了她的二车间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天天进行批斗，轮番折磨，就连例假期间也不放过，强迫她跑步。月经从裤腿里流到鞋里，造成流血不止。“丁大棒子”还强迫她一人干三个人的活，由于过度疲劳摔倒在地，胳膊关节被棒脱位。丁大棒子还骂她是“三反分子”、“落水狗”、不准治疗。拖了三个多月，她的关节里长满了肉芽，无法医治，至今耷拉着膀子，造成终身残废。原副厂长在被隔离反省期间，因为说了一句“星期天还劳动”的话，就被丁××叫到办公室，用三角带劈头盖脑地打。他打累了休息，却叫副厂长在地上滚翻跟头。一连打了十余次，两个多小时，副厂长整个脊背被打得青紫水肿、皮开肉裂，衬衣和鲜血粘在一起。副厂长被折磨得不能动弹，丁××仍不放过，还逼着他立即写所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检讨书，进行轮番批斗，一搞就是几个小时。

8月28日，在韩潮的指使下，丁××率领捍派成员带着现代化武器即机关枪、冲锋枪、迫击炮等围攻哈一机“总部”大楼。双方进行血腥残杀。武斗中死亡13人，受伤400多人，成为当时闻名全省的“八·二八”攻大楼血案。

由于哈一机的斗争太复杂，哈一机的“炮派”力量太强大，要想完全稳固在哈一机的统治，光靠丁××个别的力量是不行的。省革委会的“捍派”公开支持哈一机的“捍派”。8月28日对哈一机“炮派”进行了教训，但还觉不够。10月12日，省革委的“捍派”带着现代化武器去配合丁××围攻哈一机“炮派”，这次同样动用了机关枪、冲

锋枪、炸药等。武斗中打死5人，打伤一百多人。

在武斗期间，韩潮亲自到哈一机去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会儿将该厂这拨群众组织来发表几点意见，一会儿又对该厂那派群众组织发表声明。一会儿把这派群众组织说成是“老保派”，忽而又把那派群众组织搞成“反革命暴乱”，是非界线混淆。后来明确支持丁××派，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全厂三分之二的职工都被卷进了武斗中去。

在1967年8月下旬，韩潮为准备更大的武斗，先后向省林业厅、哈尔滨工业大学、林业机械厂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说：“哈市武装部在极乐寺的军械库存有的给全市民兵的枪支，你们可以去抢。”在韩潮的唆使下，上述单位共出动200余人、10余台卡车到极乐寺，将警卫军械库的解放军围住，把军械库门锁锯断，闯入库内，共抢去迫击炮6门、机关炮5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韩潮不单在哈尔滨市里搞武斗，还到市郊去搞武斗；不仅在67年6、7、8、9、10几个月中大搞武斗，直到全国各地实行革命大联合时的68年3月还在搞武斗。68年3月，韩潮到哈尔滨市郊区民主公社红星大队制造了所谓“反革命阶级报复集团案”。在这场混乱中他下令逮捕7人，拘留8人、隔离审查13人，并在红星大队召开了两万人参加的现场会，由《黑龙江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在审理案的过程中他大搞严刑逼供，进行人身摧残、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8. 3. 哈工大门前混战

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在文革初期混乱的年代，被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染缸”，“反动势力雄厚，是个烂掉的单位”，“特务如毛，反革命绊脚，要深挖三尺”。在这样一个“敌我矛盾”特别尖锐的大单位里，造反派觉得必须培养一个得力人物。刘××就是他们培养的最佳对象。

前文已经提到刘××在哈工大搞所谓“一·三一反革命事件”。由于他“造反”态度积极，“捍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拔他来掌握哈工大党政财的一切大权，建立校革委会后又提拔刘××为校革委会副主任，特批刘××入党。这样刘××又窃取了哈工大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

在哈工大，两派的斗争也很复杂。不单哈工大内的“红色造反团”在积极与刘××及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进行斗争，而且他们还得到社会上其它组织的支持，如哈尔滨港务局“红色造反团”。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服输，时刻准备着与当时所谓革命的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进行斗争。

8月9日下午，港务局“红色造反团”的领导和哈工大“红色造反团”的一部分头头在群众中进行活动，把群众叫到师范学院去。当时准备下班，许多人都准备回家吃饭了。但他们及时组织，说今有要事相商，不用回家吃饭了。这样，许多群众都饿着肚子到师院去了。到了师院，他们都忙着做准备工作，哪有时间吃饭？准备工作做好了。组织

者叫他们先休息一下，等待命令。睡了一觉，8月10日凌晨，哨子响了。他们立即起来集合，组织者进行了简短明了的动员讲话：“同志们，我们接到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去哈工大向新曙光红色造反团夺回属于我们的政权，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要明白你们肩负的重任”。接着他讲了注意事项，这次行动的标志，口号和联络暗号等。他的话一讲完，这一队早已准备好的队伍就出发了。他们个个头戴柳条帽，带着扎枪、铁棍、皮鞭、石灰、六六粉等原始武器。哈尔滨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打先锋，哈工大“红色造反团”作机动和外围。他们由内线引路，砸坏了门窗，切断了电话线，砸坏了电话机、警铃，然后冲上一、二、三楼，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新曙光”成员名单，由工大“红色造反团”的人作向导，挨个把寝室砸开，把正在熟睡的“新曙光”成员从被窝里一个一个地拖出来，抡起皮鞭、铁棍就是一顿毒打、绑架。打伤了“新曙光”成员多人；绑架走了十几个人。他们还继续袭击哈尔滨三棵树车辆段红色造反团、32中红色造反团、58中红色造反团、朝鲜一中红色造反团等群众。8月10日下午，在哈尔滨市人民大厦广场召开了哈尔滨市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10万人大会，愤怒声讨了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和哈工大的“红色造反团”挑起武斗的罪行。

8月10日凌晨的武斗，双方都俘虏了对方的人，他们俘虏了“新曙光”的十几个人。8月11日，“捍派”在《黑龙江日报》第四版上发表了《严正声明》，要求“炮派”必须“绝对保证被非法绑架的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战士

以及所有被非法绑架的我捍卫革命‘三结合’战士的人身安全，不许动他们的一根毫毛，并立即负责送回，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这些被绑架去的“新曙光”十几个人有了这张声明就等于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在对方那里没受到什么折磨就被送回了。而刘××却对自己的几个俘虏立即进行残酷的折磨，法西斯式拷打，4个小时就将对方的4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活活打死，然后秘密埋葬。

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和哈工大“红色造反团”于8月10日凌晨袭击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他们为这一事件的后果付出了代价。舆论工具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强烈地抨击，使他们处于无助的地位。但是，这还不够，“捍派”还要秘密策划一起让他们吃大亏而又无处申诉的事件。韩潮和刘××秘密策划，制造港务局“炮派”来进行报复的假象，然后，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以逸代劳，袭击港务局“炮派”。

8月13日，当港务局“炮派”路过哈工大大门前时，哈工大的“捍派”以为港务局果真来报复了。他们哪里咽得下8月10日被港务局袭击那口气？他们见到港务局“炮派”来了，便一哄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地打。当时港务局的“炮派”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着哈工大“捍派”了？在哈工大“捍派”打上来的时候，他们还想论理。哪容得下他们论理？哈工大“捍派”手中的铁棍、皮鞭已向他们的身上打去。手中的六六粉已向他们脸上撒去。他们奋力抵抗。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哪里是“捍派”的对手？先前从解放军手中夺来的武器都用来装备哈工大“捍派”，因此他们哪里敌得过“捍

派”？硬拼是愚蠢的，因此港务局“炮派”头头指挥队伍撤退，边撤退边自卫。“捍派”见我打来你退了，我看你退！“捍派”手中的现代化武器留着去打鸟吗？步枪、机关枪瞄准正在撤退的港务局“炮派”，直到港务局“炮派”远远离去。哈工大门前成了屠宰场。清理现场时发现已有3个人已经死去，100多人受伤，其中50多人受重伤致残。被害青年工人孔庆金死时只有28岁，新婚不久已怀有身孕的爱人不得已而改嫁，父亲想儿子得病3个月后死去，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就是哈工大门前“八·一三”流血惨案。

这次行动给港务局“炮派”带来惨重的损失，最亏的是他们还不能替受害者伸冤。舆论工具掌握在捍派手中，他们往哪里告状？他们真是吃了哑巴亏，有冤无处诉，有仇无处报，那些死去的人也就成了真正的冤死鬼。

8月11日的《黑龙江日报》第四版整版都刊登了所谓“声讨”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和哈工大“红色造反团”挑起武斗罪行的文章。可是事隔3天之后，哈工大“捍派”制造的“八·一三”流血惨案却丝毫不见登报。正而报道没有，反面报道也没有。

5月14日，莫斯科电台报道：黑龙江的鸡西市发生了17万人的大武斗，称之为大陆“文化革命”中一次“最激烈流血的插曲”。据莫斯科广播称，一批当地解放军会同来自全省的大约10万名工人，一举攻占了鸡西小镇。在这次进攻中，属于红卫兵和革委会领袖均被逮捕，有数百人死伤。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严重，鸡西市虽多次发生武斗，但都不是“最猛烈流血”的。5月1日，鸡西炮派和捍

派之间在大战中死亡9人，伤44人。

汤原县跟全国各地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派别，据后来统计得知，这两派之间的武斗从1967年6月18日至68年4月7日止就发生了十次，总共打死24人，关押52人。

8. 4. 不是尾声的尾声

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直到一九七四年，哈尔滨还时有武斗事件发生。

在所谓“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些在“文革”初期靠造反起家的派性头头，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与江青集团的活动紧密配合，直接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阴谋夺取黑龙江领导权的犯罪活动。

1974年3月21日，牛××、聂××这两个“造反英雄”经过事先策划，指挥一些人冲击省委机关，占据会议室，围攻领导人，大闹6天5夜。4月6日，他们公然指挥帮派骨干挟持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剑白，挂上“批倒批臭”的牌子，在哈尔滨市六个区和两个大厂进行游斗，并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了批斗大会。5月10日，他们召开黑会，密谋策划去省委索要有关省委“三·五”会议材料和围攻省委、省革委会领导人。10日，这些人冲进省委机要室，打伤工作人员，抢走省委有关“三·五”会议材料，并寄给江青，作为诬告省委的依据。同时，他们围攻省委书记张林池，围攻了4天4夜，致使张林池心脏病复发住院。

12月24日，省革委会在“107”招待所召开补选全国

四届人大代表的八次全会。这时，省革委会委员、造反派头头聂××在主席台上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与会人员阻止时，另一帮派便在台下起哄支持聂××。在会场外，按既定方案，刘雪峰、邵岩城等人带领几十人不听警卫人员的劝阻，打伤服务员，砸坏窗户，冲进会场，占据会议室，致使会议中断。25日晚，牛成山将会议改变地点的消息告诉同伙。第二天早晨，他们手持棍棒，拦截代表外出开会的汽车。他们还冲进省委机关，占据常务会议室，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广播室，搅闹两个月之久，重做“文革”初期的夺权旧梦。

然而好梦不长。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些靠“造反”、“武斗”起家的“英雄”们，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结 束 语

“这些都是真的!”经历过这场恶梦的人们一提起它就浑身颤抖。

“这些都是真的吗?”未经历这场恶梦的“第三代人”有点迷惑。

“这正如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对港台某些青春派歌星如此痴迷,为他狂热、对他崇拜,甚至不惜为他献身!……我们那一代人跟你们一样,只是对象不同罢了!”经历恶梦的人如是解释。

是啊,这幕历史性悲剧,使数百万质朴无邪的青少年在阶级斗争的迷雾中,变得如此地崇拜、狂热,终于越陷越深,以至于狂热到充当林彪、江青等一伙篡党夺权的急先锋。自以为是采取革命行动,事实上却成了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而最后,自身又饱尝苦果,成为受害的牺牲品。

这是为什么?

但愿活着的人们能领悟到一点什么。

后 记

讲起武斗，人们至今仍然谈虎色变。为了不让这段令人难堪的历史悲剧重演，也为了使人们珍惜今天稳定的政治局面，我们拿起了这支沉重的笔。但愿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本书由地久、致武主撰，李渭华、何致武、苏瑞竹、徐琳、郑铁戈、麻新纯、丛越、李玉林、李建珍参加撰写。

谨向为本书成书提供资料和其他帮助的朋友致谢。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谨向为本书成书提供资料和其他帮助的朋友致谢。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作者 =

页数 = 3 3 2

SS号 = 1 0 9 6 5 7 7 1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引言

第一章 东都风暴

- 1 . 1 红卫兵组织分庭抗礼
- 1 . 2 杀向社会
- 1 . 3 “联动”六冲公安部
- 1 . 4 清华百日大血战

第二章 “广西不得了”

- 2 . 1 《广西日报》门前的拉锯战
- 2 . 2 又一次较量
- 2 . 3 南宁一中的血在流淌
- 2 . 4 广西内战大火燃起
- 2 . 5 抢枪风潮
- 2 . 6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 2 . 7 歼灭“4 . 2 2”之战
- 2 . 8 广西善后会议

第三章 广东战火

- 3 . 1 两起所谓“严重的政治事件”
- 3 . 2 造反派夺权
- 3 . 3 武斗迭起
- 3 . 4 海丰厮杀

第四章 楚豫劫难

- 4 . 1 河南玻璃厂三千人大搏斗
- 4 .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 4 . 3 “七 . 二 0”事件
- 4 . 4 狂潮后的余波
- 4 . 5 血祭朱奇武
- 4 . 6 湘南杀人如麻

第五章 巴蜀硝烟

- 5 . 1 “夺权”旋风
- 5 . 2 产业军发誓：“血洗川大，头断四川”
- 5 . 3 重庆常规武器大战
- 5 . 4 狂热的代价

第六章 血染上海滩

- 6 . 1 “踏平康平路”
- 6 . 2 扫荡“红革会”
- 6 . 3 决战前夕
- 6 . 4 血洗“上柴联司”

第七章 青海危机

- 7 . 1 青海派别林立
- 7 . 2 强占报社

7 . 3 武装游行：解放军介入

7 . 4 血洒大院

7 . 5 “枪决”

7 . 6 林彪发难

第八章 冰城喋血

8 . 1 “一 . 二三”事件

8 . 2 哈一机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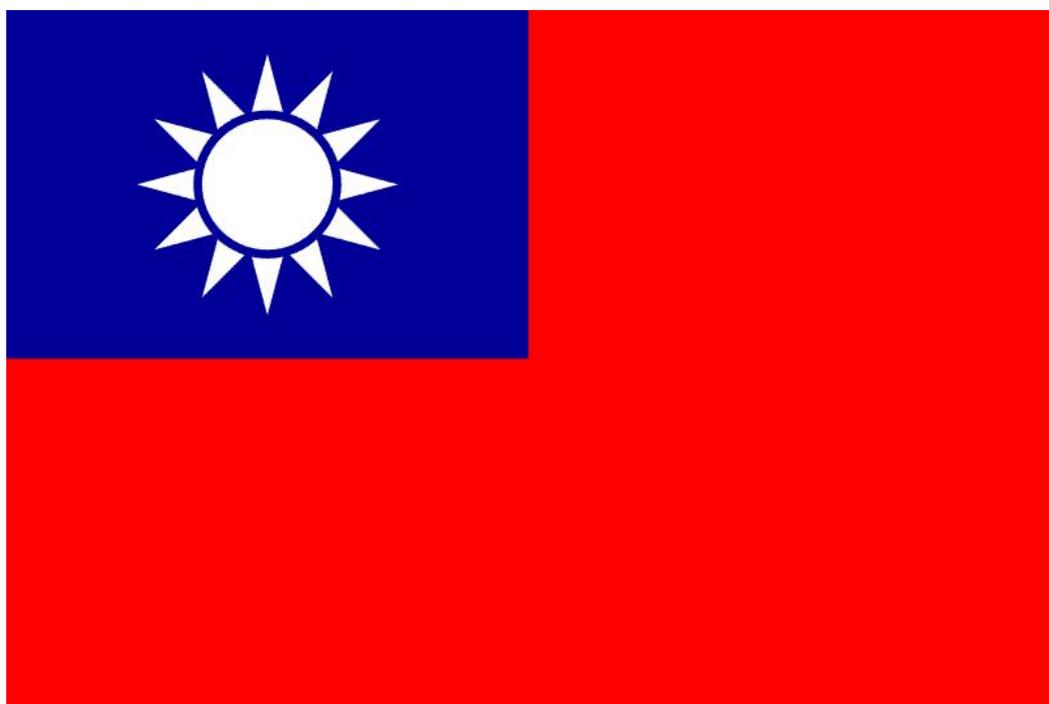
8 . 3 哈工大门前的血战

8 . 4 不是尾声的尾声

结束语

后记

附录页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